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4年第4期,总第70期)

双月刊

学术顾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委会主任 金 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王玲杰 史育龙

宁越敏 任晓莉 阮金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同新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张其仔 陈 耀 金 碚

周金堂 赵 弘 郝寿义 贺灿飞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 编 张富禄 陈 耀

社 长 张富禄

副 社 长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笔谈

5 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程必定 陈耀 秦尊文 杨兰桥

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专题

21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

孙久文

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

31 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范式变革的内在逻辑、关键问题与战略重点

张大卫

39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解析、困境审视及路径设计

田国强 仇艺博

区域协调发展

47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柳天恩 田梦颖 孙雨薇

57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李莉莉 何龙辉 何广文

67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区域收入差距:现实特征与政策建议

闫梅

区域高质量发展

77 数字经济赋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静田 付晓东

85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机制、异质性及策略

庄赞 吴自炜

94 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内在逻辑、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向

李 昫 孔维铮

102 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经验、制约因素、突破路径

杨梦洁

城市经济研究

110 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幂律分布规律与层级结构特征

盛广耀

119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阎东彬 王蒙蒙

129 智慧城市中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研究

马 丽 田世华

区域开放与合作

137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路径选择

聂新伟 卢 伟

150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研究

陶宏展 吴 超

书评

159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价值

——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

李 扬

主 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 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 址 郑州市恭秀路16号
邮 编 451464
电 话 0371-63690786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 址 www.qyjpl.cn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1425/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2095-5766
广告发布登记证 金市监广发变登字【2020】021号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定 价 16元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4.4 *Bimonthly*

- The Discipline Nature and Discipline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s under Chese–Style Modernization
..... *Sun Jiuwen*(21)
- The Intrinsic Logic, Key Issues,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ing Transforming the Paradig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Dawei*(31)
- The Internal Logic, Dilemma Review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ian Guoqiang Qiu Yibo*(39)
- The Theory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Xiong’an New Area to Narrow the Public Service Gap with Beijing
..... *Liu Tian’en Tian Mengying Sun Yuwei*(47)
-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China
..... *Li Lili He Longhui He Guangwen*(57)
-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Yan Mei*(67)
-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Wang Jingtian Fu Xiaodong*(77)
- Empower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Digital Economy: Mechanisms,
Heterogeneity and Strategies *Zhuang Yun Wu Ziwei*(85)
-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Internal Logic,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Li Yun Kong Weizheng*(94)
- New Progress and Dir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New
Era *Yang Mengjie*(102)
- Power–Law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Network
Linkages *Sheng Guangyao*(110)
-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Yan Dongbin Wang Mengmeng*(119)
-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Smart Cities ... *Ma Li Tian Shihua*(129)
- The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Ope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Nie Xinwei Lu Wei*(137)
- Research on the Welfare Effects from Im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Tao Hongzhan Wu Chao*(150)
- Exploring the Provincial Valu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R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n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Guangdong* *Li Yang*(159)
-

【笔谈】

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编者按: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此后,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对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进行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前,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经济增长从不平衡向相对平衡演化、产业结构从不协调向相对协调变迁、创新活动从分散向集聚转变、城乡关系从分割向融合转型的新特征,未来,要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本刊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之际,组织专家学者总结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过程、巨大成效、发展阶段的评价及未来影响,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部地区崛起;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05-16 收稿日期:2024-05-15

中部地区的新使命:高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程必定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指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地区,在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战略布局、拓展国家安全战略纵深、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六省发展普遍加快,中部地区在全国的战略位势显著提升,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中部地区的新使命。

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周年的巨大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如2023年,中部地区常住人口3639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6.97万亿元,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25.82%、21.39%,比2004年分别提升了0.25个、2.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41

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92%,比2004年提升了5.8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彻底改变了“中部塌陷”的局面。

从战略上看,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的巨大成效,是六省紧紧围绕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战略定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颁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首先提出的,2012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颁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2021年颁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都强调这个战略定位。可以说,20年来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逐年巩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

一是在粮食生产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2029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9.2%，其中河南6624.5万吨，安徽4159.8万吨，湖南3068.3万吨，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5位、第11位，为确保国家粮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在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煤炭总产量达15.92亿吨，占全国的34.1%，其中山西13.57亿吨，安徽1.12亿吨，河南1.02万吨，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6位、第7位；电力装机容量达625792亿千瓦，占全国的21.4%，其中河南13915亿千瓦，山西13304亿千瓦，湖北11253亿千瓦，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7位、第8位；钢材总产量达18328.1万吨，占全国的18.0%，其中山西5918.5万吨，安徽3587.6万吨，湖北3343.7万吨，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7位、第9位。水泥总产量达5.37亿吨，占全国的26.6%，其中安徽1.33亿吨，湖北0.99亿吨，河南0.96亿吨，分别居全国第3位、第9位、第11位。这些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

三是在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25.84万亿元，占全国的21.2%，其中安徽5.09万亿元，河南4.65万亿元，湖北4.59万亿元，分别居全国第7位、第9位、第10位；汽车产量达573.41万辆，占全国的19.04%，其中安徽208.8万辆，湖北179万辆，河南79.3万辆，分别居全国第4位、第6位、第17位，在全国的位次都有上升。这些数据都表明，中部地区在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

四是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中部地区已有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四个省会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各省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都发展很快。就高速公路而言，2023年中部地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1349千米，占全国的4.5%，其中河南8321千米，湖北7600千米，湖南7539千米，分别居全国第8位、第10位、第11位；就高速铁路而言，中部地区2023年高速铁路通车里程达12426千米，占全国的27.6%，六省高速铁路通车里程都超过2000千米，其中安徽2522千米，湖南2408千米，河南2196千米，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4位、第7位。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年取得的巨大成效，是中部地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新起点。从战略上看，中部地区在新时期的新使命应是，在进一步巩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基础上，高

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二、中部地区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必要条件

国家战略腹地作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特殊而重要的使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受到很多省区的高度重视，目前，中部地区已有河南及湖南长株潭地区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实际上，中部地区作为一个大区域板块，在进一步巩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可以整体建为国家战略腹地。

我国学术界和政府规划部门共同认为，国家战略腹地有五个必要条件，即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资源的丰富性、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及文化影响力，而中部地区具备这五个必要条件：

第一，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重要性。从全国视角看，中部地区属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大地理板块，河南属中原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属长江中游地区，而山西与京津冀相连，安徽是长三角的成员，显然，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北接南”的经济地理优势。正因如此，中部地区目前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是国家战略腹地的关键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这个关键条件。

第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中部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以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创造了五分之一以上经济总量。2023年与2004年相比，常住人口占全国之比上升了0.25个百分点，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之比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上升了5.83个百分点，表明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反映在产业发展上，中部地区已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是国家战略腹地的根本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也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根本条件。

第三,中部地区资源的丰富性。中部地区经济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光、热、水和矿产资源都很丰富。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测量,中部六省自然资源丰度都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四大战略性资源(矿物、耕地、生物、淡水)的人均拥有量也高于东部地区,特别是我国常见的物种、矿种在中部地区都有,煤、铁、铜、硫、稀土、石灰石等几十种战略性矿产储量居全国前列,长江、黄河、淮河、新安江横贯中部地区全境,全国五大湖泊就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在中部地区。资源丰富性是国家战略腹地的基础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资源丰富性这个基础条件。

第四,中部地区已成为科技创新人才新高地。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活跃强劲,特别是六个省会城市已成为科技创新人才新高地。如合肥是全国首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建在建大科学装置12个,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以汉江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基本形成,已建在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8个,长江存储闪存芯片世界领先,成为半导体领域“国之重器”;郑州形成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三足鼎立”科技创新大格局,全国重点实验室13家;长沙与株洲、湘潭共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效显著,湘江实验室“四算一体”攻关取得突破,正在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南昌建有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国家(江西)北斗卫星导航综合应用项目;太原建有“晋创谷·太原”,高速飞车项目完成国内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科技创新人才高地是国家战略腹地的核心条件,上述情况表明,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这个核心条件。

第五,中部地区文化影响力深远。中部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学术名派大家辈出,从大尺度空间看,历史悠久而有影响的地域文化有:道家故乡的淮河文化,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文化,以山西为中心的三晋文化,源于荆楚的湖湘文化等;从小尺度空间的历史演变看,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则更多,如有被学术界称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文化,有名人辈出的河陇文化、江西文化、桐城文派等。这些地域文化又世代延续,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增添绚丽的光彩。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农民

首创“大包干”,又涌现出改革文化、创新文化、奋斗文化,林林总总,文化影响力逐渐上升。如此等等,可以说,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必要条件。

三、中部地区应在推进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个重大国家战略及共建“一带一路”,在中部六省都有不同程度的叠加,加上20年前就提出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国家战略在中部地区叠加数之多,在全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是仅有的。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部六省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要注重与其他重大国家战略的衔接、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中部六省应推动重大国家战略由叠加上升到融合,从整体上推进中部地区由全国重要的“三基地一枢纽”,向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再跨越,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中部地区新篇章的新起点。

首先,中部六省应发挥各自优势,在实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同时,就近与相关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使各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力度互补、资源利用集成、战略效应倍增,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因为除中部崛起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在中部地区全覆盖外,五个重大国家战略都有特定的区域范围,中部各省都应从地理区位出发,推进与相关重大国家战略的衔接、融合。比如,安徽既是中部省份,又是长三角的成员,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山西因与河北、北京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河南因与河北相邻,也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湖北因与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江西因与浙江、安徽、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

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湖南因与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这样，中部六省按不同的空间指向与相应的重大国家战略融合，都可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注入新动力。

其次，中部六省在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必须突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塑造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中部六省在推动重大国家战略中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必须以创新为主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各省的发达地区既有条件率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可在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融合中辐射带动省内其他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各省相对欠发达地区既可以借助高速化的交通网络和智能化的互联网络承接发达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更可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发挥各自优势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激发内在活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递增性比较优势，增强“反虹

吸”功能，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崛起步伐，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塑造新优势。

最后，中部各省在谋划“十五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打造国家战略腹地。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在为“十五五”规划作前期研究，从国家的区域战略层面看，“十五五”期间国家不太可能出台新的重大区域战略，而是加强现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的融合推动，特别是在有多个重大国家战略叠加的省（区、市），更要突出重大国家战略的联动实施、深度融合。因此，中部各省在谋划“十五五”规划的前期准备中，应充分考虑如何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包括找出在融合中有可能进入国家战略布局层次的重大项目、工程、试点、枢纽、平台等，争取国家更多的支持，更快、更好地把中部地区建成国家战略腹地。

***基金项目：**本文为合肥市2023年度“省市领导圈定课题”（SQKT2023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必定，男，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合肥 230051）。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崛起： 成效、重大意义与路径

陈耀

从21世纪初至今，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已20年。作为区域总体战略之一，中部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为新时代中部崛起把脉领航，赋予新使命，部署新任务，中部地区崛起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崛起进入加速度。“加快中部崛起”既有其历史逻辑，又有其底层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学术界面临的全新课题。

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背景与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沿海地

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显现，东部沿海率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快速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日趋扩大。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1999年中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从全国版图来看，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已覆盖了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尚属空白；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尚未纳入国家战略的中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处于全国的底部，对此学术界将其概括为“中部塌陷”。

为改变这种格局，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4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简称“三基地一枢纽”)，并出台了36条政策措施。这样，为逐步解决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十一五”初，国家逐步形成了国土全覆盖的、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成为我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中部崛起工作。2012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长沙座谈会进一步强调了中部地区在全国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并提出了“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的使命任务。202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始终紧扣中部地区作为我国“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着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成效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20年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快，成效显著，尤其是近五年来，中部区域经济总体平稳，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明显改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中部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但同时也

面临不少困难和新挑战。

(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取得的成效

1.经济增长平稳较快，占全国份额明显提升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差距缩小。2023年，中部六省地区生产总值是2003年的10.4倍，增长速度快于全国，也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由2003年的18.8%上升至2023年的21.4%，而同期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23年中部六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序前十名的分别是河南(5.91万亿元，居第6位)、湖北(5.58万亿元，居第7位)、湖南(5.0万亿元，居第9位)，属于“经济大省”。近20年在全国排序进位最多的分别是湖北(前进5位)、湖南(前进4位)、安徽(前进4位，居第11位)、江西(前进3位，居第15位)，只有山西退位(由第16位退至第20位)。

2.创新发展动能增强，产业基础结构改善优化

中部地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不断加强，产业基础持续改善，产业层次持续提升。2023年，全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39%，比2003年降低6.3个百分点，而中部第二产业占比保持稳步提升，目前六省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成果亮眼，比如湖北武汉光谷，聚集了1.6万家光电子信息企业，产值规模超5000亿元；安徽合肥声谷，入驻企业超过2000户，年产值超2000亿元，形成以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中部重视搭建高等级创新平台和载体，正在推进12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重组40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并在量子通信、自主安全计算机、工业母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安徽的汽车、湖南的重工、湖北的电子、江西的航空、河南的农机、山西的煤机，都在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网络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3.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升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大江大河中游，也是我国生态重地。近些年认真落实长江和黄河流域保护和生态治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部地区正实现绿色崛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积极参与长江大保护，大力度治理沿江工业污染，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落实生态保护补偿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河南、山西深度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近五年,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升,鄱阳湖、洞庭湖总磷浓度较2018年下降均超过20%,2023年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水质均达到Ⅱ类及以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完成植树造林4769万亩、防沙治沙和石漠化治理1210万亩。这一系列举措增添了中部地区“含绿量”,中部地区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

4.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内陆开放迈出新步伐

中部地区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建设的新路子,为中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特别是依托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倒逼改革不适应开放发展新要求的体制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河南郑州获批国家首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面对新的进口模式,关口如何开、关务怎么建、税收怎么征,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郑州用好改革创新这把“万能钥匙”,抽丝剥茧解决了上千个难题,在全国首创“1210”海关监管模式,现在河南跨境电商通关每秒超1000单,进出口货值从2015年的不到400亿元,发展到2023年的2371亿元,年均增长25.5%,成为跨境电商的“制度创新高地”。同时河南积极打造“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通达天下,其中郑州航空港已成为我国中部航空货运的重要集散地。湖北打造国际化数字化营商环境,跨入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阵,自贸区2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推广;江西在全国首创“跨省、跨关区、跨陆海港”通关新模式,出口通关效率全国第五;湖南创全国之先,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开启对非新型易货贸易试点。

5. 优质公共服务增多,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

中部地区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断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厚植民生福祉,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共享发展成果。近五年,中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6万元增加到3.3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和高水平医疗机构建设,目前中部地区三甲医院数量约占全国的20%。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借助5G

技术开展远程数字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下沉;河南推动解决百姓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等。随着各省公共服务和就业保障水平的提高,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者回流。

(二)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新形势下,中部地区崛起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部经济增长受外部需求影响下行压力较大。由于国际经济复苏乏力,通过东部沿海传导至中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新问题。中部很多企业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商,受国际市场影响大量来自海外的订单锐减,加之部分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使得中部很多关联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部分所谓风口行业,大家一哄而上,产能快速饱和,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受此影响,中部有的经济大省经济增速较长时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人均GDP比较,中部总体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发展差距。

二是中部地区普遍创新能力不够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较慢。部分科创资源相对富集的城市,前沿应用性成果少,且成果不在本地转化,对当地产业引领和带动作用不强。尤其是在聚集国内外高端科创资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以及重大创新平台布局上,中部地区显得十分不足,有半数省份科教资源短板长期难以补齐。

三是中部地区内部分工协作弱化,产业同质竞争、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省际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和壁垒,统一大市场建设任重道远。中部六省地理区位相连,而产业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省际竞争大于合作,缺乏权威有力的内部协调机制。

四是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净流出现象突出,缺乏能级高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辐射带动。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10年中,中部六省人口净减少最多;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部人口占全国比重为25.83%,与2010年相比,下降0.79个百分点。根据2023年各省统计公报,中部六省均处在全国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中。

此外,在培育市场主体、改善营商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总体上看,中部地区面临着追赶和转型的双重任务挑战,既要继续加速发展,做大规模总量,缩小发展差距,也要继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双重目标。新时代加快中部崛起,需要在全面总结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好各种困难和挑战。

三、深刻认识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重大意义

推动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以往的“促进”中部崛起转向新时代“加快”中部崛起,我们需要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深刻认识新时代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意义。中央突出强调“加快”,不仅反映了推动中部崛起的极其必要性,更体现了当下中部加快发展对国家发展大局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构成了当前加快中部崛起战略的底层逻辑和现实逻辑,其中底层逻辑来自中部地区在全国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而现实逻辑主要来自国内外形势变化使得中部地区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出全局性和战略性。

中部六省面积合计102.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10.7%,2023年常住人口规模3.6亿人,占全国的25.5%,地区生产总值26.99万亿元,占全国的21.4%,中部以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空间经济产出大、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理位居中,交通四通八达,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综合物流成本低的区位优势。中部地区人口众多且人口密度高,人口数量比美国多3000万人,是日本的3倍,可以说不仅人力资本存量,而且自身内部市场规模大、消费潜力大。中部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产业技术基础相对雄厚且产业门类完整、配套能力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国际上出现

“逆全球化”、脱钩断链、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科技、贸易和产业极力打压,加上欧美国家高通胀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从国内来看,尽管我国经济恢复较快,但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持续稳定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作为主要动力源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受外需不振的冲击较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风险增高。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下,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产业技术基础和内需市场潜力,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正日益凸显出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深刻领会和认识党中央关于加快中部崛起的战略意图和重大意义,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中部崛起有利于增强中部“三基地一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必须始终紧扣中央赋予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才能提升其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功能作用。目前中部省份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稳步推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完善,但是继续巩固和提升其功能仍面临不少短板,必须加快锻长板补短板强功能,以更强的动能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

第二,加快中部崛起有利于推动中部经济高质量快速增长,提高我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近些年中部各省着力高质量发展,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但也面临不少困难,经济增长新动能不足,有一半的省份的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落后西部一些地区,有形成新“塌陷”的危机。因此,加快培育中部地区新增长动能,尤其是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带动作用,尽快推动中部崛起,对于促进东西融合、南北对接,减少东西部发展和南北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十分重要。

第三,加快中部崛起有利于发挥“中枢”支撑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国内外变化新形势,中央做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在新发展新格局中,作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中部地区无疑具有“中枢支撑”的重要作用,加快中部崛起就

是要保障大循环的畅通,避免出现“堵点”“断点”,扫清“肠梗阻”,这不仅要体现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和韧性,因此中部加快崛起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保障才更加有力。

第四,加快中部崛起有利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之后加上“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02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把“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作为新年重要任务之一。这意味着国家未来在重大生产力优化布局上将更加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我国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重大举措。中部地区地处战略腹地的核心,加快中部崛起对于维护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作用。

四、推动中部更高起点加快崛起的 总体思路和路径

在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的战略意图和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审议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相关部门和地区细化实化各项任务,清单式扎扎实实推进落实。同时,中部地区要有加快崛起的“机遇意识”“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担负起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和历史责任,推动新时代中部地区更高起点、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实现崛起的目标愿景。从实现路径上,关键是加快提升中部地区的六大能力。

第一,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地区科教资源总体不足且分布不平衡,要加快补齐科教短板,争取更多国家级科创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和“双一流”高校建设。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围绕国家需求和各省优势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突破,科创力量相对较强的湖北、安徽、湖南,要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导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更多高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区域内转化。

第二,加快提升基础设施“中枢”支撑能力,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发挥中部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提升织密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有序承接国外和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引领作用,加强各个都市圈之间的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设,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促进要素高效自由便捷流动,提升区内外协同发展水平,更好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

第三,加快提升内陆开放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互促进。对标国际和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复制沿海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围绕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先行先试创新探索推出更多制度性改革措施。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为,推动要素资源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积极帮扶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局。

第四,加快提升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加快建设美丽中部。中部也是我国生态重地,各省分属长江和黄河两大江河的中游地区,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江河保护法和相关政策措施,增加各种有效的防污设施和监管手段,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提升江河流域、大气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能力和协同保护能力,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中部各省区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不断探索完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保护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第五,加快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能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城乡二元化仍然十分显著,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加快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能力,无论对于推进中部地区现代化,还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均有重要意义。要按照国家的部署,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尤其是加强县城和中心镇的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设施、生态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乡村环境整治,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民支持制度,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

壮大县域各具特色的产业支撑,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动能。

第六,加快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中部地区担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安全保障的使命责任,要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升煤炭、稀土、有色金属等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特别是增强煤炭等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注重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的安全来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的发展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作者简介:陈耀,男,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86)。

新时代中部地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提升我国安全发展能力*

秦尊文

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要求中部地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要认真学习座谈会精神,正确把握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提升我国安全发展能力,以中部一域之稳保全局之安。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之于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必

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科技自立自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坚定不移地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不断提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实力。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坚定创新自信,以科技创新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更强国际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一、中部地区肩负科技创新和保障国家安全重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中部六省考察,就发挥科教优势、加快科技创新、强化自立自强、保障国家安全等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殷切希望。中部地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把中部地区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首先,这是充分利用科教资源的必然要求。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合肥、武汉分别获批建设国家级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一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中部地区有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拥有院士200多名,其中湖北81名。研发投入也较多,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布的R&D经费投入,湖北、湖南、安徽分别以1254.7亿元、1175.3亿元、1152.5亿元进入前10名。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明确要求,把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产力的优势;同时强调,要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辩证关系,既要紧盯经济发展新阶段、科技发展新前沿,又要坚定不移把破除旧动能作为增添发展新动能、厚植整体实力的重要内容,积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其次,这是中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二选择。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创新馆参观考察时指出,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最后,这是中部地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指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新动能。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中部各省要贯彻中央决策,加快将科技、教育、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势,为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和人力资源。

2.中部地区要加快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央对中部地区的明确要求,

而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习近平总书记对武汉、长沙等城市的科技创新成果给予肯定,对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武汉要发挥领头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武汉考察,他指出,我们国家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才能做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要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如果我们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每一家科技企业、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

中部地区省会等中心城市要发挥主力军作用。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在全球百强科技集群中,武汉居第13位,在进入百强的中国城市集群中居第5位,仅次于深圳—香港—广州(百强第2位)、上海—苏州(第5位)、南京(第11位),中部地区进入全球百强的还有:长沙(第37位)、合肥(第40位)、郑州(第75位)。这些中心城市要勇挑重担,发挥主力军作用,为中部地区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要发挥生力军作用。202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考察时,来到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研发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是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在这方面都可以大有作为。

3.中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中部地区创新发展要素加快集聚,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17.8%。站在新的起点上,中部地区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首先,要以科技创新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2020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称赞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研制的“手撕钢”,

并对企业发展寄予厚望,产品和技术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在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其次,要推动数字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强调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又在南昌指出,接续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最后,要在制造业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指出:尽快改变“卡脖子”问题。装备制造业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心脏。心脏不强,体量再大也不算强。要加快在芯片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重点促进河南食品轻纺、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被中央明确定位为全国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的中部地区,要为稳住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作出更大贡献。

4.“中部粮仓”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

古有“湖广熟,天下足”,而今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部就有5个: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中部六省粮食产量长期约占全国的30%,可谓“中部粮仓”。

首先,依靠科技兴农、发展粮食生产。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北鄂州杜山镇察看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验基地,当朱英国院士汇报其团队培育的杂交稻良种推广种植面积已在亿亩以上时,高兴地说:“感谢你们作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靠自己。”

其次,粮食生产是王牌、不能丢。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告诫中部省份要高度注重粮食生产。如对粮食大省河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这一目标和任务,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河南农业农村人口比重大,“三农”工作任务繁重,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最后,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常德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考察时,了解到大学毕业回乡青年用新的理念和技术使早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1152.3公斤,看到种粮大户院子里农用机械包括喷洒农药用的无人机等一应俱全,他非常欣慰,并告诫:“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们14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生活好了,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在2024年3月20日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抓住种子这个要害,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种业、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同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是我国的“三基地一枢纽”,其中“三基地”是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一枢纽”是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这个定位一以贯之,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放在“三基地”之首,充分体现了中部地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上的重要地位。

二、以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安全

把安全发展贯穿中部地区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确保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筑起保障国家安全的长城。

1.中部地区要加快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底气

要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搭建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平台。依

托国家在中部地区设立的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优化发展定位和布局,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关。加快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洛阳农机装备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新培育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各城市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双创示范基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协同。联合区域创新资源,实施一批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跨军民、跨条块整合优势资源和力量。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布局建设一批综合性中试基地,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专业中试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多鼓励原创技术创新,依托现有国家和省级技术转移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建设中部地区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推动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支持有条件地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规律,结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选择具备条件的城市和区域打造国家产业备份基地。发挥武汉、合肥、长沙、郑州、太原、南昌等中心城市的科技辐射带动作用,推广实践“研发在中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模式。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流研发机构,不断提升技术创新、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布局能力,塑造更多引领型发展。

2. 中部地区要打造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国家产业安全韧性

聚焦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继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坚持区域协同融通发展,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首先,打造高端装备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合作发展航空专用装备和航天专用装备,推动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合作发展智

能制造装备,推动湖北、湖南合作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推动湖南、安徽、湖北、山西合作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推动湖南、安徽合作发展工程机械产业。

其次,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壮大湖北、河南光电子信息产业;支持安徽、湖北发展新型平板显示产业;支持武汉、长沙建设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中国软件名城,支持郑州、太原创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再次,打造现代生物产业链供应链。依托武汉、郑州、长沙、南昌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合作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推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合作发展生物农业产业,积极发展食品工业精深加工和生物制造产业。发挥各省中药材资源丰富的优势,擦亮“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品牌,发展现代中药产业。

最后,通过省际合作打造更多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推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合作发展以信息材料、储能材料、生物医用和环保材料为主的新型功能材料,推动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等发展先进结构材料,共同打造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重点发展高效节能、资源循环利用、先进环保装备,共同打造节能环保产业链供应链;重点发展核能、风电、智能电网、页岩气、太阳能光伏、氢能、生物质能源,共同打造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重点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共同打造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3. 中部地区要积极应对大数据时代风险挑战,保障国家网络安全

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设在武汉的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是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学院+创新产业谷”基地,早在2020年就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的网络安全学院入驻。以此为依托,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助力国家提升网络安全产业综合竞争力。采取网络零信任防御体系系统,坚持“永不信任,持续验证”的安全原则,对目前复杂网络系统的身份、设备、应用、数据等进行综合防护,确保网络服务的安全可靠。同时,要为中部地区和全国培养更多网络安全人才,为国家打造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

不仅要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还要保障网络信

息数据的安全。鉴于数据信息安全关乎国家、企业、个人的安全性和社会的稳定性,我国将数据看作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视其为国家基础性的战略资源,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对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大数据实验室,探索数据技术的创新发展,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水平的安全技术产品。加大网络安全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防范黑客攻击,为数据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通力合作,健全数据要素市场秩序,规范数据应用和企业发展,建立良好的数字生态体系。

4. 中部地区要确保粮食、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安全,筑牢国家安全保障底线

首先,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优势。中部地区拥有华中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等农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农业科技力量强大。要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稳步推进粮食生产基地和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大宗农产品保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强大中型、智能化、复合型农业机械研发应用。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方式,推广北斗赋能农业。以现代科技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保障粮、棉、油、猪、鱼、蛋、菜等重要农产

品供给安全。

其次,狠抓种子和耕地这两个粮食安全的中中之重。支持武汉“中国种都”建设,支持郑州打造“中部种都”,支持隆平种业等种业高科技企业加快发展。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遏止耕地“非农化”,防止基本农田“非粮化”。对于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应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全面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退化耕地治理等措施,着力提升耕地质量。通过拓宽耕地保护补偿范围和资金渠道,提高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最后,千方百计保障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安全。山西、河南、安徽要进一步提升注重发展煤炭精深加工和相关高科技产业,积极开发新能源,努力降低生产总值能耗。湖北、湖南、河南等做好水电开发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各省有序开发太阳能、地热能等能源,积极发展氢能。支持合肥、武汉“人造太阳”颠覆性能源技术革命。江西的稀土和钨、湖南的锑和锡、湖北的磷和硅、安徽和河南的硫铁矿和钼、山西的铝土和镁等矿产资源,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地位,要纳入重要原材料安全确保范围。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22ZD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秦尊文,男,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湖北省区域经济学会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汉 430062)。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河南实践

杨兰桥

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一员,中部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河南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抢抓战略机遇,统筹谋划战略考量,围绕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创新驱动、重大基础设施配置、生态环境营造等重点领域前瞻思维、

抢滩布局、锚定目标、全力突破,在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粮食产量、人口数量、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双创市场主体数量等多项指标上实现了新突破,引领中部崛起迈上了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在更高起点上

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新形势、新部署、新要求,聚焦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的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问题,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顺应新的形势抢抓机遇,聚焦新的任务率先突破,抓住关键环节乘势而上,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引领新时代中部崛起再上新台阶。

一、中部崛起二十年河南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河南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与成效。

1.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从经济总量指标看,河南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8411.2亿元跃升到2023年的5.9万亿元,20年增长了6.2倍。从生产效率看,河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9047元提升至2023年的60073元,20年增长了6.6倍。从财政收入看,河南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04年的428.8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4512.1亿元,20年增长了10.5倍。从国内贸易看,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4年的2808.2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26004.5亿元,增长了9.3倍。从农业生产来看,在中部崛起20年中,河南更是一直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事”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近年来河南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585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76%,居全国第2位,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河南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现代食品产业集群规模超过万亿元,高质量发展的农业支撑不断巩固。从企业发展来看,河南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23年底,河南省市两级监管企业资产总额5.8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348.6亿元,同比增长8.1%;利润总额582.5亿元,同比增长60.8%。民营企业在市场主体各细分类型中增速最快,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对外贸易来看,2023年河南外贸总值8107亿元,规模稳居中部六省第一。河南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提升,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从交通发展来看,河南把构建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作为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米字型”高铁网全面建成,郑州机场跻身全球机场货运40强,郑州国际陆港具备年开行万列中欧班列能力。空港、陆港、公路港、水港、口岸衔接融合的多式联运大格局加快形成,社会物流成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区位优势正在转化为枢纽经济优势、综合竞争优势。从城市群发展来看,河南坚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形成了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空间格局。这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充分说明,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正确指引下,河南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势,不断释放发展潜能、激发发展动能,成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

2.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河南始终将打好“四张”牌作为谋划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任务和重要着力点。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3年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9.1:37.5:53.4,全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2022年增长5.0%;分重点产业看,五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10.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8%;传统支柱产业增长1.5%,占规模以上工业的50.1%;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3%,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5.5%;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4.7%,盾构、新能源客车、光通信芯片、超硬材料等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飞速发展说明,近年来河南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破冰抢滩已取得实质成效,大批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行业正在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

3. 创新格局全面起势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应变局开新局、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河南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出台《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关于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加快构建以政府作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

系。自2021年7月以来,河南相继成立嵩山、神农种业、黄河、龙门等16家省实验室;2022年5月,河南成立河南人才集团,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链;2022年,河南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均突破千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超50%;2023年河南全年专利授权量达到109957件,全年签订技术合同2.5万份,比2022年增长11.2%;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367.4亿元,增长33.4%。不断完善的创新环境和持续增加的创新投入,换来的是众多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世界最大直径“高加索号”硬岩盾构机在郑州诞生,数据中心光互连芯片、5G用铜合金材料打破国外垄断,实现进口替代,龙门实验室攻克了电子级多晶硅提纯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河南创新发展已全面起势。

二、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河南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部地区发展已经站到了更高起点上。面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任务,河南仍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挑战,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依然任重而道远。

1. 经济总量出现下滑,经济结构仍需优化

一是从经济总量来看,2024年第一季度河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765.3亿元,相比于2023年一季度初核数据下降了203.6亿元,名义增速为-1.4%。二是从发展速度来看,2023年河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1%,不仅低于全国5.2%的平均增速,更是在中部六省中排名末位。三是从经济结构来看,河南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滞后。不同的经济结构成就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层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不同高度。202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7.1:38.3:54.6,与全国相比,河南第一产业占比虽然高出2个百分点,但农业发展还存在产业链短,增值能力弱、龙头企业缺乏,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农业科技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河南第二产业占比低于全国0.8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偏弱。尽管近年来河南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但工业经济运行还缺乏基础支撑,尤其缺乏价值链高、产业链长、投资规模大的工业大项目、新项目的支撑。河南第三产业占比低于

全国1.2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四是从财政状况来看,河南的财政自给率相对较弱,对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定依赖。河南2023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512.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达2855.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2023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1062.6亿元,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支出比例衡量财政自给率,河南财政自给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其财政自给能力相对较弱。

2. 区域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发展质量仍需提高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河南R&D经费投入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对标同为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和安徽以及东部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区域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2022年,河南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143.3亿元,河南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0%,显著低于湖北(2.3%)、湖南(2.4%)、安徽(2.6%),更远低于江苏(3.1%)、浙江(3.1%)、广东(3.4%)等东部发达地区,资金支持不足仍将长期制约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这一点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上便可看出,2022年河南发明专利授权数为14574件,而湖北、湖南和安徽则分别达到了29212件、20423件和26180件,河南的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和人均数量均落后于对标省份。这充分体现出河南目前科技基础实力还相对薄弱,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还不够,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的排位仍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位。

3. 人口流失严重,老龄化日益加深

河南是人口大省,但由于人均产出相对较低,近年人口出现明显外流现象。根据2023年河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河南常住人口达981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0%,位居全国第三,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河南拥有1.2亿人的户籍人口,可见河南仍属于人口净流出的省份。拉长周期后可以发现,2004—2023年河南常住人口净流入仅98万人,远不及广东的3600万人。虽然河南GDP排名常年位居全国前列,但由于河南人口基数大,其人均GDP反而低于全国人均GDP。实际上最近二十多年,河南的人均GDP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日益扩大,劳动力向省外流出的现象日趋严重。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地区老龄化严重,从常

住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河南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基本一致,也在逐步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8.4%上升至2022年的14.6%,基本与同期全国水平一致。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2030年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到16.1%,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同时,人口外流还会导致人力资本匮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下降,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进而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

三、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河南实现新突破的着力点

新时代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河南实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战略目标需要新思路,必须跳出河南看河南、跳出短期看长期、跳出局部看整体,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依托,坚持锻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强化创新驱动,培育中部崛起新动能

河南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突破应更加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增长,从追求规模走向追求综合效益和结构升级,从追求传统要素驱动转向追求创新驱动。首先,要继续向重点科技领域倾斜,加大资源投入,以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完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为抓手,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研究,不断释放和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盘点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发展情况,明晰其在整个产业链的相对位置,着力筛选出一批真正开展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重点龙头企业,并以创新龙头企业为基础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最后,要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融合联动,通过开展更广泛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重大创新平台资源共建共享。

2. 引领产业转型,打造中部崛起新支点

当前,河南正处于将要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为支撑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攻坚期,也是决定河南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一是要持续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和换道领跑战略,一体推进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以加快建设制造强省为目标,以聚力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现代医药、现代食品、现代轻纺7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先进超硬材料等28个重点产业链为依托,构筑河南产业核心竞争优势。二是要持续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从支持头部企业建设“数字领航”企业,加快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链主”企业建设产业链数字化平台入手,全方位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助力中部崛起取得新突破。三是要持续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保障绿色产业发展具有充足的要素供给,提升工业绿色发展中要素使用的优先级。同时,要完善降碳减污、能耗能效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的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末端高效治理的机制。

3. 做好人才引育,构筑中部崛起新优势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科技水平和发展潜能。河南要继续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做好人才引育工作,打造人才聚集的“强磁场”。首先,要创新引入方式。全方位扩展人才引进的渠道,从多区域多领域引入人才,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强人才引进工作。要建立激励制度,以适当的鼓励政策吸引人才,为外地人才提供充分便利。其次,要创新育人方式。不断优化产学研用生态,聚焦河南重点产业,培育更多高端应用型人才。要全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建设,整合学科资源、优化学科布局,精准培育研究型人才。最后,要创新用人方式。健全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赋予人才更大的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让人才能够撸起袖子敢想敢干,实现人尽其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

作者简介:杨兰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郑州 451464)。

(责任编辑:江夏)

【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专题】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学科性质与 学科体系

孙久文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思想,细化了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中国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中国区域经济学需要在新时代构建一个适应中国区域发展需要的、总结各个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经济学科体系,从而阐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从时代特征看,中国区域经济学具有“新”空间性、“新”功能性、“新”均衡性的学科特性,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包括:区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范畴构成,区域经济学的实践问题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建设。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赋能现代经济体系,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区域发展的新路径,均衡协调的中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导向与机制的转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变。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区域经济学;学科性质;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21-10 **收稿日期:**2024-05-22

作者简介: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6)。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学作为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样进入发展与创新的新阶段。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也同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思想,也进一步细化了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把区域经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何从区域出发构筑大国经济的空间框架,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与学科性质

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与地区发展

结合最紧密、指导地方发展的基础性理论学科。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工业化的应用,21世纪前十年区域总体开发的应用,党的二十大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应用,区域经济学作为区域发展的理论基础,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一)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经济学长期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发展历程和经济建设所赋予的历史必然性。党的二十大提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区域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

中国区域经济学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当前的任务是构建一门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托的中国区域经济学。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体系涵盖中国的区域现代化,需要将中国区域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区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是以区域创新为动力,发挥比较优势,激发各区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这就需要完善区域协调机制,优化区域发展手段,解决重大区域战略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构建一门中国区域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区域现代化十分必要。

第二,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维和新方法。例如,数字化是生产力质变的前提,只用经济活动深度的数字化,由数字化量的积累引发经济系统质的裂变,经济运行模式发生系统性转变,生产力才会发生质变,旧的生产力才会向新质生产力转变。这其中,区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何形成和深化,目前还没有很深入的探讨。中国区域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发展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具有紧迫性,这就需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加持。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很快,既有量的规模扩张,也有结构的复杂变化。以“四大板块”为例,目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都要大于2000年的全国经济规模。而20多年来的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充实了区域的空间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的快速发展。脱贫攻坚是区域发展中必须重视的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区域经济的内容复杂性大大增加。研究中国区域全新的发展模式,需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范式归纳和新方法论的应用。新模式和新方法的创建既有必要性,更有紧迫性。

(二)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要研究中国国土空间系统的发展与协调,把区域发展作为主线,把区际关系研究放到更大区域内来探讨,进而探索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实现充分发展与协调发展的途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就要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出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在区域经济上,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问题,缩小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然而,当前区域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时,出现了瓶颈。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进入区域经济理论体系之后,为区域发展中的城市规模扩大提供了理论解释,却削弱了城乡之间的协同关系,实践的后果是许多地方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当作区域发展的唯一空间路径,城乡差距出现了扩大趋势。其次,区域和城市的异质性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扩大了认识区域发展现状的角度,加深了对区域发展中因地制宜的理解。然而,异质性分析造成对区域整体问题的把握缺少认知,区域发展战略问题的现实基础开始松动。最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引入更多的模型工具,工具的增加使我们认识区域问题更加理性化和数量化。但是,更多为模型而模型化的研究,变成了学术圈子里的自娱自乐,脱离对现实问题的认知,造成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成了两张皮。

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构建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克服流弊,提高学科的理论水准,为解决中国区域发展的实际问题作出贡献。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历史任务与学科性质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区域经济学进入一个以创新促进学科构建的新阶段。从学科性质定位,中国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之上的应用经济学科。

应用经济学科的任务,就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为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一,首次成为统领性的区域发展战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区域发展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一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的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二是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发展。三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四是京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五是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思想,也进一步细化了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可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区域发展的阐述,把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如何从区域出发构筑大国经济的空间框架,从而提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理论上的课题:如何用区域经济学理论阐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所以,中国区域经济学就是要构建一个适应中国区域发展需要的、总结中国各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应用区域经济学体系。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特性与研究导向

区域经济学从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算起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是一门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科。作为古典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区位论解释了农业、工业和城市的空间布局规律。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萨德教授将区位论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学术发展。20世纪6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引入了大量的发展经济学的理念之后,成为不发达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经济体演进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其研究方法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同时开启了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演变的过程。毫无疑问,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起飞中起到的理论基础作用巨大,特别是在地区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可以大书特书。

然而,今天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4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的区域经济,已经接近了发达经济体的边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无论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还是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都无法解释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特

性,探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方向。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特性

1.区域经济学的“新”空间性

任何经济活动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一定的空间中,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子集,天然具有空间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空间产生了若干新变化,这也就催生了“新”空间性。

第一,城镇化革新空间格局。截至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16%,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空间上看,城市和镇区的景观已然成为国家空间景观的主体部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空间结构是“乡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空间结构是“城乡中国”,当前的中国空间结构就是“城市中国”。

第二,数字经济拓展现实与虚拟空间范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伴随创新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拓展,其所涵盖的空间既包含了现实世界,也囊括了包括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平台,区域经济的空间范围也随之延拓。

第三,治理体系优化赋能空间尺度细分。空间尺度细分的现实必要性由来已久。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四大板块”中除东北地区之外的任一板块的经济规模都与21世纪初全国经济规模大体相当,因此细化大尺度区划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行业的国家,大尺度下区域管理的难度与成本较高。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单元亦能不断缩小,并通过在原有大板块和大经济地带范围划分的基础上增加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来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

2.区域经济的“新”功能性

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的总体功能和产业体系构成当中的产业功能。

一是区域经济的总体功能。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定位一般是规定一个区域的区域性质和发展方向。区域协调发展是在综合考察类型区与系统区的空间划分的同时,将功能性延展至生态保护、国家安全等更多领域,从而促使区域经济的功能性向外延展。以主体功能区为代表的类型区是一种静态排列的空间划分,相同类型区内的自然景观和

经济景观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基于这一相似性,可以通过政策来引导同类型系统实现特定环节的优化。系统区划分时并不强求各区域在自然与经济特征上的一致性,更侧重于将区位相近、相互联系紧密的区域作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以期实现特定的区域发展目标,发挥特定的区域经济功能。

二是区域产业的功能结构。由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和基础产业构成的区域产业功能结构,代表了一个区域的功能性特点。主导产业的变迁往往代表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水平的变化。对于一个区域,在工业化的初期,轻纺工业是主导产业;在工业化中期,钢铁、化工原材料工业是主导产业;在工业化后期,汽车、家电等制造业是主导产业;在后工业化时期,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是主导产业。考察中国的区域产业功能结构,由于中国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使中国的区域产业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到后工业化时期都存在,这也正是我们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是中国区域经济新功能性的第一个写照。

3. 区域经济的“新”均衡性

囿于特定的社会与政策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运行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性。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快经济发展,抓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首先集中发展沿海地区,承接国际产业向东亚的转移。中央确定的四个改革开放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等,都是成功的发展案例。在沿海发展起来后,沿海支援内地,实现均衡的发展。1999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区域发展中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努力克服区域发展中的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区域发展的新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例如,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均衡性的重要体现。截至2020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央重点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扶持,使区域发展中最不发达的地区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有效地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

(二) 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方向

1. 中国区域发展历史总结

旧中国的经济布局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很多地方的现代工业是空白的。为改变这种产业布局极端不均衡的局面,从“一五”时期开始,国家就十分重视在内地进行工业布局。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要以内地为中心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伴随着“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等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全国国土上的展开,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中国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导下,空间生产力布局开始向沿海倾斜,形成了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基地。改变这种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状况的主要办法,先是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四个沿海开放特区,继而又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后设立一大批沿海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沿海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2000年,中央率先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规划,沿海支援内地,工业反哺农业,西部地区的发展进入正轨。2002年,中央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开始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扭转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局面。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解决中部地区六省的经济塌陷问题。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入到国家的区域战略当中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正式形成。

2012年之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都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这些战略部署包括: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战略、“四大板块”构成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城市群与都市圈战略等。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形成了区域重大战略集合的战略体系,包括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因此,总结新中国成立75年来、改革开放45年来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总结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2.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归纳

一是要素禀赋理论。中国是一个大国,基本国情是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产业选择的基础是要素禀赋在区域间的相对差异。发现和利用要素禀赋的差异生产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产品,形成优势产业。如果按照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应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入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区域应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理论逻辑,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在相对欠发达地区,需要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找到本身的发展定位,做出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产业选择。

要素禀赋理论要依据中国区域发展的实际具体运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发展的途径,地方政府承担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主体责任,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种模式将会长期运行;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也要求各个地区不可能完全按照本地的意志来安排和发展产业。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区域的开发与发展规划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是与政府规划理论同时发生作用的。

二是区域分工与协作理论。亚当·斯密的绝对分工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分工理论,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划制定和战略实施有很强的解释力。最经典的区域协作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协作作为结合的劳动,“结合的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的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区域重大战略涉及几个区域的协作,比如京津冀,理想的效果应当是 $1+1+1 > 3$ 。

三是规模效益递增的理论。规模收益递增,是指某一产品或行业的净收益的增长速度,超过其生产规模的扩大速度的现象或状态。规模收益递增是现代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需要厘清的是,规模收益递增是如何实现的? 资本的投入

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本,一个是物质资本。投在物的上面,要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这是经济学中的科学规律。投入到人力资本上的资金,由于人本身不断学习,即“干中学”,使能力提升,从而收益一直在递增。

四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是中国区域发展实践中形成与总结的符合中国区域发展实践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强调不同区域间经济的均衡与协同发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共赢发展。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未来30年的核心任务。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中区域发展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面临创新的节点。当前的区域发展理论,包括区位理论、平衡发展理论、非平衡发展理论、输出基础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解释不发达国家如何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到高速增长的通道,进而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并且把引进外资作为最重要的推动发展的要素。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起飞阶段,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特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一部分地区已经跨进高收入门槛,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收入陷阱已经不存在;二是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产业上与发达国家从错位发展转到了同位竞争;三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是区域发展的最佳选择。因此,区域经济理论必须做重大调整与创新,形成适应中国当前区域发展的中国区域经济学。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

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体系,需要防止三种误区。一是把区域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加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案例,这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初步认知,我们应该已经走过了这个阶

段。二是用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来代替中国区域经济学,这些研究报告性质的内容,缺少学科的理念。三是总结某一个特定地区的发展经验,以某一个地区的发展经验来阐述全国的发展诉求,可能会有以偏概全的弊端。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范畴的构成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处于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国区域特点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有待于总结和凝练。笔者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可以分为三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中国区域关系理论和中国区域经济运行理论。中国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以中国各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研究一个区域内部的发展问题。包括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区域发展的集聚与分散问题等。中国区域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基于地域分工理论,以中国多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区际要素流动与产品贸易、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等。中国区域经济运行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循环理论为基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成本与效益关系,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运行。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的管理,区域经济运行应用工具,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等。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实践问题研究

1.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格局的持续优化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应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处理好各区域各板块间的互相关系。具体的战略:一是特殊区域发展战略。包括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特殊区域的发展战略,重点是对口援助,给予这些特殊地区特殊政策,以及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二是经济带发展战略。目前形成国家战略的五大经济带,均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空间中,由相对发达的区域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结合构成。三是城市化带动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四是陆海统筹战略。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就要坚持陆海统筹,即统筹海洋维权与周边稳定、统筹近海资源开发与远洋空间拓展、统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产

业布局调整、统筹海洋经济总量与质量提升、统筹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海洋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

2. 强化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的经济发展支撑体系

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是新征程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强化不同类型战略功能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赋予特定系统区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国家安全等多领域任务,探索地区类型各异的发展新范式,进而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互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3. 完善新型城乡体系和生态环境体系

在新征程上城镇化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源动力,应坚持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实施构建创新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与低碳城市试点等政策,能够有效增进发展动能、强化发展活力、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要不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破解城乡二元分割难题。需要注意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遵循,注重生态环境体系的构建,做到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4. 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新征程上创新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动力。将主要竞争力从以劳动、自然资源为主转向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必然要求。科技创新及其衍生出的数字经济正悄然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科技化与数字化是不可逆的全球潮流。数据这一新要素的加入将革新传统要素市场、改变固有经济发展格局、创新区域发展范式。想要在数字化浪潮中抢占先机,就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区域创新活力,扎实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建设

中国区域经济学要成为高校教学中经济学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要注重中国区域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的提升。重点是区域经济学与中国区域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的联系与区别;要注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但也不能用问题研究代替理论分析。

一是要注重教学体系的构建。重点是本科层面、研究生层面、博士生层面的教学内容的区别,其中引进案例教学很重要。要注重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用模型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计量经济学

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基本的假设要遵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

二是要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中国区域经济学最大的价值在于理论指导实践,但是教学毕竟不是调研报告,不能把中国区域经济学变成“中国区域经济”,也不能把中国区域经济学做成“区域经济学+中国地区发展情况分析与总结”。

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实践探索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其中关键因素包括区域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撑。长期以来,虽然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但并未形成区域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合力。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赋能现代经济体系,需要探索现代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区域发展的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概括而言,现代经济体系应当由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和空间格局三部分组成,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重要支撑,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为制度保障,以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空间格局为重要抓手,这三部分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据估计,中国将于2024年或者2025年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收入的变化影响到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反馈到生产结构的调整。而生产的产品变化,又影响到产业的布局,未来10年将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大调整时期。

一是要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目标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构建以高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具体地,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承担起生产和就业的关键任务,其稳定和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黄群慧,2018);以科技创新为推

动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以现代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提供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管理风险,并促进资本流动;人力资源意味着要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二是要建设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和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形成有效的市场供求关系,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是确保资源分配和经济活动的核心。市场机制需要具有透明度、公平竞争和有效监管,以确保企业和个体在市场上享有平等的机会,鼓励竞争、激发创新、提高效率,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微观主体的活力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同时也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可以通过制定区域政策改变经济社会要素的空间配置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速和效率。

三是要形成均衡协调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其目标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形成整体优化的生产力布局结构的重要手段(孙久文,2021)。区域经济发展应从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性上升为强调区域经济的平衡性与协调性。促进区域战略与城乡发展战略联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办法,不断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开展对口协作与合作,实现城乡、区域间互利共赢发展。

(二)均衡协调的中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产业布局变化导致的空间结构变化的速度加快。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的空间结构,到改革开放形成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三大地带”的空间结构,再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四大板块”的空间结构,以20年的时间为一个周期,又到了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窗口期,需要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展开。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笔者提出的设想是,一个目标、两个

动力机制和三大战略。

实现一个目标。区域共同富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指在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的引领下,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协调、区域发展水平趋近、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适度均衡、人民群众的福祉趋于同质化的动态过程。区域共同富裕与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区域共同富裕是国家共同富裕总体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基础上的理论提升。

培育两个动力机制。第一,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动力表现在人口在居住空间上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消费拉动效应,当城市人口增加之时,对房屋的需求和城市公共设施的需求普遍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所从事的生产部门从第一产业转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效率提升,生产的产品增加,社会生产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动能和智力动能都可以通过培育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发挥。第二,科技创新动力机制。技术进步驱动区域发展,是对传统上依靠低成本吸引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巨大冲击。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从投资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培育现代和未来产业,进一步转变提高技术进步的理念,从引进技术转到引进人才。

落实三大战略。一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二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包括: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是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

空间结构的变化是这一战略的突出标志。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还应当包括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实现区域高质量平衡发展需要有空间基础,各区域空间功能的明晰是区域空间品质优化的标志。区域空间功能的优化表现为空间功能由相对

单一的生产和居住功能向全方位的多功能转化,在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的生产功能和高宜居程度的居住功能的同时,加快提升各区域的国际化功能、文化汇聚功能、智能化功能等,实现区域空间的现代化。因此,空间的细化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现在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and 东北地区的“四大板块”向西部地区分为西北和西南两部分的“五大板块”演化,亦或演化成东部地区分为沿海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的“七大板块”的格局,都是可以期待的。

(三)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导向与机制的转变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区域发展导向转变,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目的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这既是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必然选择。

区域协调发展是对区域发展导向的调整和干预。从新发展理念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第一,以创新驱动区域发展,以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为契机,通过在东部发达地区建设国家级创新示范区等重大创新平台,以东部辐射带动创新资源有效流动,探索促进地区间合作创新的路径,加强区域创新中心与周边城市、国家级创新中心与区域创新中心的创新联系,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第二,以平衡性协调性消融产业发展挑战。鼓励东部发达地区落后产能有序梯度转移,强化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推进产业转移及承接与区域发展能力和发展目标匹配,为相对落后地区提供融入国内大循环的机会。第三,以绿色贯穿区域发展始终。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对传统制造业实行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结合主体功能区制度,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等制定差异化政策。第四,以开放拥抱区域发展的崭新机遇。统筹沿海、沿边、沿江和沿陆开放,构建高水平、深层次、宽领域立体化开放经济体系。特别是推进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庄芮等,2021),重点支持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城市向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开发开放基地,发展建设面向国际区域合作的陆路边境口岸城镇,推进各地区参与全球价

价值链价值创造,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在边疆地区探索建立面向周边国家开放的试验区和先行区,完善口岸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第五,以共享服务各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加大发展薄弱地区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为发展薄弱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城市优质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加大对重点人群倾斜力度。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区域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将会加快。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区域发展上的均衡协调发展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从近年来区域重大战略的增加和加快实施,体现出均衡协调的思想已经落实到区域发展的实践当中。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进入一个快车道。我们当前应用的区域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提出不发达区域迈向发达地区的途径和方法。当我们进入到发达经济体之后,这些理论的适应性就受到了质疑。未来十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建设工程。

经济增长是由劳动、资本的投入和科技进步共同推动的。多年来单纯依靠投资和劳动要素驱动经济发展,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日益显示出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房价高企、民生艰辛等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如果发展的机制不转变,我们就不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个满意的发展态势。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作为支撑。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从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逐渐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要将创新置于战略的核心地位,将科技创新视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区域的核心发展机制。在新时代,高质量的平衡区域发展将依托科技和创新的不断涌现,这包括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多方面的创新。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在科研领域进行更多投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以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从这一点来讲,高质量的平衡的区域发展就是以科技和创新为动力的区域发展。

第二,强化区域政策体系化,提升区域政策的

差异性、精准性与有效性。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存在差异,因此,政策应该更具差异性,以更好地满足各地区的需求。同时,政策的制定应更加精准,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也需要得到关注,政府需要加强政策的监督和评估,确保政策的实施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加大区域功能平台的改革创新,让功能平台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使政策资源匮乏的地区获得更多的扶持。包括建设更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等,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进入中西部地区,推动地区的发展。此外,还可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以便更好地实现政策的传导和资源的流动。

第四,加强区域规划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需要建立稳定的政策框架,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可以通过制定长期的区域发展规划,以确保政策的连贯性,不因地方政府换届造成政策多变。此外,政府可以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定期对区域发展计划进行评估,以便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

(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是全面和具有实质性的。

发达地区由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是结构转变的重要目标。但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削弱工业经济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工业经济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产业,也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领域。因此,这个转变应当是渐进的、扎实的,更需要坚持高科技产业、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并重发展,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快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和质量,增强其对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高质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对工业和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和融合作用。

实现经济结构的部门优化,提高产业部门的创

新水平,推动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提升各产业部门中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增长的比重,真正实现靠人力资源和技术投入推动产业部门增长而不是仅仅靠投资拉动增长。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提高部门间的协调性和互补性(孙久文等,2022),促进部门间的技术转移和创新溢出,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竞争力。通过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形成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组织形式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需求等,增加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过程中,在肯定梯度推移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辽中南国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避免重犯生产力重心“跳跃式西移”的历史错误。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R].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6.
- [2]樊杰,王亚飞.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地理,2019,39(1).
- [3]孙久文,蒋治.“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展望[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2).
- [4]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1).
- [5]李兰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与理论解释[J].经济动态,2020(1).
- [6]董雪兵,李霁霞,史晋川.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J].区域经济评论,2024(3).
- [7]张可云,杨丹辉,赵红军,等.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J].区域经济评论,2022(3).
- [8]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J].齐鲁学刊,2022(3).

The Discipline Nature and Discipline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s unde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un Jiuwen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s needs to build an applied regional economic discipline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need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law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various stage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has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new" spatiality, "new" functionality, and "new" balanc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clud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theoretical categories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the study of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ower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regional economic practice fac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uld explore the new path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syste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plore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medium and long-term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mechanism fac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fac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Discipline Nature; Discipline System

(责任编辑:平 萍)

【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

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范式变革的 内在逻辑、关键问题与战略重点

张大卫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引,成为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展开理论探讨及实践创新的热点。新质生产力是通用目的技术全面创新的产物,它汇聚了技术迸发的巨大能量,是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的发展范式变革,从根本上体现着发展逻辑的转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构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基础,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发展、开放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培育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要把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重点,要高度重视平台经济高效、公平配置资源的作用,要以新产业生态圈的营造培育创新能力,要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供应链体系。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论;战略要点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31-08 **收稿日期:**2024-04-25

作者简介:张大卫,男,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家(北京 1000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而高质量发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要汇聚力、形成共识,更要解决好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发展动力与发展重点的问题。鉴于此,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强劲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有三重意义:一是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是党中央敏锐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后做出的历史洞见。二是通过定义新质生产力的质态、标志、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可以看出它与历次工业革命一样,有自己特定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规律,其运动和发展的结果,将深刻调整、改变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三是按照实

践第一性的认识规律,新质生产力丰富而活跃的实践,会在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同时,为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注入更多的思想能量。

一、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

劳动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作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受种种因素影响,生产力在各领域、各区域的发展并不平衡。生产力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谓落后生产力,一般是指在传统文化、文明状态和生产方式下,使用陈旧技术进行低效生产活动的的能力。所谓先进生产力,通常是指具有时代特征、面向未来、对生产和人的长远发展具有较强推动作用的物质生产能力。相较于落后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特点是当人与生产资料

结合后,会获得较高的效率,包括高效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创造出具有较高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关键,是它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吸纳科技进步成果,不断提高劳动者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并推动生产关系不断改善。人们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知,也是循此规律而来。

在先进生产力中,一些处于科学创新前沿的、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新技术,往往具有亟待开发的深厚潜质和充沛的发展活力。先进生产力一经激发并与社会生产活动紧密结合,就会如火山爆发般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带动更多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从而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强大的引领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如今的数字和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迅猛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现象。

分析以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活动如何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1.新质生产力是通用目的技术全面创新的产物

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微弱而缓慢。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蒸汽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短短几十年便催生了大量工厂,促进了铁路的修建,迎来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大规模运输时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人类又因电力及内燃机技术的应用,进入到一个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期。马克思曾经预言:“蒸气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个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果然不久,这些关键技术的普及应用即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和社会领域,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

经济历史学家加文·赖特把蒸气、电力、内燃机等“对经济体系很多部门都有着潜在而重要影响的深刻思想和技术”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在技术族群里是“关键少数”,但它是一切新技术的根和基础,它以自己的普遍适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特征,带动了一个时代的技术变革。在新科技革命大潮下的今天,引领科技变革的数字与智能技术、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绿色与低碳技术等,也正迅速向各产业部门与社会领域覆盖,并通过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创新,不断催生新的技术与新的产业。因而可以认为,它们就是正在不断创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技术要素,必定会为经济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

2.新质生产力汇聚了技术迸发的巨大能量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重大技术创新及在应用环节的突破节奏不断加快。我们所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已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呈现质量、速度成倍数增长的态势。至于众多的技术裂变、涌现、复制、扩散、递归、迭代现象更是令人惊异。如今它们被广泛用于不同的实践场景,使产业创新呈现勃勃生机。如生命科学技术在基因编辑与测序、细胞治疗、合成生物等领域的突破,为人类健康带来令人鼓舞的前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多元化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能源、交通、通信、网络、材料等领域实现了跨技术、跨产业融合,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智能、安全、环保、高效的新汽车产业体系。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现代数字及通信技术发展而来的智能技术,在摩尔定律(计算机性能呈指数级增长)、新摩尔定律(技术快速迭代,成本快速下降)、赖特定律(产量翻番,成本下降)等规律的作用下,以及算法、算力、大模型技术及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正通过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行动能力的培养,逐渐形成一个与人的智力、情感紧密关联的新智慧世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未来产业族群。这些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集中的爆发与突破,为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3.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一种成熟经济的长期增长,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不断进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质量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更有赖于科学技术发挥重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它深刻反映着要素质量、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企业与社会组织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活动起着支配性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又被称为“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因有三:一是具有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二是通过要素重新组合提高配置效率,三是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动力机制。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大幅减少了生产中的物质投入,大幅提高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素质,使三者的结合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技术和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与数据,也成为生产要素而全面进入生产过程,这种活跃的新要素的加入及其重新组合,大大提升了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发展质量的跃升。

当前,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各种困难、挑战、矛盾叠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其实,这是任何经济体都会面临的挑战。任何经济体的增长曲线都会在达到峰值后,滑过抛物线顶点再归于平缓、下降甚至消失(查尔斯·汉迪,2017)。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在第一曲线下落和消失之前,找到一条新的增长曲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可通过培育第二增长曲线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又可通过由它顶托第一增长曲线,延缓其下降节奏,促使我国经济平稳转型,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4.新质生产力是产业变革与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义,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当代先进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新技术应用和基础性技术革新固然重要,但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仅是停留在动力、材料、主机、系统、工艺层面的改造与革新,也不仅是由新劳动者、新劳动工具、新劳动对象和新基础设施组成一个新的经济单元。它的本质是通过深刻的产业变革实现全面的产业创新,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是以新发展理念厘清发展逻辑、重塑发展模式,是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积极调整。

产业变革通常是技术、环境、制度、管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首要因素还是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对社会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与重塑。马克思说:“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量上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技术支撑的先进生产力作用于企业生产过程,会推动劳动分工的改变。专业化、生产协作和新技能的要求,会对企业的劳动组织、工艺流程、要素配置、供应链、产品结构、管理水平等产生深刻影响,从而由微观经济层面产生强大的升级动能。培

养企业的内生动力,正是我们提倡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主要目的。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了众多的新就业岗位,把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和信息作为主要的生产经营要素,对人才、创新能力、发展环境、产业生态营造和供应链体系的要求与传统产业大相径庭,过去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投入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发展逻辑已经改变,市场经营主体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范式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支持。

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还创造出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产业形态。它在促使企业、市场、政府结成新生产关系的同时,还具有了一定的公共属性和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定会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形成造福亿万民众的巨大红利。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范式变革

区域经济是劳动地域分工的产物。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区域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导致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力空间分布。区域经济发展中,遵循地理空间要素聚集与配置的一般规律,尽力使空间结构的各主要条件与技术、劳动力、资本、生态、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最大化,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区域竞争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思想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富有创造力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既鲜活生动、又成效显著,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式的进步。

由于我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别很大,市场发育程度、经营主体活力及政府作用的发挥也很不平衡。为改善区域要素条件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跨越或追赶式发展,人们需要通过不断改革、开放、创新来寻求突破,也需要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厘清指导思想和理念,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变革与创新,是当前最突出的两大时代特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流动,有利于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利于科技的全球性扩张,有利于通过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提升区域和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科技革命引致的产业变革和产业创新,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使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带动了众多业态的转型升级,并将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在内的各种经济体系进行深刻而持久的改造。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既是这场产业革命的动力,也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基于对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与认识,为顺应时代变革和中国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统领经济工作的“指挥棒”和“红绿灯”。

新发展理念的确立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推动产业变革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演变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范式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物质基础。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范式的更新,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众多领域正全面加快。如中国实行能耗和碳排放“双控”、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区域经济增长已进入到以绿色低碳发展为主要路径的新阶段。必须将物质生产及消费行为建立在尽力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共生共存的基础上,使人与社会、自然融为一体。

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在产业部门的广泛应用,使数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无论是在新业态还是在传统产业的产品中,都附着了大量的数字服务与数据要素。这些服务及数据,既是生产和交易的手段,又是生产与交易的对象。它以技术属性促进了生产社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以价值属性参与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特别是它以源源不断产生的数据,作为新一轮经济活动的资源,打破了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ChatGPT、OpenAI、Sora等技术的应用效果,更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特性复杂的一面,这使我们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面临

重大挑战。如何建立算力、算法、大模型等底层技术框架,如何做好新基建,如何提供环境保障、创新应用场景,如何进行制度规范以促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健康发展,都是区域经济应面对和研究的新课题。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为历次产业革命概括了五个特点,即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新生产工具的出现与运用,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效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五个特点,也是区域经济面对产业变革推动产业创新时应遵循的大逻辑和坐标系。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有的区域经济理论在揭示区域发展本质与规律、反映和指导发展实践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其理论框架与基本内容仍反映的是工业革命时代特征与一般规律。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当下,区域经济急需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

区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产业是区域经济的核心,而技术进步推动下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灵魂。推动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变革,首先要补上对产业经济研究不足的短板。把对空间结构的研究与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协同、产业组织、产业聚集、产业配套等产业经济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还需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技术经济研究范畴的内容。

新质生产力推动的发展范式变革,从根本上体现着发展逻辑的转变,体现着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环境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应顺应这一进步,及时正确地反映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以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创新,指导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基础,还需重点关注创新发展、开放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几个问题。

1.创新发展是推动区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基础

在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使技术进步及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熊彼特)。”这些理论观点对我们在区域经济概念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仍然适用。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新质生产力质态的重要标志。区域经济理论急需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强化创新是区域增长主要动能的理念,借鉴“新生产函数”的概念,把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培育形成区域创新动力机制和创新生态、创新业态,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产业组织创新等作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内容,为促进区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

2.开放与协调发展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空间

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条件限制,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功能与经济内涵的互动关系,强调资源在相对稀缺假设下如何配置,强调比较优势构建和区域间协调互补发展。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企业有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包括科技在内的各种资源要素的可能;二是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使众多的区域及企业全面融入了国际产业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体系;三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市场间要素流动加快;四是信息的资源化,改变了人们对资源属性的判断,数据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其丰富性无可想象;五是数字化平台成为高效配置市场化资源的重要手段;六是通过快速交通发展和数字化网络空间的出现,为区域经济在更大尺度空间推进经济布局、实施区域规划、配置要素资源创造了条件,也为跨区域和大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拓展了区域发展空间,破除了旧有的理念约束,改变了发展逻辑,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也对区域经济相关理论的创新,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3.绿色发展新理念改变了区域经济发展逻辑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

必须更多依靠技术与知识投入谋求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不能再以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多消耗能源、土地及矿产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在这一转变中,生态环境作为要素资源,其稀缺性特征更加突出了,环境承载量(即环境容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而碳汇能力也将会成为平衡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手段。这些新的考量既建立在我国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的基础上,又建立在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表征的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变革的条件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应全面适应这一变化,贯彻绿色和低碳发展理念,构建能指导区域转型发展实践的理论体系和评价体系。

4.共享发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公平竞争

共享发展是包容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共享发展,以技术进步的成果为人类造福,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也是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区域利益共享创造了条件,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带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红利的普惠化,技术进步及推动生产关系调整使广大中小企业受益,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区域竞争环境趋于公平,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为增进居民健康福祉做出贡献,绿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代际公平创造机会等。但如同任何新技术形成生产力后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新质生产力发展若不以共享为目的和前提,就会加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造成新的不平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包括区域经济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挑战还有很多,如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合理经济规模问题、数字鸿沟和平台垄断问题、信息资源化问题、智能经济与劳资关系问题、生物技术与生命伦理问题、跨国要素配置的统计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理论问题厘清,并在实践中施之以制度、政策的安排,以克服和纠正生产力发展中的偏向性。

四、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革命引领的产业变革,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重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造与重塑。近年来,新质生产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中,在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受各种条件制约,各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不少地方在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供应链及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人才资源保障、政府管理创新及制度环境与政策配套上仍存在明显的短板,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不顾条件盲目发展的苗头。

习近平总书记对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抢抓机遇、提前布局,又要防止出现一哄而上和泡沫化的偏差提出了明确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需要一个遵循规律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地以“换赛道”和靠一蹴而就的想法去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战略、新任务,要将其培育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拓宽认知域及具体施策上,需不断探索,才能走出一条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路子来。

1.把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重点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现有经济体系和生产秩序的挑战与冲击,首先表现在就业上。目前,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供需结构不匹配及智能化产生的大量就业替代现象。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生产与就业的矛盾时,提出了机器与工人竞争并置工人于“失业边缘”的问题。1930年,凯恩斯也发出过技术进步将造成普遍失业的警告。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机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对就业岗位替代的矛盾将始终存在。我们面临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前景,会替代很多体力、智力甚至情感的劳动岗位。麦肯锡研究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4亿至8亿人的工作因人工智能发展而发生变动。

目前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的替代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城乡居民福祉。所以经济社会发展仍要坚持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区域发展中要把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作为重点,对一些

吸纳就业人口较多的传统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给予必要支持。同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加强对就业人口的再学习与再培训,培养其可迁移、转换的学习与工作能力。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技术进步虽会使一些就业岗位消失,但其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和岗位可能会更多。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调整人力资本结构,特别是要加快教育知识资本、技术知识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促进教育转型,持续提升教育资源质量,优化教育结构,注重适用型人才和青年一代创造力的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重视平台经济高效、公平配置资源的作用

产业组织变革是产业变革的重要内容,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发展催生的数字化平台,已成为企业间信息交换、竞争与协作、供应链网络联结的主要工具与手段。在平台上,企业间形成了新的市场关系,政府和社会提供管理与便利化服务,使它成为了一个新的产业组织。在强大功能支持下,它还可以突破空间与制度壁垒的限制,形成国际化和跨区域市场。通过联通消费与市场、虚拟与现实、现在与未来,塑造出数字化的新生产关系。平台还深度介入人的消费行为,通过收集处理社会信息生产大量新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

平台的优势,一是可大大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促进社会公平;三是政府利用平台和数据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历史学家布赖恩·费根认为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催生一种新的世界体系。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有这种情景,一旦跨过某个关键技术门槛,竞争的环境就公平了,这一规律也适用于区域发展与竞争。平台经济和数字空间的出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公平竞争机会——破除种种条件限制,通过平台聚集稀缺的智力和技术资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同时,通过平台实现内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开放,开展跨境跨区域的经贸合作,可使区域经济加快融入全球市场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通过竞争合作,提升自己的产业素质。

因而,发展区域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应高度重视平台经济高效、公平配置资源的作用,把平台

作为自己的新国土空间,把数据作为自己的新要素资源,利用平台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同时,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各类经营主体通过平台获取更多资源和经营利益,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

3.以新产业生态圈的营造培育创新能力

新产业生态圈是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变革的产物。与传统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不同,它是由众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企业、创新组织、创新人群在线上线下聚集而形成的一个网络化产业生态系统。它像自然生态中的“林相”一样,虽植物种类各异,但互相提供能量与养分,在竞争中形成互助互利、共同进化的秩序和环境。这一产业生态系统,是新质生产力集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既有产业上下游加服务配套式的供应链体系,更是围绕共同价值目标,由科技创新、各类人才、现代服务、配套产业、公共管理、基础设施等聚集而成的多维统一网络。这一网络的关键,是由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业和良好的政府公共管理,共同形成一个特定空间,使所有企业和创新者在这一空间内都可找到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生态位”。

营造新产业生态圈的根柢,在于培育创新能力。为此,一要努力培植区域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掌握和留住能支撑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二要深入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创造。三要增强区域知识产权保护 and 开发利用,注重延揽科技人才和现代服务业人才,形成有利科技创新的小气候。四要激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以各种方式开展国际科技开放合作,使区域的社会创新体系和国际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实现全面对接,形成资源丰富、机制灵活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生态。

4.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供应链体系

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供应链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任务。传统供应链形态受产业链影响,或为垂直分层模式,或是可体现生产流程的直线链式系统。现代产业体系则把它变成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网状结构。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其供应链改变有几种表现:一是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并以数字化平台作为供

应链组织的枢纽;二是将企业外部的供应链管理外包,以提高效率 and 专业化水平;三是担负“链长”责任、处于供应链核心地位的 not 一定是总装厂,而可能是科技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甚至是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生产企业;四是处于供应链主线上的 not 一定是物流,而可能是数据流,甚至数据本身就是产品;五是金融服务、物流集成、产业协同、智力支持成为供应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六是由传统的硬件为主导的供应链,升级成为以软件为主导包括技术、管理、网络等专业化分工合作的融合网状供应链。区域经济在发展中,可充分利用各类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区等重塑新产业供应链体系。

这些变化,在智能产业、数字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技术等产业都有大量表现。如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产,由于汽车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正由传统型汽车制造转向以软件为主导、软硬件解耦的新型汽车制造,其供应链的核心要素,也由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系统转变为以动力电池、电驱动以及操作系统、智能控制、自动导航、定位、图像识别、VR 体验等各种智能网联软件为主。这就要求各地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谋划国土空间开发、要素配置、政策设计、园区建设时,要充分考虑新质生产力聚集与成长的特点,不断创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为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总之,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全面升级,是对传统经济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它既需要我们勇于突破旧思维的局限,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更新,更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同时,推动一系列体制、机制、管理的改革及应用场景创新,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与潜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法]保尔·拉法格,[德]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3][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 [4][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5]李亚楠.马克思分工理论视域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探析[J].学理论,2021(9).
- [6][英]查尔斯·汉迪.第二曲线:跨越“S型曲线”的二次增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 [7]张简.迈向智能经济时代:技术、就业和教育问题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8]黎冲森.以安全韧性绿色为底色,重构汽车供应链[J].汽车纵横,2023(12).
- [9]王战,郭进.人工智能与新一轮科技革命[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 [10]刘冬梅,杨瑞龙,朱旭峰,等.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J].中国科技论坛,2024(3).
- [11]姚春鸽.面向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到底怎么加?[N].人民邮电,2024-03-12.
- [12]张占仓.高质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N].光明日报,2022-11-22.
- [13]李永强.发挥创新主导作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红旗文稿,2024(6).

The Intrinsic Logic, Key Issues,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ing Transforming the Paradig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Dawe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come a strategic guide for national and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hot topic fo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product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which gathers tremendous energy from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paradigm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undamentally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logic. To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p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ultivate the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es with large employment capacity should be the focus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platform economy in efficient and 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should be cultivate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industrial ecosystems, and a new supply chain system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Development Theory; Strategic Points

(责任编辑:平 萍)

【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解析、 困境审视及路径设计

田国强 仇艺博

摘要:“新质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核心要素培育、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场景塑造三大逻辑,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集中体现“新质”变化。数字金融紧密对接生产力变革的各个领域,提供人才、技术、资金支持,打造生产方式新质态、生产流程新质效,推动发展新技术、打造新产业、创造新动能,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当前,各参与方应当注重推进数字金融服务普惠化与差异化,强调创新驱动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政策引领和法规监管对数字金融应用方向的指导规范作用,充分承担参与主体责任,为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数字金融;新质生产力;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39-08 **收稿日期:**2024-05-15

作者简介:田国强,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

仇艺博,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数字金融研究组研究助理(北京 100083)。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特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长期以来在资金供给、资源匹配与资源运用上发挥积极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数字技术催生出的数字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更加重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更具有高效性、便利性和精准性,通过对创新型企业 and 产业前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极大促进了生产要素

变革、科技创新、产业链构建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盘活数字金融资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既是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更是意义重大的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索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现状考量进行实现路径的多维审视,以求为数字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高帆(2023)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生产力要素的产出,比传统生产力更强调要素质量、技术复杂度、产

业结构变迁。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需要科技推动(王大树,2024)、制度环境、人才培养(石建勋等,2024)、科技创新与科技运用,并紧密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张辉等,2024)。数字金融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工具,已经受到学界关注。

1.数字金融赋能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相比传统生产力更加注重创新性,科技含量与信息化程度更高。“新质生产力”概念诞生之前,国内学者已经对数字金融的创新作用进行实证研究。聂秀华等(2021)分析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省级面板数据,认为数字金融可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刘航舶等(2024)探讨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技术创新,且对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王维等(2024)发现潜在吸收能力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提升中起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企业的创新影响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或适中金融监管强度下的企业受益更多。常煜等(2024)发现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西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活动影响显著。

2.数字金融促进企业与产业链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企业适应信息化、数字化趋势,探索新技术、新产品与新管理模式,同时需要建立更具开放性与协作性的产业链。随着数字金融的不断发展,其在企业和产业链发展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齐秀辉等(2024)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认为数字金融正向调节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影响显著。产业链方面,刘伟(2023)发现数字金融通过驱动技术创新间接提高了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集聚和政府补贴三者强化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王文进等(2024)认为产业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产业金融服务融合的新型金融生态,同时提出新时代应当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改造数字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牵引和支撑。

3.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后,学界的研究视野逐渐从创新、区域发展等宏观层面聚焦到新质生产力培育上,从理论视角探究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朱克力(2024)依托科技、产业、金融的循环格局,提出科技金融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牵引和支撑。刘友金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数据要素与稳定发展基础,促进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何秋洁等(2023)认为金融发展可细分为金融产品、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发展,从便捷融资渠道、增加投资者参与等路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机会;研究同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崛起对金融发展有推动作用,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经济业态、新金融模式,从需求端入手,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与金融机构转型升级。

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回顾梳理,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核心要素、实施主体以及主要场景,近年来已经进入数字金融研究者的视野,学者对数字金融及其应用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体系。然而,关于数字金融如何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理的研究尚未涉及。基于此,本文将探讨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

二、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的高级跃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阵地,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把握其内涵特征,通过积极发挥要素配置效应、创新支持效应、资源平台效应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

1.数字金融的要素配置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培育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取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效能。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各种要素的“新质”变化,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知识型、创新型的智力工人,劳动资料是具有数字化、智

能化、虚拟化等特点的新介质,劳动对象是类目多元、虚实共存的新业态。基于数字技术诞生的数字金融,其智能化、动态化、高度开放化的金融生态系统,更加有助于高效地进行生产要素配置。

数字金融通过对劳动者教育、就业与创业全流程的支持,快速培育新一代高素质劳动者。具体来看,一是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教育程度,通过扩展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居民家庭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并因地制宜地提供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居民家庭的教育投入;数字金融服务提升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间接提升政府对教育的扶持;此外,数字金融带来的融资便利促进在线教育、定制教育的发展热潮,从供给侧重塑了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从而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二是数字金融间接提升劳动岗位供给,一方面对于作为就业主阵地的中小企业,数字金融可提供更多信贷便利,进而提升就业市场的企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扩大征信范围、降低借贷成本等手段扶植居民便利创业,同样可以增加就业岗位。

数字金融通过对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培育新型要素,促进劳动资料快速实现变革。首先,数字金融作为数字劳动的一部分,本身就具有劳动资料的属性。其次,数字金融在各产业领域内发挥大数据优势,创造融资与发展便利,加速土地、人力等传统资料向数据、算力等新型资料的转变,推动传统产业中的劳动资料升级。再次,数字金融通过催生出数字化资源与资产,在产业内掀起数字化转型浪潮,相比于传统生产资料,数字化企业对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资料有较大需求。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利好下,数字金融与数字化技术得以催生出物联网、先进制造技术等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实现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变革。

数字金融通过支持劳动对象在产业、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演变,实现劳动对象的效率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产业链企业间、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发生重塑,原有组织边界被打破甚至解构,企业组织更加网络化、产业组织更加虚拟化,产业链更加逆集群化。数字金融基于其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属性,一方面,针对特定生产模式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某特定要素的单位产出能力。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各产业领

域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数字金融还通过人工智能对市场形势和交易信息进行分析,有助于加快技术落地应用速度,提升企业决策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2.数字金融的创新支持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本源需求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最大的特征就是动力源由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变为以颠覆性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这些创新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中的一般性科技创新,而是能够催生新技术、新要素、新动能、新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是源自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原有技术路线的根本性颠覆。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不确定性更大,技术突破方向、技术路线的前沿性、技术商业化的领域及时间均难以预测。数字金融发挥大数据特征,能够有效缓解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优化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客服服务等环节,针对新质生产力全生命周期开展多元化资金支持。

宏观层面,数字金融可以对早期的前沿技术研发、中期的创新成果转化、后期的产业化推广开展不同种类的金融支持,通过赋能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一是创新早期,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动往往是前沿技术“0—1”阶段的研发,回报周期最长、风险最高,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提升风险评估能力,并通过数据价值挖掘和智能决策,提高风险定价效率,提升风险资本投资方信心。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金融平台的应用,海量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有效指导创新主体进行市场导向的创新研发。二是创新中期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此过程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等传统金融工具获取金融资本,众筹、行业基金等新型金融工具也开始进入,数字金融利用算法模型建立高效的业务流、信息流和数据流,将科技成果、经营数据自动加工成“信用”资产,以创新性的数字化融资模式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三是创新后期,创新成果开始实现规模化应用,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企业需要上市等多元化金融服务,数字金融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缓解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融资约束,同时,发挥信息优势,将资金精准对接到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和项目,支持前沿技术产业化应用。此外,数字金融可以弥合区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创

新成果推广。

微观层面,科创型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数字金融运用技术优势,对传统供应链模式加以改造,在征信、抵质押、风险控制等环节对科创型企业展开帮扶,提升金融资本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是在征信环节,科创型企业受限于信任获取、信用传递的过程,长期处于征信的边缘地带。数字金融通过传统金融依赖企业财务数据的信用评级之外进一步挖掘用户社会网络关系等海量非财务数据,缓解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在抵质押环节,科创型企业往往受限于资金规模和经营模式,出现担保物不达标、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等问题,数字金融直接从核心企业处集中获取担保与交易信息,为科创型企业的抵质押物缺陷提供有利补充。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评估企业资产价值,加强企业资产监管,提升科创企业抵质押能力。在贷后管理环节,数字金融可以有效识别、预警科创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风险,高效地对企业进行监督,降低风控成本,加强全过程风控能力,提高金融外部治理的效能。

3.数字金融的资源平台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产业场景的塑造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当“引领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仅正在壮大成为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而且其技术和产品能够推动现有产业部门发生效率和质量的重大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主要产业场景。而数字金融凭借资金获取便捷、成本更加低廉、风险把控精准等优势,能够有效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发展引导,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活力,助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数字金融通过扩大融资直接效应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金融通过追踪大量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数据,精准描绘企业“战略性”“新兴性”和“未来性”画像,有效评估具体产业前景与发展潜力。具体而言,数字金融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在产业链环节、业务流程、潜在风险等异质性特点,一行一策定制数据采集与算法模型,将目标资产背后的交易情况全数字化、可视化,对目标标的进行全时期全方位监控,并在

此基础上汇总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数据交叉验证,完成资产考察、交易验真、风险揭示。金融机构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专业分析和挖掘,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从而为其提供融资支持。

数字金融通过引导资本投资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金融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多维数据,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供适应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进行定价与风险评估,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产业场景。

数字金融通过跨区域要素调节效应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主体相对匮乏、从业人员少,因此该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相对有限。数字金融搭建数字化、共享化的生态系统,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及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外围环境,能借助平台经济优势,打破时空限制,增加金融服务主体和资本供给量,使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各节点信息,并通过金融机构与企业线上零距离对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产业链节点进行穿透式管理,利用线下业务线上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跨区域金融业务。

三、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困境

数字金融发展潜力巨大,且通过赋能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产业场景塑造能够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但是目前在数据信息、应用场景也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亟待突破。

1.数据的供给性转化性困境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且数字金融配置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平台的构建与数字化产业链,进而依赖于数据来源的广度、精度与深度,但是目前中国数据资源虽然规模优势基本形成,但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是数据有效供给不足。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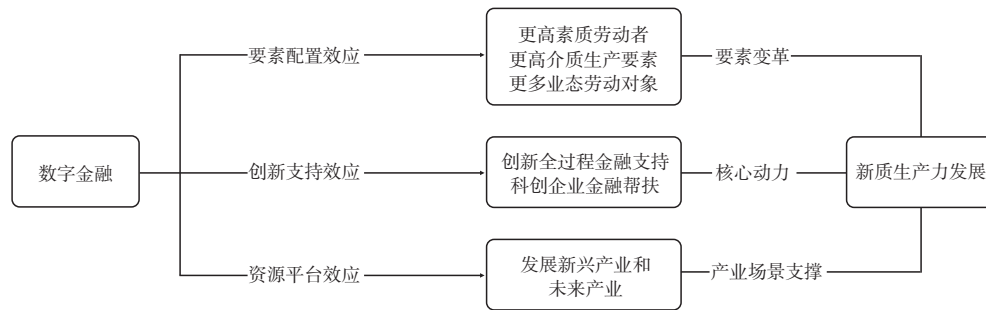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到32.85泽字节(ZB),同比增长22.44%,但是全国数据存储总量仅为1.73泽字节(ZB),相当于生产总量中只有5.26%的数据被储存,且存储数据中一年未使用比例达到40%左右,这充分反映出数据因加工能力不足导致价值难以被挖掘发挥。与此同时,各主体之间统计口径与技术标准的不同使所得数据缺乏统一性,在面对同一标的时给出不同的数据描述,对后续数据的处理运用造成很大困扰。二是“数据鸿沟”现象突出。当前中国区域间、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治理生态等发展存在不平衡,同样阻碍了数据获取与传输。根据《中国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报告(2024)》,中国农村互联网网民仅占全国网民整体的27.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0.5%,远低于城市地区;另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前十个省份中有八个省份位于东部地区,区域间差距较大。三是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亟待释放。据《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示,2023年,全国数据产存转化率仅为2.9%,海量数据可谓是“源头即弃”;企业一年未使用数据占比为38.9%,大量数据存储后未被读取和利用;尚未建设数据管理系统的大企业占比为21.95%,且开展数据服用增值业务的大企业仅有8.3%;数据交易所需求方是供给方数量的1.75倍,数据产品成交率仅为17.9%。以上数据充分反映出,数据在存储、交易、开发等过程中总量损耗较大,真正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使用的数据资源较少,数据价值仍需进一步挖掘。

2.参与主体的专业性能动性困境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应依赖于系统的政策体系引导以及扎实的专业人才支持,这就涉及政府与教育两大参与主体。在政府政策引导方面,由于新质生产力仍处于理论探索时期,相

关研究数据和实证分析较为缺乏,且各地区各行业尚未确立一个公认的衡量测算标准,导致各地区各行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欠缺专业性认知,难以制定切实具体的政策路线。有关数字金融的政策设计同样有待改进,现有政策多集中于普惠金融与产业链金融等领域,数字金融引导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仍有补充空间,而关于数字金融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政策设计亟待推进(见表1)。在教育人才支撑方面,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劳动力总体知识水平的增长,但中国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偏向于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对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有所欠缺。一方面,在新兴产业人才培养上,学科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存在对接不畅的问题,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虚拟仿真调试、产品建模与仿真、智能装备与产线单元、MES系统与应用等应用型专业设置严重不足,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统计,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数字人才缺口将达550万人,人才供需比为1:2.6。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领域人才紧缺非常突出,大数据研发、数据分析与应用、风控建模、风控策略分析、数字技术架构设计、网络安全管理、数字金融产品经理、运营数据策略分析等多类人才存在较大供需缺口。根据德勤中国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金融企业数字人才供需中近50%的企业面临供不应求的矛盾,且到2026年,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总量超过115万人。因此,培养一批既懂产业技术又懂数字技术且有金融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当前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3.创新过程的效率性持续性困境

数字金融是新一代科技革命下学科融合的产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技术成

表1 2019—2023年中国颁布的数字金融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9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2022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	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
2022年1月	原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22年2月	中国人民银行等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稳步推进金融科技标准建设,系统完善金融数据要素标准,健全金融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强化金融网络安全标准防护,推进金融信息化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标准建设
2023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规范》	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模式开展以经营类信贷业务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具体内容包括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实施的关键举措、数据管理、场景生态建设、客户服务风险管控、系统支持、客户权益保护等
2023年12月	国家数据局等	《“数据要素x”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重点关注数据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供给和数据流通环境,结合十二项“数据要素x”任务,明确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新华财经相关数据绘制。

果发展是金融领域数字化改造的核心动力,科技成果转化则关系到产业升级和行业转型进度,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2023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专题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此外,工商银行等六大银行年报显示,其整体科技投入增速从2020年的33.5%下降到2023年的5.38%,这也凸显出中国金融科技投入日益放缓的趋势。同时,中国尚未打造出完整的科技—产业—金融三方关系,急需在科技领域取得强势突破,吸引市场关注、资金参与和产业运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虽然在大数据算法和AI模型领域取得了一定发展成就,但科研过程的市场参与和政府调控关系不明确,对科研成果的激励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完善,科研成果的应用落地及商业化过程受到阻碍,产业与科创的循环存在困难,与实现持续性成果产出仍有一定发展距离。加之核心技术与产业人才的缺口,最终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西方国家,科研产出面临缺乏效率性的困境。

4. 监督管理标准的缺失化滞后化困境

数字金融的出现显著减少了传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技术发展催生的各种新金融服务品类多样,普通居民在不熟悉产品信息和产品风险的情况下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又会

产生新的信息不对称,对普通居民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并加速隐蔽区域的金融风险堆积。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运用打破地区和平台的限制,极大活跃了地方和民间的金融活动,数字金融创新出现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而由于技术手段、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缺乏,政府和监管部门往往难以做到有效监控和查证,出现了很多模糊空间和监管漏洞。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发布的《金融检查白皮书》,2022年金融犯罪案件受理约500件,涉案人数超1000人,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金融”致使犯罪手段复杂多样,不仅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人数也呈几何倍数放大。目前需要重点关注行业交叉的边缘地带,促使法规设立和监管范围跟上数字金融发展的步伐,确保数字金融在可控范围内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各要素平稳发展。

四、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设计

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融入金融领域,数字金融将进一步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数字金融需要重点打造要素治理体系、产业服务体系、创新引导体系、风险监管体系,以期能够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1. 构建数字金融要素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金融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平台的数据资源,全力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推动金融业数据融合应用。一是提升前端数据处理能力。积极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引导金融机构通过提高数据治理能力、强化数据资产管理能力,将金融机构积累沉淀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全力推动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充分释放,推动金融机构加快实施数据资产运营、完善数据价值评估、提升数据资产质量,打造数据供给端与数据消端之间数据质量、数据时效、数据价值的反馈闭环。二是拓展中端数据多维应用场景。积极搭建开放化数字平台,链接多元化数字场景,推动金融大数据在企业行情预测、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智能投顾以及精准营销、信贷风险评估、黑产防范、交易欺诈识别等多领域广泛应用,如在业务层面进行基于数据保护、数据质量等工作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技术层面开展数据存储、数据建模、数据集成等内容。三是加强后端数据共享及安全发展。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内外部流通共享,通过接入工商、税务、海关、电力、知识产权、电商平台等部门企业数据,塑造客户的多维立体画像,有效提升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水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强区块链、智能合约、大模型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大模型的复杂模型构建能力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训练,并立足区块链上链数据具有时间戳、不重复等技术特征,发挥链上数据防篡改、可追溯等特性,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识别、自动执行的技术特性,推动交易双方自动执行区块链上合约条款,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履约风险的评估成本。

2. 强化数字金融产业服务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战场,数字金融应增强金融服务深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精准化服务。一是积极发展普惠化、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应用方案。宏观层面,针对创新全流程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开展数字金融应用升级工作,推动数字金融业务与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的融合,增进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创新行业的沟通,充分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激发金融机构创新活

力,拓展数字金融运用空间。微观层面,重点在征信、抵质押、贷后管理环节积极推动基于数字金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并依托数字金融的信息互联优势,实现供应链数字化整合,使得数字金融服务对象从大型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扩展到小微企业。二是优化提升数字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推动数字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好数字金融推进的侧重点,采取差异化政策。如在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高,推进重点应放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需着力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在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低,实施政策应注重数字金融市场建设,需在推广数字金融覆盖和加深数字化程度方面着力。

3. 提质数字金融创新引导体系

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征在于创新主导,现阶段以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迫切需要从战略引领、资源支持、人才输送、市场开拓等多个领域着力,打造基于数字金融的全过程科技创新支持模式。具体来看,一是教育视角,以人才培养从源头上驱动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进步。除进一步开展基础教育普及,提升劳动者总体素质之外,还应针对学科交叉、产业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关键部位提前做好人才培养规划部署,推动将人才培养于发展需求匹配,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支持新质生产力建设。二是科研领域,需政府、教育、产业三方合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国家战略与市场发展需要相结合,打通科创环节要素配置,引导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同向而行,并完善教育配置,保证充足的人才供应,为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驱动。

4. 完善数字金融风险监管体系

随着数字金融的迅速崛起,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迎来了颠覆式挑战,因此重构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风险监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构建科学高效的风险监管架构。系统梳理、科学规划数字金融的监管框架,建立和完善数字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加强数据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强风险分析和风险预警,重点防范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过度交叉所造成的金融风险传染。二是加强金融监管工具创新和应用。探索开发和应用更为前瞻性的

风险评估工具,重点引入区块链、多模态大模型、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更准确地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动态,从而提高金融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以及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全面提升监管质量、水平和效能。三是加强技术风险管控。一方面,积极应对新技术应用风险,对内建立新技术引入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开源软件等技术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另一方面,前瞻布局模型算法风险应对策略,完善模型算法评价标准与运行监控机制,加强对敏感信息资产的保护力度,精准识别模型间对接与联动的影响路径,重视数据隐私保护以及数据投毒风险。

参考文献

- [1]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
- [2]王大树.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J].经济,2024(1).
- [3]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
- [4]张辉,唐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J].学习与探索,2024(1).
- [5]聂秀华,江萍,郑晓佳,等.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J].金融研究,2021(3).
- [6]刘船舶,杨天啸,刘柳,等.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4(4).
- [7]王维,曹智,龚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机制[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9[2024-05-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40319.0857.002.html>.
- [8]常煜,齐晓燕,郭丕斌.数字金融与新能源企业创新活动关系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J].会计之友,2024(4).
- [9]齐秀辉,付丽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J].会计之友,2024(1).
- [10]文学舟,汪晶晶,俞园园.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统计与决策,2024(8).
- [11]刘伟.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分析[J].武汉金融,2023(4).
- [12]王文进,葛鹏.产业数字金融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机理及其发展路径[J].世界经济研究,2024(2).
- [13]朱克力.“金融强国:做好五篇大文章”之一:以科技金融为牵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J].金融博览,2024(1).
- [14]纪小乐,薛启航,魏健.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12).
- [15]刘友金,冀有幸.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当拼在数字经济新赛道[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 [16]何秋洁,何香玲,陈国庆.金融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长效机制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23(11).
- [17]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

The Internal Logic, Dilemma Review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ian Guoqiang Qiu Yibo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peeding up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inly relying on the three logics of core elem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cene shapi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new quality” changes. Digital financ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ll fields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talent,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upport, creates new quality of production methods and new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creates new industries and creates new kinetic energy, and advances the layou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ll participants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inclusive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emphasize the core posi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larify the guiding role of policy guidance and regulatory supervision in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application, and full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entities,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 Support;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责任编辑:彦 伦)

【区域协调发展】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理论 逻辑与实现路径*

柳天恩 田梦颖 孙雨薇

摘要: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七年来,雄安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然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雄安新区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北京功能疏解有阻力、雄安自身供给能力不足、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难题。建议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完善承接配套政策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几个方面着手,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态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关键词: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47-10 **收稿日期:**2024-02-22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BJ2021063)。

作者简介:柳天恩,男,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生导师,河北经贸大学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副研究员(石家庄 050061)。

田梦颖,女,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石家庄 050061)。

孙雨薇,女,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石家庄 050061)。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和“首都功能拓展区”,也是北京“新两翼”中的重要“一翼”。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指出,“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再次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目前,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抓手。

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两大类。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是包括义务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住房保障等在内的保障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是包括托育服务、学前教育、普惠养老等在内的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需求的公共服务。当前阶

段,雄安新区要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率先取得突破。随着雄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和产业人口集聚,需要逐渐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向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过渡。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也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七周年。值此重要时间节点,本文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从共同富裕、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四个维度揭示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理论逻辑,梳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最新进展,剖析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面临的问题障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也可以为其他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经验借鉴。

一、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理论逻辑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公共服务差距最为明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为迫切的地区。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加快补齐河北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弱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北方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把京津冀地区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1. 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奇迹,开启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程,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围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了系统阐述,指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六条路径之一。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宏伟蓝图,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

方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实现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共同富裕上,在持续不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让“协同红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地人民群众,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重大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10日考察雄安新区时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新时代宜业宜居的‘人民之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闯出一条新路来”。推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贯彻的是共享发展新理念,回应的是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满足的是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新期盼,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新要求。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作为北京“新两翼”重要“一翼”的雄安新区,通过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提升地方品质,打造“反磁力中心”,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示范带动效应,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

2. 区域协调的重要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18年11月8日印发实施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列为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之一,将“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列为区域协调发展八大机制之一,“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积极探索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具体做法,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并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六个方面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举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手段，也是评判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的标准和尺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破解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三大差距”，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强调：“坚持把协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通过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发挥对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整体水平，打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为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支撑。”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和“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的雄安新区，通过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集中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在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补齐河北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弱项，打破京津两地对河北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

3.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推进以教育机会公平、医疗布局均衡、就业充分稳定、住房供需匹配、社保覆盖全面等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推动重点民生领域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可以通过多个渠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教育等公共服务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供机会公平，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保障。其次，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可以提供稳定安全预期，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破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导致的问题。再次，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可以带动投资增长，扩容劳动力就业“蓄水池”，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提升地方品质，形成产业和人才集聚的有利条件，提高经济发展的“造血能力”。

京津冀地区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雄安新区是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雄安新区与北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雄安新区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阶段要有一个阶段的标志，雄安新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破除要素跨区域流动障碍，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产业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先行先试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和普遍性经验，为其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示范和提供借鉴。

4.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同向，过程同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提出未来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的近期目标，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中期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城乡居民将普遍拥有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远期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推进进程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

个阶段战略安排是完全同步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导致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雄安新区是“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引擎”,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先行者和引领者的角色。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指出,“短短6年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桥或船”。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可以发挥地方首创精神,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率先取得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和解决方案。

二、雄安新区与北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的最新进展

雄安新区批复设立七年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进展,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和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产业和人口集聚

的有利条件逐步完善,宜居宜业的“人民之城”正在拔节生长。

1.政策框架与体制机制日益完善

京雄两地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抓手,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政策框架与体制机制。首先,在中央层面形成“9+3”疏解政策体系。中央协同办印发实施《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近期工作方案》,围绕中央预算内投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医保、财税、金融、薪酬等九个方面制定疏解激励政策,围绕户籍、市场准入、差异化价格3个方面制定疏解约束政策。其次,在雄安新区层面形成“1+3+10”承接政策体系。雄安新区主动对接中央协同办和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施方案,形成了高校、医院、企业总部三个工作专班,制定了包括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在内的10个方面的配套政策。再次,在公共服务落地方面形成组织保障机制。雄安新区成立了由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承接疏解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指挥部+管委会+工作专班+综合服务中心”的疏解服务机制,形成“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套方案、一跟到底”的工作机制,确保公共服务项目“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得好”。最后,在深度对接合作方面形成规划保障机制。京雄两地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专项规划,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见表1)。

2.公共教育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京雄两地在教育领域通过整体搬迁、开办分校、对口帮扶等方式开展合作,优化了区域教育资源布局,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首先,在基础教育方面,北京以“建三援四”为重点,开展对雄安新区对口帮扶。目前,北京建设的三所“交钥匙”学校(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全部竣工交付使用,“援四”学校(北京第八十中学援助雄安容和第一高级中学和兴贤初级中学,朝阳实验小学援助雄安云溪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援助雄安雄东望驾小学,北京市六一幼儿园援助雄安雄东同德幼儿园)全部落地。截至2023年5月,59所京津冀优质学校与雄安新区61所学校建立帮扶合作关系,实现县域层面全覆盖。其次,在职业教育方面,北京支持雄安新区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金隅科技学校、丰台

区职教中心等职业学校对接雄安新区三所职教中心,持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了京雄职业技能培训协同向深度广度拓展。最后,在高等教育方面,首批疏解的四所在

京部属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全部开工建设(见表2)。上述四所高校发起成立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邀请与四校特色优势紧密相关的部分企业、科

表1 雄安新区与北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名称规划	重要表述
教育	《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8月,京冀两地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1所
	《关于雄安教育发展合作协议(2021—2025年)》	2021年10月,北京市教委与雄安新区签署《关于雄安教育发展合作协议(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底,北京市协助雄安新区再举办4所优质学校
	《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3年11月,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雄安新区将在未来三年重点健全现代化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打造京津冀教育高地
医疗	《关于支持雄安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9月,北京市卫健委、河北省卫健委、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同签署《关于支持雄安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提出由宣武医院等5家北京市医疗卫生单位对口帮扶容城县人民医院等5家医疗卫生单位
	《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2年11月,雄安新区发布《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首批在京部委所属医院疏解项目有序推进;到2024年,容东片区等新建片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初显雏形;到2025年,雄安新区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的短期目标
社保	《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2年11月,雄安新区印发《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到2025年,具有雄安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
	《京津冀协同做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合作协议》	2023年11月,北京市、河北省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共同签署《京津冀协同做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合作协议》,提出通过党建共建、组建专班,做好疏解经办服务、推进京冀同事同标和京雄同城化办理、创建宣传联动机制,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和人员
就业	《京津冀公共人才服务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2020年8月,京津冀三地在雄安新区联合签署《京津冀公共人才服务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公共人才服务一体化进程正式迈入快车道
	《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2年11月,雄安新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北雄安新区构建现代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雄安新区将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住房	《河北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住房保障实施细则(试行)》	2023年2月,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印发《河北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住房保障实施细则(试行)》,提出首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市场化项目住房保障工作正式启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 首批四所高校和医院雄安新区疏解项目

类别	名称	用地面积	地理位置	建设时间
高校	北京交通大学	2600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启动区和起步区第五组团东北部	2023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完成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9月正式招生
	北京林业大学	2200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启动区和起步区第五组团东北部	2023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完成一期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2450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启动区和起步区第五组团东北部	2023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完成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9月正式招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600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启动区和起步区第五组团东北部	2023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完成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9月正式招生
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4.6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容东片区西北部B地块	2023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7月竣工
	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	500亩(含代征道路和绿地)	启动区和起步区第五组团东北部	2024年6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报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待批,尚未正式开工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研院所及河北省部分高校参与。此外,位于启动区的雄安新区大学园图书馆和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科学园也在加快建设,为雄安新区高等教育集聚和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持。

3. 医疗卫生协作不断走深走实

依托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和雄安新区政策优势,创新合作模式和机制,推进制度衔接、政策协同和标准趋同,实现京雄两地医疗卫生协作不断走深走实。首先,以功能疏解为引领,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雄安新区延伸布局。北京援建的雄安宣武医院开诊试运营,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的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选址落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开工建设。其次,以结对帮扶为重点,发挥北京对雄安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截至2024年3月,宣武医院、妇产医院、中医医院、疾控中心 and 卫生健康监督所等5家北京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对口帮扶雄安新区,69所京津冀知名医疗机构与雄安新区建立帮扶合作关系,让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再次,以模式创新为抓手,推动京雄两地医疗卫生合作落地见效。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医疗卫生合作模式由单一医务人员流动向机构合作迈进,由专家坐诊、科室协作、人员进修到共建共管、整体托管、专科联盟等方式转变,大幅提升了雄安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和服务能力。最后,以政策协同为保障,推动京雄医疗卫生领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雄安新区与北京加快医疗卫生资源跨区域转移对接,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以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等配套政策。截至2023年2月,京津冀三省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达到685家、互认项目50项,医疗影像检查资料共享313家。

4. 社会保障合作全面提质增效

雄安新区自批复设立以来,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大力推动与北京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领域顺畅衔接,逐步缩小待遇差距,实现社会保障合作提质增效。首先,在养老服务方面,雄安新区着力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完善疏解人员、城乡居民、被征地群众的民生保障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其次,在医疗保障方面,雄安新区出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政策,以“基本+补充”方式与北京医保待遇同步,扩大医保目录保障范

围,实现了疏解人员医保报销比例和实际医保待遇不低于北京同期水平。再次,在失业保险方面,雄安新区建立积极稳健的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提技能、稳岗位、促就业”的功能,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措施,为就业人员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最后,在工伤保险方面,雄安新区建立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推动与京津两地工伤认定、鉴定和工伤医疗康复等业务互托互认,为工伤职工异地就医、跨区结算提供了便利。

5. 就业创业领域多元发展

雄安新区聚焦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规模开发建设和新建片区运营服务需求,从完善就业机制、提升技能培训和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方面综合发力,推动人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首先,以完善就业机制为基础,保障新区群众多渠道灵活就业。为解决回迁居民的就业问题,雄安新区设立就业服务中心,构建“公共服务局、片区管委会+就业服务中心+社区”自上而下的三级就业服务机制;为聚集“高精尖缺”创新人才,雄安新区实行高端人才“特岗特薪”,设立高层次人才“编制池”;为扶持困难人群就业,雄安新区安排财政专项基金,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提供“一对一”就业帮扶,2020年至2022年期间,共帮助困难人员上岗1.5万余人,实现了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其次,以加强技能培训为抓手,破解新区存在的结构性就业矛盾。雄安新区借势北京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推行“定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居民提升职业技能。截至2023年2月,新区建设了4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和1所技工学校。最后,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为重点,促进雄安新区多层次充分就业。雄安新区以税收优惠、小额贷款等方式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着力激活就业新引擎。截至2022年底,雄安新区有16家创业孵化基地和孵化载体,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经营指导、融资服务、人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6. 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雄安新区全面落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住房保障工作,创新住房供给方式,打造信息化服务平台,具有雄安特色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首先,聚

焦服务疏解,构建新型住房制度体系。雄安新区构建“1+4+N”住房机制,配套住房租赁、住房销售、商业办公用房租售、公共产权住房管理、住房公积金等一揽子政策,为疏解单位和人员提供房保障。截至2024年3月,在雄安新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疏解单位共150家,缴存职工共7025人,住房公积金支持疏解政策已实质落地,实现与北京同城化。其次,优化多元住房供给,打造生态宜居样板。雄安新区坚持保障基本、兼顾差异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机构租赁住房 and 保障性租赁住房四类住房,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为保障征迁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雄安新区先后启动了容东片区、容西片区、雄东片区三个集中安置片区;为吸引外来人才助力雄安建设,新区树立“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的住房消费新理念,通过租赁补贴、人才公寓等方式对来雄就业创业的人员提供租住支持,并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保障“租售同权”。最后,依托信息化赋能,树立数实融合新标杆。雄安新区依托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以“数字房管”为引擎的“住房信息服务系统”,整合房屋交易、租赁住房、安置住房、公积金、智慧物业等子系统,实现了住房管理服务事项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

三、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现实困境

雄安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布局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努力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然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存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北京公共服务功能疏解有阻力、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存在制度障碍等现实难题。

1. 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

京津冀地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较为密集,但空间分布极不均衡。首先,从区域空间分布来看,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雄安新区与北京存在“断崖式”差距。雄安新区设立时间不长,公共服务存量资源仍处于县级水平。以2019年为例,在公共教育方面,雄安新区人均教育支出只有1.1万元,与北京市的7.0万元差距明显;在医疗卫生方

面,雄安新区每万人口医疗床位数、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仅为北京的64.5%、80.9%和19.5%;在社会保障方面,雄安新区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仅为北京的51.4%、77.0%和1.5%;在就业创业方面,雄安新区的人均社保和就业支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分别仅为北京的20.6%、40.4%(见表3);在住房保障方面,雄安新区的个人产权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房屋产权不归住房者所有,住房附属价值以及配套服务也远不及北京。其次,从城乡空间分布来看,雄安新区相对北京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北京市城市化水平较高,为促进公共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了许多实质性举措,例如将农村就业劳动力纳入城镇职工社保。而雄安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共资源“城优乡差”“城多乡缺”的问题仍然突出,农村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获取和享有还存在较大约束。

表3 2019年雄安新区与北京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比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雄安新区	北京
教育	“双一流”高校数量(所)	0	27
	人均教育支出(万元)	1.1	7.0
	小学师生比(%)	5.6	5.9
医疗	每万人口医疗床位数(个)	35.8	55.5
	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37.3	46.1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元)	730.7	3740.0
社保	养老保险覆盖率(%)	46.7	90.7
	医疗保险覆盖率(%)	74.5	96.7
	失业保险覆盖率(%)	0.9	60.1
就业	人均社保和就业支出(元)	914.5	4442.8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元)	5615.9	13900.3

数据来源:《河北统计年鉴(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2. 北京公共服务功能疏解有阻力

按照规划,雄安新区重点承接“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六类北京非首都功能。目前,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公共服务功能向雄安新区集中疏解面临三个现实难题。一是多部门利益整合难题。许多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管辖权属于中

央或国家相关部委而非北京市政府,涉及部门利益较多,协调难度较大,需要高能级的中央政府深度参与。二是疏解人员存在多重顾虑。疏解人员在子女教育、工资水平、住房保障、生活配套等方面存在较高要求,担心疏解到雄安新区之后会降低在北京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标准和美好生活品质。三是市场化疏解项目不多。首批和第二批疏解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多为行政指令式的疏解,市场化疏解的内生动力不足。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还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增强雄安新区的承载力、集聚力和吸引力。由于上述三点原因,目前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向雄安新区疏解的进度有待加快。除了“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外,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和两家医院还处于选址落位和开工建设阶段,第二批疏解的高校和医院还处于选址论证阶段,距离真正交付投用尚需较长时间。

3.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按照规划,雄安新区要建设“城市—组团—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形成多层次、全覆盖、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然而,雄安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网络构建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建设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水平。以2019年为例,雄安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北京的0.6%和10.5%,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是北京的4.2%和72.8%(见表4)。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财政预算不足导致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建设得不到有效支撑。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较为单一。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供给以政府为主,缺乏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可由政府兜底保障,但托育服务、学前教育、普惠养老等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资金投入,需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公共服务需求。三是公共服务供需匹配不够精准。雄安新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与常住人口布局的空间匹配度有待完善,城郊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相对不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和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很好满足。

表4 2019年雄安新区与北京经济指标对比

地区指标	人均GDP (万元/人)	GDP (亿元)	人均公共财政 收入(元/人)	人均公共财 政支出(元/人)
雄安	1.7	215.2	1133.1	25035.9
河北	4.7	35104.5	5020.8	11157.6
北京	16.2	35371.3	27011.0	34398.2

资料来源:《河北统计年鉴(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4.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存在制度障碍

雄安新区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存在三个方面的制度障碍。一是受制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外来人口的部分权益落实不到位。雄安新区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财政体制,例如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行积分落户制度。但雄安新区的落户门槛较高,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同城不同权”的问题依然存在。二是受制于事权和支出责任与治理能力不匹配,普惠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雄安新区还处于大规模建设阶段,财政收入远远小于财政支出,实际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超过了其供给能力,在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统筹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明显“力不从心”。三是受制于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重建设、轻民生”等现象。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向短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明显的基础设施类投资型公共服务倾斜,而在民生保障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偏弱。

四、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路径选择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动态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具体来看,可从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完善承接配套政策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四个方面着手,率先推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

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布局,缩小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一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域空间布

局。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抓手,持续扩大北京援建的“三校一院”覆盖人群范围,加快推动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建设进度,服务保障第二批疏解清单涉及的优质高校、医疗机构选址落位,接续谋划第三批从北京向雄安新区疏解的重点项目清单,将雄安新区打造成新时代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高地。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城乡空间布局。建立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基层治理为抓手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引导公共资源优先向薄弱领域、落后地区、重点人群流动,切实发挥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如开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等。三是提升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匹配度。在充分考虑人口分布的基础上,科学设定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和服务对象,统筹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对于高频次公共服务设施,要合理控制规模,适当增加布点。对于低频次公共服务设施,要适度集中布局,利用信息技术赋能,简化办事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对于人员分散的农村地区,可在固定时间和地点适当布局一些流动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的便利可及性。

2. 完善承接配套政策体系

雄安新区要不断完善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配套政策体系,增强对北京优质公共服务功能的吸引力和承载力,确保疏解对象“来得了、留得住、能发展”。一是完善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加强雄安新区与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政府等的制度性协商,实现规划衔接和政策对接,打破制约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在中央“9+3”疏解政策体系和新区“1+3+10”承接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打通政策堵点、难点和痛点,汇聚起疏解地的推力、承接地的引力、疏解机构的动力和中央部门的助力,形成强大的疏解合力。三是构建集成创新政策。总结首批集中疏解项目积累的经验模式,形成公开透明的集成创新政策,及时向社会发布政策“明白纸”,明确政策实施细则和兑付路径,为第二批和第三批集中疏解清单对接落地提供借鉴。把北京的“减量发展”和雄安新区的“增量发展”结合起来,利

用雄安新区的土地优势和制度创新优势,促进北京公共服务功能在雄安新区异地扩张。

3.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由政府兜底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雄安新区未来发展趋势,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发力。一是完善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等纵向转移支付的作用,加大一般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增强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应建立以扶贫协作、对口支援为特色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雄安新区民生服务供给困境,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的发展差距。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雄安新区应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公共服务准入门槛,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共建民营、政府购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补充的多元供给格局。三是加快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雄安新区应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精准抓取群众的民生服务需求,推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文旅、智慧养老等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努力形成主体协同、方式便捷、内容精准、供需匹配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4.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需要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降低公共服务享有的户籍关联度,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雄安新区应在以居住证为载体享有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钱随人走”的公共服务资金分配规则,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不平等待遇,调整常住人口的不合理标准,推动公共服务便利化供给。例如加强外来人口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升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降低常住人口的住房成本、扩大常住人口认定的空间标准等。二是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适应。各级政府应科学划分财权,以转移支付制度为保障,建立区域均衡的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具体来看,对于外溢性高、受益面广、投资较大的跨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由中央政府统筹京津冀三地资源予以支持;对于区域内一般基础设施项目,应由雄安新区自行调配并负责提供。三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官员考核机制,确保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打破经济增长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核心地位,扩大教育、文化、医疗、社保等民生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评估、质量改进和质量监督机制,推动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民生服务型”转变。

参考文献

- [1]李实,杨一心.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22(2).
- [2]柳天恩,孙雨薇,田梦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多重困境与推进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3(3).
- [3]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11).
- [4]张贵,孙晨晨,刘秉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3(5).
- [5]孙久文,史文杰.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2).
- [6]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程和道路[J].学海,2023(3).
- [7]柳天恩,董葆茗.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进展成效与路径优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2).
- [8]柳天恩,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11).
- [9]田学斌,陈艺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征分异和趋势[J].经济与管理,2019(6).
- [10]武义青,柳天恩.雄安新区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J].西部论坛,2017(5).
- [11]缪小林,张蓉.从分配迈向治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J].管理世界,2022(2).
- [12]姜晓萍,吴宝家.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历程、成就与经验[J].管理世界,2022(10).
- [13]夏杰长,王鹏飞.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重点方向[J].江西社会科学,2021(10).
- [14]陆铭,李鹏飞.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2022(8).

The Theory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Xiong'an New Area to Narrow the Public Service Gap with Beijing

Liu Tian'en Tian Mengying Sun Yuwei

Abstract: The narrowing of the public service gap between Xiong'an New Area and Beijing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orderly removal of Beijing's non-capital functions and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coordin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Xiong'an New Area has adhered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equaliz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has taken the lead in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such a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social security, employment and housing. 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ap between Xiong'an New Area and Beijing in public services is still large,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resistance to Beijing's functional decentralization, insufficient supply capacity of Xiong'an itself, and imperfec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tarting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innovat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public services,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dynamically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inclusive non-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constantly meeting the people's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Xiong'an New Are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 Regional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 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李莉莉 何龙辉 何广文

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集2011—2021年中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空间集聚性,且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阻碍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据此建议:一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普及金融知识;二是深化区域金融合作;三是制定行业进入准则,提高相应补贴;四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五是强化风险监管,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57-10 **收稿日期:**2023-09-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应急项目“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创新研究”(7214100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2021年度科研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研究”(19)。

作者简介:李莉莉,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郑州 450016)。

何龙辉,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郑州 450016)。

何广文,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 100083)。

一、引言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性,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已有研究表明,传统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王珂凡等,2021),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创新水平和降低风险等方式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黎蕾蕾,2020;孙志红等,2021)。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有效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金融发展模式,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成为亟待探究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就传统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

一结论达成共识(田菁,2017;陈虹旭,2021),且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传统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传统金融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温红梅等,2020;刘光彦等,2022)。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进一步拓展至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与传统金融的促进作用机制类似,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吕江林等,2021;杨刚等,2022),但由于数字化因素的介入,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像传统金融一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极少,并且,如果有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又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本文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关注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本文立足于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的发展实际,将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述评

传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已经成为共识,从Joseph A S(1911)的开创性研究开始,主要结论有:第一,金融发展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在经济落后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王立平等,2020)。第二,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改善收入分配,增加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Favarrà G, 2003);第三,金融发展通过扩大股票市场规模和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田菁,2017);第四,金融可以发挥其中介功能,为企业的经营、投资等一系列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扩大其生产规模,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阳佳余等,2018)。

传统金融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发展不仅可以明显地推动本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使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王珂凡等,2021;刘光彦等,2022),显现出积极的溢出效应(马昱等,2022)。同时,从金融的多个维度来看,第一,金融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反向影响,而提升金融效率可以同时推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王淑英等,2016)。第二,对不同金融行业而言,传统信贷业的发展对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保险业和证券业并未发挥出其积极的推动作用(赵放,2017)。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金融供给来促进收入均等,从而推动经济发展(Aditi K, 2014)。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吕江林等,2021)。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发挥中小企业发展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张贺,2021),还可以通过发挥优化产业升级、扩大技术溢出及提升创新能力

的中介效应来促进后者的发展(常建新等,2021)。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Sahay R, et al.(2015)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倒“U”型影响。詹韵秋(2018)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样本期间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超过拐点,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分别处于抑制区间和上升区间。

综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析上,较少有文献分析前者对后者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三、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

基于金融发展相关理论以及前人的研究,下面从三个方面阐释本文的理论逻辑并提出相应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为客户提供新型的数字化金融借贷产品,实现无实物抵押的资金借贷,有效缓解客户资金周转不足等难题。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为客户增添了新的金融交易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金融交易的便利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为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动力。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且在便利其日常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可以激发人们的消费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利用大数据分析,基于用户的大量数据信息所构造的风险评估模型,对于协助小微企业跨越融资约束门槛作用显著,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创新活力。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尤其是有利于金融机构更便捷地获取客户先进技术运用方面的信息收集,从而有助于扩大技术溢出,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交

易信息与渠道更加透明,有利于实现资本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展数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自身的信用创造和扩张功能,有效引导资金流入重点产业,创新产业结构,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因此,可以认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列出了相应的逻辑图(见图1)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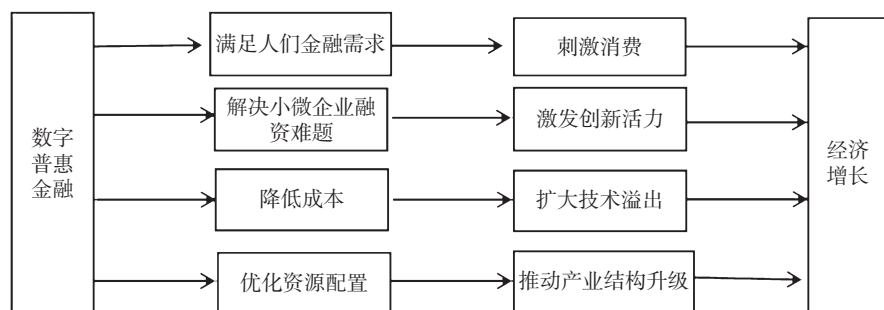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逻辑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地区间金融的紧密联系。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技术投入等成本,这也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点(郭峰等,2020);另一方面,在通信与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不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在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实施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产业产生集聚效应。同时,数字化技术的相互模仿、学习,有利于促进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互动,进而促使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

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加强,区域外要素和产品的流入,也为本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区域外经济发展能够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即经济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增加了产品类别,进而扩大了金融交易的规模,金融交易的主体也可从中获取全面的产品信息,实现了金融交易市场的公开透明。同时,本地区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吸收邻近地区金融资源,比如人才、资本等资源的流入,这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社会中的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流出会导致邻近地区的金融资源减少,进而抑制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

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金融资源分化问题,加快了经济机会和收入在区域间的再分配。如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造成收入再分配不佳,就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表现为发达地区在吸收资金、吸引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等,可能会出现数字金融诈骗和私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同时,部分农村群体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数字金融素养不高,经济水平低却又缺乏信贷支持,这可能会导致农村群体“数字金融排斥”现象发生,再加上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将会进一步抑制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抑制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研究设计

本部分对研究数据的来源、变量选取及模型设计进行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中部地区的8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以确保样本容量足够大,样本数据足够具体化,从而使得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基于对数据可得性、连续性等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2011—2021年

80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包括:第一,各省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第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对于个别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ln P_{gdp}$):一般而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本文借鉴方先明等学者的研究(方先明等,2022),以各地级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取对数来衡量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Difi$):借鉴张贺(2021)的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研究。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精确,本文将指数值除以100,以此作为衡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阳佳余等(2018)、常新锋等(2020)和黎蕾蕾(2020)的研究,选取城镇化水平($\ln Urb$)、固定资产投资($\ln Fai$)、社会保障水平($\ln Sec$)、对外开放程度($\ln Fcu$)和产业结构($\ln Ind$)作为控制变量。

(1)城镇化水平($\ln Urb$)。城镇化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代表劳动力资源配置,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镇,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经济规模,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使用各省统计年鉴中发布的城镇化率来衡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2)固定资产投资($\ln Fai$)。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就是投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促进工业等行业的发展,从而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

(3)社会保障水平($\ln Sec$)。社会保障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有形的手”来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有利于调节不同收入主体的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进而保障社会有序运行,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额来衡量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

(4)对外开放程度($\ln Fcu$)。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引入更多资金和技术,提升当地企业的经营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表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5)产业结构($\ln Ind$)。产业结构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本文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占比之和来衡量产业结构。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精准,以上指标均取对数,表1列出了以上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P_{gdp}$	经济增长水平	880	10.66	0.47	9.32	11.89
$Difi$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880	1.83	0.73	0.24	3.36
$\ln Urb$	城镇化水平	880	-0.64	0.20	-1.16	-0.11
$\ln Fai$	固定资产投资	880	7.25	0.72	4.98	9.28
$\ln Sec$	社会保障水平	880	3.63	0.64	1.88	5.95
$\ln Fcu$	对外开放程度	880	3.39	1.28	-1.24	7.51
$\ln Ind$	产业结构	880	-0.11	0.19	-0.33	3.86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三)空间权重矩阵选取

本文参照马昱等(2022)的研究,选择空间邻接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实证分析,并将温红梅等(2020)的文献作为参考,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邻接权重矩阵

根据各个地区之间的邻近关系研究地区的关

联性,将地级市*i*与地级市*j*的邻近关系设为 w_{ij} ,定义邻接权重矩阵如下:

$$W_1 = \begin{bmatrix} w_{11} & \cdots & w_{1n} \\ \vdots & & \vdots \\ w_{n1} & \cdots & w_{nn} \end{bmatrix}$$

如果地级市*i*和地级市*j*相邻,则 $w_{ij}=1$,否则 $w_{ij}=0$ 。由此可以得到, W_1 是一个80×80的主对角线为0的权重矩阵。

2. 经济距离矩阵

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可以用人均GDP的差额来衡量,经济距离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均为0,非对角线元素为两地区之间人均GDP平均值差额的倒数,经济距离矩阵的元素可由下方公式表示:

$$w_{ij} = \begin{cases} \frac{1}{|\bar{y}_i - \bar{y}_j|}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其中, \bar{y}_i 和 \bar{y}_j 分别为样本观测期内地级市*i*和地级市*j*的人均GDP的平均值。

(四) 模型设计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独立的,可能会受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而空间计量模型充分考虑了区域间的经济行为对彼此的影响,采用空间权重矩阵实现区域间的连接,分析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本文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Luc A, et al. (1995)认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是最为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项引入方程中,研究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空间误差模型(SEM)假设空间溢出效应源于误差项,研究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James L, et al. (2009)提出了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杜宾模型(SDM)在同时考虑以上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了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本文中,即表示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受到本地区某些解释变量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和解释变量的影响。

本文首先列出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OLS模型,随后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种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的检验选择最合适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OLS模型:

$$\ln Pgdpi = \alpha_0 + \alpha_1 Dif_i + \alpha_2 X_i + \mu_i + v_i + \varepsilon_i$$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ln Pgdpi = \alpha_0 + \rho W \ln Pgdpi + \alpha_1 Dif_i + \alpha_2 X_i + \mu_i + v_i + \varepsilon_i$$

空间误差模型(SEM):

$$\ln Pgdpi = \alpha_0 + \alpha_1 Dif_i + \alpha_2 X_i + \mu_i + v_i + \delta_i$$

$$\delta_i = \lambda W \delta_i + \varepsilon_i$$

空间杜宾模型(SDM):

$$\ln Pgdpi = \alpha_0 + \rho W \ln Pgdpi + \alpha_1 Dif_i + \alpha_2 X_i + \beta_1 W Dif_i +$$

$$\beta_2 W X_i + \mu_i + v_i + \varepsilon_i$$

其中,*i*代表地级市,*t*代表年份, α_0 为常数项, α_1 和 α_2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直接效应的系数, X_i 代表控制变量,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λ 为空间误差系数, β_1 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β_2 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μ_i 和 v_i 分别为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 为误差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说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适用性,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样本数据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如果存在,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如果不存在,则不需要考虑。目前多数学者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来度量空间相关性,公式如下:

$$\text{Moran's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1}^n \sum_{j=1}^n w_{ij}}$$

其中, $S^2 = \frac{1}{n} \sum_{i=1}^n (x_i - \bar{x})^2$ 为样本方差, $\bar{x} = \frac{1}{n} \sum_{i=1}^n x_i$ 为样本均值, x_i 为第*i*个区域的观测变量, n 为区域总个数。本文选取80个地级市,并使用邻接权重矩阵进行实证分析,因此*n*的最大值为80,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第*i*行第*j*列的元素,用来度量区域间的邻近关系。

莫兰指数检验的原假设为“ $H_0: Cov(x_i, x_j) = 0, \forall i \neq j$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如果指数值大于0,说明变量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其值越大,表示其空间相关性越明显;如果指数值小于0,说明变量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其值越小,表示空间差异性越明显。如果指数值等于0,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呈现随机性,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计量模型也不再适用。

1.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本文将中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观测值,通过Stata软件测算莫兰指数,以此检验经济增长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两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1年经济增长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莫兰指数

年份	经济增长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莫兰指数	Z统计量	P值	莫兰指数	Z统计量	P值
2011	0.141	2.144	0.032	0.174	2.627	0.009
2012	0.140	2.137	0.033	0.206	3.078	0.002
2013	0.139	2.123	0.034	0.176	2.66	0.008
2014	0.148	2.24	0.025	0.268	3.932	0.000
2015	0.160	2.415	0.016	0.234	3.488	0.000
2016	0.166	2.498	0.012	0.150	2.304	0.021
2017	0.181	2.702	0.007	0.184	2.807	0.005
2018	0.188	2.805	0.005	0.251	3.748	0.000
2019	0.201	2.988	0.003	0.254	3.779	0.000
2020	0.217	3.195	0.001	0.249	3.712	0.000
2021	0.248	3.630	0.000	0.323	4.746	0.000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假设。这说明两类变量数据在研究期内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具有空间集聚的特征,初步验证了假设2,即经济增长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互邻近,经济增长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互邻近。同时,检验结果也表明,本文采用空

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是适宜的。

此外,从总体趋势来看,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水平的莫兰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增长水平相似的地级市在空间分布上更加集中;而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性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

2.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莫兰指数主要是考察变量整体的空间集聚情况,而通过莫兰散点图可以观测到具体城市的集聚性。莫兰散点图包括四个象限,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代表观测值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第一象限表明其存在“高一高”聚集的空间趋势,即高观测值相互聚集,第三象限则代表存在“低—低”聚集,即低观测值相互聚集。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表明观测值之间存在负空间相关性,即低观测值区域与高观测值区域相邻。因此,本文采用莫兰散点图分析城市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关特征。

本文制作了2011年和2021年在邻接权重矩阵下,经济增长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两个变量的莫兰散点图(见图2—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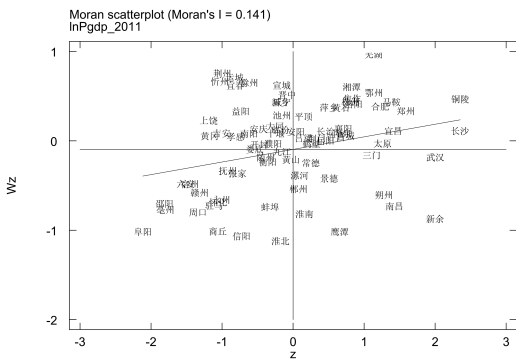


图2 2011年经济增长水平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Stata软件测算所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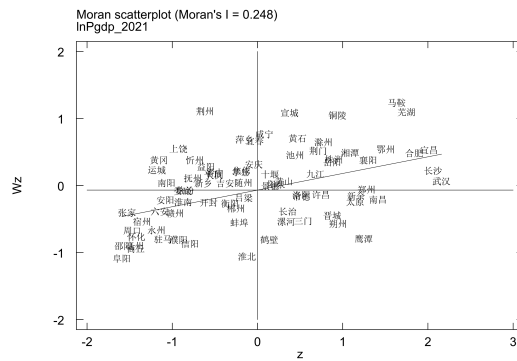


图3 2021年经济增长水平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Stata软件测算所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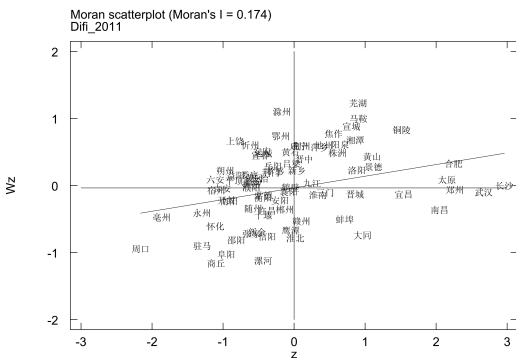


图4 2011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Stata软件测算所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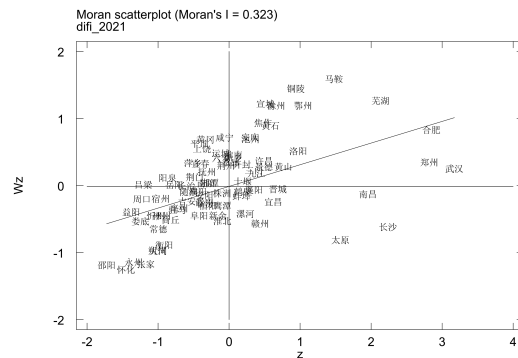


图5 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Stata软件测算所得整理。

由图2和图3可以看出,2011年和2021年中部地区各城市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大多处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位于第一象限的有合肥、铜陵、郑州、洛阳、长沙、湘潭等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位于第三象限的有阜阳、邵阳、永州和高丘等城市。观察图4和图5,可以发现2011年和2021年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也大多居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中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且大多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存在着“高一高”聚集的空间趋势,验证了假设2。

(二)模型检验及选择

首先,本文进行LM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从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种模型中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后续的检验和实证分析。其次,通过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取了固定效应检验的结果,从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中选取最合适的效应进行本文的研究。最后,采用LR检验和Wald检验分析SDM模型是否能转换成SAR模型或SEM模型,即进一步确定SDM模型的适用性。

第一,通过观测检验结果,可以发现LM检验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SAR模型和SEM模型均适合本文的计量分析,因此,本文选择两者结合的SDM模型。第二,Hausman统计量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因此,本文采用SDM模型的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三,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在采用SDM模型的前提下,选择时间空间双固定模型更优。第四,Wald检验和LR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SDM模型会简化为SAR模型或SEM模型的原假设,进一步确定了SDM模型的适用性。综上,我们接下来将使用具有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别列出了具有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的OLS模型、SAR模型、SEM模型和SDM模型回归结果,通过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OLS模型中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1%显著

性水平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验证了假设1。此外,SAR模型、SEM模型和SDM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和空间误差系数 λ 均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即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通过对比SAR模型、SEM模型和SDM模型的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可以发现SDM模型的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最大,表明采用SDM模型更优,这也同时验证了上文Wald检验和LR检验的结果。因此,本文只对SDM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SDM模型中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为0.423,这说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每提升1%,就会拉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升0.423%。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0.288,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估计系数来看,本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能够直接提升本地区0.288个单位的经济增长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加深了其使用深度,并降低了服务成本,为居民提供了更方便、更灵活的金融服务,尤其是服务广度和深度的提升,使得原本受到金融排斥的中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等也能积极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这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起到了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通过观测控制变量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城镇化水平($\ln Urb$)、固定资产投资($\ln Fai$)和对外开放程度($\ln Fcu$)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城镇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开放程度每提升1%,本地的经济增长水平就会相应的提升1.068%、0.151%和0.0236%。产业结构($\ln Ind$)的直接效应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SDM模型中,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将会产生负向影响,也即提升本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验证了假设3。从估计系数来看,本地区的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1%,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会降低0.321%。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空间聚集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可能拥有吸收金融资源的巨大优势,而金融资源的集聚必将为当地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同时,金融资源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必将使得周边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性影响。第二,经济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将带来地区之间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各地区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如果忽视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盲目展开竞争与争夺,将会带来经济的“脱实向虚”,这种恶性竞争行为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来看,城镇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显著为负,表明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会阻碍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往往是全国同一性的。

(四)空间效应分解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参照黎蕾蕾(2020)的文献,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来说明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及其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验证了假设1,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增长1个单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就会提升0.269个单位。这可能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范围,提高了服务效率,借助金融力量从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1%,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就会降低0.326%,验证了假设3。其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凭借着自身

高水平的数字金融服务以及先进的技术,吸引了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人才、资金等资源,抑制了其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表3 空间效应分解估计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i>Difi</i>	0.269*** (0.0658)	-0.326** (0.161)
<i>lnUrb</i>	0.955*** (0.0623)	-1.664*** (0.222)
<i>lnFai</i>	0.150*** (0.0183)	-0.0434 (0.0292)
<i>lnSec</i>	0.0243 (0.0179)	0.0832* (0.0453)
<i>lnFcu</i>	0.0242*** (0.00445)	0.0102 (0.0122)
<i>lnInd</i>	0.0202 (0.0144)	-0.0953** (0.0436)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系数为正,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间接效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却阻碍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拉动了本地区居民的消费,进一步推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周边地区的居民受到影响,纷纷迁入本地区,从而抑制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水平在10%水平上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本地区产业结构每提升1个单位,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将随之降低0.0953个单位,可能的解释为本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吸引周边地区更多的资源和消费,从而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基本要素,选取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回归结果,从而影响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借鉴温红梅等(2020)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选择经济距离矩阵来替代前文的邻接权重矩阵,以检验上述实证

结果的可靠性。从稳定性检验结果看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有小幅度的变动,但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普及金融知识

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政府应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数字技术在欠发达地区的使用率,创新出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使得金融服务更加普遍实惠,让人们能够真正使用数字技术享用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可以开发普及数字金融知识的新渠道,加大对数字技术及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金融知识储备,增强其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要在农村和偏远贫困地区进行宣传活动,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数字普惠金融活动中,做到与数字时代接轨。

2.深化区域金融合作

数字普惠金融为区域经济增长带来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相关政府部门应合理布局数字技术,加强地区间的协同作用,引导区域间的产业集聚,形成优质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减弱数字普惠金融的负向间接效应。不同区域之间应该积极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验和数字技术的共享交流,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植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中。同时,金融部门应借助数字技术快速、便捷的优势,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让其他地区的各个阶层主体能够享受到无差别的金融服务,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3.制定行业进入准则,提高相应补贴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市场进入准则,完善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促进数字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若数字金融服务提供商出现破产清算的情况,部分投资者可能会由

于对互联网的掌握程度不够,其权益难以得到维护,进而导致其对数字金融业务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制定行业进入准则,让更多有担当、有能力的大型企业为用户提供线上金融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此外,线上金融服务的获得门槛低,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因用户的征信资质较差而提高自己的坏账准备金率,增加了服务成本。基于此,政府部门应向服务提供商提供相应的补贴,进而提高其参与积极性。政府可以利用贷款贴息和无偿补助等奖励手段,为服务商提供专项资金,有利于为其解决数字技术投入低的难题。

4.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应加快技术创新,深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效融合,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提高,一方面,工业企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将数字技术有效地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业,围绕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提高服务质量,丰富服务供给,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5.强化风险监管,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的有效融合,突破了传统金融线下发展的瓶颈,使得客户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但同时也有不少风险逐渐显现出来,如客户信息泄露等问题。为此,监管部门应加强风险监管,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监管部门应从金融业务规范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开展多部门协调工作,加快立法步伐。在规范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推动市场发展,做到鼓励、引导与规范并重,维护良好的数字金融生态环境。同时,也要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监管难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监管手段,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 [1]王珂凡,何文彬.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科技与经济,2021(6).
- [2]黎蕾蕾.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功能视角[J].华北金融,2020(11).
- [3]孙志红,张娟.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财会月刊,2021(4).

- [4]田菁.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再检测[J].财经问题研究,2017(6).
- [5]陈虹旭.金融发展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J].生产力研究,2021(4).
- [6]温红梅,王宏宇,赵睿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197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 [7]刘光彦,赵颖.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2(7).
- [8]吕江林,叶金生,张斓弘.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J].当代财经,2021(9).
- [9]杨刚,张亨溢.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2022(2).
- [10]JOSEPH A 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1:599—639.
- [11]王立平,余小婷.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J].工业技术经济,2020(5).
- [12]FAVARRA G. An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J]. IMF working papers, 2003, 3(123).
- [13]阳佳余,张少东.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 [14]马昱,闫瑞雪,胡涵清,等.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规模视角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1).
- [15]王淑英,孙冰,秦芳.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9).
- [16]赵放.谁在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1).
- [17]ADITI K.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J]. Futures, 2014:56.
- [18]张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19]常建新,范立春,高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J].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 [20]SAHAY R, CIHAK M, BARAJAS A, et 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it meet multiple macroeconomic goals?[J]. Staff discussion notes, 2015, 15(17).
- [21]詹韵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J].征信,2018(8).
- [22]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4).
- [23]方先明,刘韞尔,陈楚.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来自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24]常新锋,陈璐瑶.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金融经济研究,2020(4).
- [25]LUC A, RAYMOND J G M F. New directions in spatial econometrics[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95.
- [26]JAMES L, ROBERT K P.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New York: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China

Li Lili He Longhui He Guangwe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imbalanc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data of 8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show that: First, there is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wo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overall.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driv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will have a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inder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eighboring reg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popularize financial knowledge. Second, deepen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third is to formulate industry entry guidelines and increase corresponding subsidies. Fourth,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fth, strengthen risk supervision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ustomers.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Economic Growt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区域收入差距：现实特征与政策建议*

闫梅

摘要:进入面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平衡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解析共同富裕和区域收入水平均衡的内涵,并以10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分析区域收入差距的特征和空间分异。研究发现,区域实际收入的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大多是东南沿海核心城市,实际收入水平提升的大多是中西部城市;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东部核心城市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实际生活水平,而我国的西南、西北、中部及东北部分地区,实际收入水平及购买能力非常有限,是实际发展最落后、居民生活水平最低的区域。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促进物价水平合理和公正,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秩序,保障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关键词:共同富裕;区域差距;实际收入;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67-10 **收稿日期:**2024-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购买力视角下的区域收入差距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20CGL06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区域经济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闫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北京 100006)。

一、引言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①。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持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刘培林等,2021)。国内外研究表明,区域收入的不均衡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应地降低高增长所产生的福利,并进一步阻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Gardiner,et al., 2011)。

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达到1.27万亿美元。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区域发展差距倒“U”型曲线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步入区域差距持续扩大转向缩小的拐点区段(樊杰,2019),在这个阶段,如何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成为至关重要的政策挑战(蔡昉,2020)。因此,新时代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平衡增长是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通常使用名义指标进行测度。然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基础等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也十分明显。地区之间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在一些不易流动或不易贸易

的商品和服务上表现更为突出,例如住房、医疗、教育、餐饮服务,有的价格差能够达到数倍以上。对地区购买力差异的研究表明,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闫梅等,2018),促进各地区物价水平的合理和公正、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缩小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区域收入均衡和共同富裕。因此,本文综合考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两方面因素影响,采用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实际收入来衡量区域收入水平,以此度量和比较区域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异情况。科学测度和分析不同区域收入差距的特征和空间分异情况,能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同时也为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照。

二、从生产层面到居民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显著,等额收入在不同地区所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不同。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不同,也使得共同富裕在生产层面和居民生活层面存在内涵差异。

1. 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

名义收入是以货币量来衡量的收入,是在不考虑市场等因素情况下的货币收入。例如通胀时期,货币不断贬值、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等额数量的货币收入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比通胀之前要少了,货币收入就只是名义收入。实际收入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数量。即名义收入的购买力,是将居民的货币收入与物价联系在一起,与名义收入成正比、与物价水平成反比。区域收入差距在传统上多被表达为区域“经济水平”的差距,通常使用的是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名义指标进行测度。物价水平的地区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名义收入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或服务不同,人们真正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最直接的是实际购买能力的差距。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受到收入分配、地区物价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考虑地区价格指数得到的实际收入,能够反映真实的区域收入水平和区域收入差距。

2. 从生产层面到居民生活层面的区域收入均衡

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以及近年来的较多研究都表明,由于区域发展条件的客观差异,绝对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是不存在的,即使区域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水平依然可能存在差距(樊杰,2014),采用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等名义指标衡量的生产层面的区域发展均衡难以实现。就这个问题,多位学者提出了“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的区域发展综合均衡模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地区间生活水平趋同(刘修岩,2014)、人均收入均衡(陆铭,2019),而非经济总量的均衡。

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是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名义收入水平的均衡,而是居民消费层面(即生活层面)的均衡。名义收入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层面的,实际收入的共同富裕是居民生活层面的,从生活层面到居民生活层面,还需要经过收入分配、消费等环节。政府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应该考察不同地区的实际收入,根据实际收入的差距,调整二次分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改变生产层面蛋糕的分割。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收入可以通过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相对较低的物价水平等得到提升,而发达地区的实际收入可以通过税收、较高的物价得到合理的调节,从而使得生产层面较大的收入差距在居民生活层面得以缩小。

三、区域收入差距测度设计

本文采用人均GDP和居民实际收入两个指标测度区域收入水平,人均GDP表征富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实际收入水平表征居民收入的购买能力,反映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1. 指标选取

第一,采用人均GDP衡量总体富裕程度。人均GDP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构成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比GDP总量更能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第二,采用物价调整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实际收入)衡量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居民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意味着当地居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用于个人或家庭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然而,由于地区物价差异、分配不均等原因,某些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很高,但实际购买能力并不高。第三,采用地区价格指数调整人均可支配收入,测度物价调整后的实际收入水平,将经济层面的收入差距转移到居民生活层面。地区价格指数是不同地区购买一篮子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比,是表征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物价综合水平的地区价格指数,可以用于衡量地区之间商品、服务价格水平的差异程度(闫梅等,2019)。

2.测度方法

第一,采用变异系数、最高最低比、中位数与最低数之比来测度共同富裕视角下区域收入的差异程度和差距(刘培林等,2021)。其中,城市之间实际收入水平的总体差异程度采用变异系数测度。

$$CV = \sqrt{\frac{\sum_{i=1}^n (x_i - \mu)^2}{n}} / \mu \quad (1)$$

式(1)中, x_i 是第*i*个地区的收入水平, μ 为均值, n 为研究单元个数。

第二,采用空间关联分析技术识别区域收入差距的空间集聚情况。空间自相关是指变量的观测值之间由于观测点在空间上的邻近而导致存在的相关性,其中局部空间自相关指研究区中各空间位置与各自周围邻近位置的同一属性相关性。采用Getis-Ord G_i^* 指数对城市收入水平的空间集聚情况进行分析。

$$G_i^*(d)^2 = \frac{\sum_{j=1}^n W_{ij}(d) X_j}{\sum_{j=1}^n X_j} \quad (2)$$

$$Z(G_i^*)^2 = \frac{G_i^* - E(G_i^*)}{\sqrt{Var(G_i^*)}} \quad (3)$$

式(2)中, n 表示研究单元数量, x_j 表示空间单元*j*的收入水平, W_{ij} 表示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要素之间在门槛距离以内为1,否则为0。式(3)中, $Z(G_i^*)$ 为Z检验值,其中, $E(G_i^*)$ 为数学期望, $Var(G_i^*)$ 为变异数。 $Z(G_i^*)$ 的显著程度用于识别不同区域热点与冷点的空间分布。若 $Z(G_i^*)$ 值为正且显著,说明*i*地区周围的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区域;反之*i*地区周围的值低于均值,周边区域为冷点区域,据此识别区域收入水平空间集聚的热点或冷点集聚区域。

3.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区域收入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2)及各地统计部门,部分数据根据相关城市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镇化率进行估算得出。地区价格指数根据不同地区购买一篮子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测度得出,可以用于衡量地区之间商品、服务价格水平的差异程度(闫梅等,2019)。受限于城市层面物价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相对完整性,目前只能完成对100个典型城市的地区价格指数测度,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这100个城市样本分布在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研究单元个数占所在省份地级单元的比例约在1/4,在全国的分布相对均衡,基本能够反映全国的总体情况。

四、区域收入差距的特征与空间分异

不同地区名义收入的购买力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现象,以名义收入测度的区域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因此,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收入更能表征居民生活水平,以此实际收入水平测度区域收入差距的特征和空间分异,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区域差距的真实大小。

1.实际收入的区域差异程度缩小

根据100个城市的地区价格指数,对名义收入(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转换得到实际收入。实际收入考虑了物价水平和购买力的因素,是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的收入,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地区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采用变异系数来测算名义人均GDP/可支配收入与实际GDP/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程度,计算结果表明,在考虑物价水平后,实际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由0.43降低为0.35,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由0.34变为0.22,实际收入的差异程度明显小于名义收入的区域差异(见表1)。

表1 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差异程度比较

差异指标	人均GDP(元)	实际人均GDP(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变异系数	0.43	0.35	0.34	0.22
最大值/最小值	6.36	4.70	4.06	2.76
中位数/最小值	2.83	2.67	1.80	1.64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最大最小值比、中位数与最小值之比也明显缩小。2021年人均GDP最大值为北京市的183980元、最小值为昭通市的28932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6.36倍,中位数是最小值的2.83倍。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实际人均GDP最大值为苏州市的150179元、最小值是铁岭市的31938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70倍,中位数是最小值的2.67倍。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中位数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均明显缩小(见表1)。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与人均GDP类似,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大值为上海市的79610元、最小值为昭通市的19605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06倍,中位数是最小值的1.80倍。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大值为苏州市的59917元、最小值仍然是昭通市的21685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76倍,中位数是最小值的1.64倍(见表1)。可见,考虑地区价格指数后,名义收入最高值降低了,最低值有所提高,实际收入的取值范围缩小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中位数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也就是说,用名义指标测度的区域发展差距被高估了,用实际收入衡量的区域发展差距并没有名义收入那么大。

2. 物价水平影响实际收入的差异

物价水平对实际收入的差异产生着显著影响,在物价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样数量的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会减少,这意味着在货币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会下降,从而导致实际收入的减少。地区价格指数是总体物价水平的反映,指数的大小决定着地区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的差异大小,地区价格指数绝对值越大的城市,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的差异和变化越大。

从人均GDP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的实际人均GDP排名变化来看(见表2、表3),人均GDP排名前20位的城市,其实际GDP排名有一半位次提升、一半位次下降,总体排名变动幅度较大。人均GDP位列第1的北京市实际人均GDP排名下降到了第18名,深圳、上海、广州、厦门、杭州的实际人均GDP收入排名也远远落后于其名义人均GDP,这些城市虽然名义收入高,但是物价水平也高,实际收入排名下降,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没有名义收入高。位次提升的城市主要是宜昌、海西州、乌海、长沙、扬州和武汉,说明这些城市名义收入较高、物价水平相对并不高,实际收入排名有所提升,这些城

市的居民收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

人均GDP后20位的大部分城市实际人均GDP排名有所提升,只有少部分城市排名下降,且下降的位次相对不多,排名变动幅度较小。其中,汕头下降10个位次、安顺下降4个位次,说明其城市名义收入较低、物价水平却不低,居民收入可以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相对更少,导致实际收入排名更加落后。其他城市除运城提升5个位次外,排名变化很小。排名后20位的这些城市人均GDP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排名依然在后20位,排名最末位的5个城市依然是佳木斯、邢台、铁岭、平凉和昭通(见表3)。说明大部分名义收入较低的城市,总体物价水平不高,实际收入排名有所提升,但实际购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

另外,从100个典型城市人均GDP的排名变化可以看出,排名下降最多的是三亚、深圳、广州、上海、厦门、北京、杭州等城市,下降位次分别为23、22、22、18、17、17、14位,均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物价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排名提升最多的是宜昌、哈密、海西州、包头、九江、洛阳、石嘴山等城市,提升位次分别为15、15、13、12、12、12、12位。可见,位次下降的城市的排名变化幅度大于位次提升的城市。

表2 人均GDP与实际人均GDP排名变化(前20位城市)

城市	人均GDP(元)	排名	实际人均GDP(元)	排名	排名变化
北京	183980	1	114917	18	-17
苏州	177505	2	150179	1	1
南京	174520	3	137383	3	0
深圳	173663	4	104487	26	-22
上海	173600	5	107947	23	-18
宁波	153922	6	118377	14	-8
广州	150366	7	100691	29	-22
杭州	149857	8	108912	22	-14
扬州	146562	9	135249	4	5
南通	142721	10	128993	7	3
青岛	138849	11	124375	9	2
福州	135298	12	113601	19	-7
武汉	135251	13	127903	8	5
厦门	134491	14	98649	31	-17
海西州	132400	15	144428	2	13
长沙	130745	16	121978	10	6
乌海	128923	17	131427	6	11
泉州	128165	18	116662	16	2
绍兴	127875	19	107814	24	-5
宜昌	127091	20	132268	5	1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表3 人均GDP与实际人均GDP排名变化(后20位城市)

城市	人均GDP(元)	排名	实际人均GDP(元)	排名	排名变化
大同	54391	81	55202	80	1
哈尔滨	53823	82	55129	81	1
汕头	53106	83	44412	93	-10
枣庄	50613	84	52587	83	1
淮南	48008	85	51294	84	1
赣州	46452	86	48186	86	0
菏泽	45366	87	47216	88	-1
渭南	44785	88	48960	85	3
通化	44308	89	46455	89	0
安顺	43763	90	43620	94	-4
吉林	43333	91	45993	92	-1
运城	43201	92	47445	87	5
锦州	42809	93	46138	90	3
周口	39126	94	46111	91	3
牡丹江	38719	95	41375	96	-1
佳木斯	38247	96	41840	95	1
邢台	34193	97	37274	97	0
铁岭	30389	98	31938	100	-2
平凉	30192	99	32870	98	1
昭通	28932	100	32002	99	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3. 东部地区实际收入降低,中西部地区实际收入提高

第一,东部沿海核心城市实际收入排名有所下降。从各城市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名义收入分布特征为东部地区收入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收入最高的城市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而与名义收入相比,消除了物价影响后的实际收入格局发生了变化,实际收入最高和最低等级的城市数量均有所减少。也就是说,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城市实际收入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实际收入有所提高,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是缩小的。具体而言,三亚、海口、汕头、拉萨的实际收入排名比名义收入排名下降了20位以上,天津、深圳、重庆、广州、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排名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实际收入下降的大多是物价水平较高的旅游城市和东部沿海核心城市(见表4)。实际收入提升的主要是中部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市,其中,哈密、九江、石嘴山市实际收入排名提升了超过20位,淮南、荆门、海西州、西

宁、南昌、洛阳等城市实际收入排名也有很大提升(见表5)。

表4 实际收入下降的主要城市

城市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排名	实际收入(元)	排名	排名变化
三亚	37504	42	27576	89	-47
海口	38361	39	34284	64	-25
汕头	32654	67	27308	91	-24
拉萨	35592	48	33359	68	-20
天津	48976	17	39798	35	-18
深圳	72718	3	43752	21	-18
福州	46418	22	38974	39	-17
重庆	35666	47	34467	62	-15
徐州	35950	45	34755	59	-14
三明	34944	51	34432	63	-12
广州	71358	4	47784	15	-11
北京	77415	2	48355	12	-10
上海	79610	1	49503	11	-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表5 实际收入提升的主要城市

城市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排名	实际收入 (元)	排名	排名变化
哈密	32622	68	36015	47	21
九江	33695	61	37166	41	20
石嘴山	32896	66	36308	46	20
淮南	33390	65	35675	49	16
荆门	33470	64	35755	48	16
海西州	33873	58	36950	43	15
西宁	33497	63	35563	50	13
南昌	44422	31	43979	20	11
洛阳	31586	71	34754	60	11
大庆	38736	38	41454	28	10
包头	52021	14	51788	6	8
乌海	50283	15	51259	7	8
沈阳	45500	24	45489	16	8
绍兴	65760	10	55443	2	8
长沙	58850	11	54904	3	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第二,四大板块收入水平均呈现“梯度化”特征。按照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对100座城市进行划分,计算2022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的收入平均值(见图1),结果表明,采用名义指标和实际收入指标测度的收入水平均呈现出“梯度化”特征,平均收入水平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中,只有东部地区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名义指标相比有所下降,另外三大板块的实际收入水平略高于名义收入水平。其中,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15399元,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为95707元,相当于名义指标的82.94%;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333元,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773元,相当于名义指标的

82.91%。说明东部地区总体收入水平很高,物价水平也较高,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了,但仍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大部分名义收入较低,虽然总体物价水平不高,实际收入排名有所提升,但实际收入水平及购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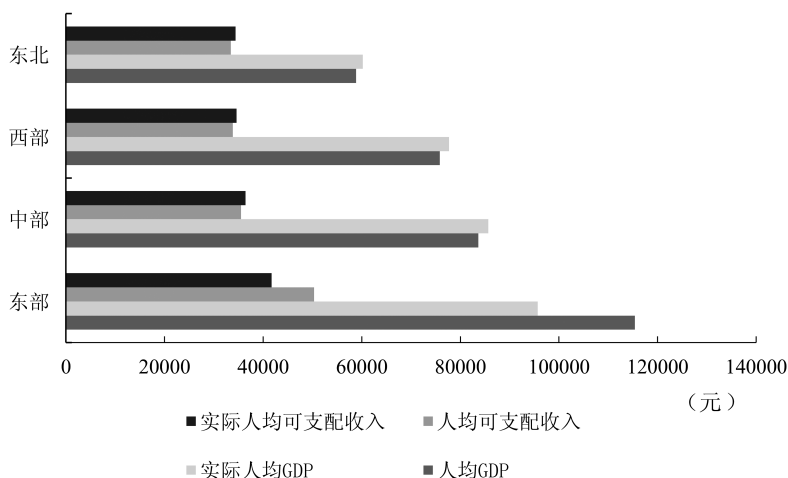


图1 2022年四大板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4.南北差距显著,长三角和东南沿海是主要的区域收入高值集聚区

第一,南北差距显著,北方城市实际人均GDP排名有所提升。从南北差距来看,人均GDP进入前20位的北方城市只有北京(1)、青岛(11)、乌海(17)三座城市,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进入前20位的城市有北京(18)、包头(11)、乌海(6)、济南(20)、青岛(9)、烟台(17)六座城市,城市数量显著增加。说明生产层面的人均收入,南方城市明显高于北方城市,南北差距较大。经过物价水平的调整后,北方城市排名有所提升,南北差距缩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前20位的北方城市有北京(2)、天津(17)、包头(14)、乌海(15)、济南(18)、青岛(13)六座城市,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进入前20位的城市有北京(12)、包头(6)、乌海(7)、沈阳(16)、济南(17)、青岛(13),仍然是六座城市。说明经过物价水平的调整后,生活层面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北方城市排名提升不明显,南北差距与名义收入相当。

第二,区域收入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名义收入的空间关联格局更多地反映各地区在未经物价调整前的经济活动和收

入水平,实际收入的空间关联格局更能准确地反映各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两种收入的空间关联格局及其差异,以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比较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空间关联格局的差异,分别计算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Getis-Ord G_i^* 值,根据Getis-Ord G_i^*Z 值的大小, $|Z| > 2.58$ 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显著,为热/冷点区; $1.96 < |Z| < 2.58$ 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次热/冷点区。高值地区表示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在周围集聚,低值地区表示收入水平低的城市在周围集聚。

区域收入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见表6),热点区域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绍兴均位于长三角,较高收入的北京、天津以及福建、广东等省份的沿海城市实际收入下降,为次热点区域。长三角地区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均是高值集聚最强的热点,该地区的居民收入高、购买能力强,实际生活水平是最高的。区域收入的低值集聚区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见表7),云贵川、陕甘宁以及中部省份和东北的偏远地区,名义收入水平不高、物价也不低,这些区域的居民名义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也弱,实际生活水平是最低的。

表6 区域收入 G_i^* 高值集聚地区分布

区域	城市	名义收入排名	实际收入排名
长三角 (热点区域)	上海	1	11
	南京	7	4
	苏州	5	1
	南通	16	19
	杭州	6	8
	宁波	8	5
	绍兴	10	2
珠三角 (次热点区域)	广州	4	15
	深圳	3	21
	惠州	28	36
福建沿海 (次热点区域)	福州	22	39
	厦门	9	10
	泉州	21	25
京津 (次热点区域)	北京	2	12
	天津	17	3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

表7 区域实际收入 G_i^* 低值集聚地区分布

区域	城市	名义收入排名	实际收入排名
云贵川	昭通	100	100
	楚雄州	87	85
	安顺	96	98
	遵义	80	86
	乐山	99	99
陕甘宁	平凉	97	97
	吴忠	95	90
	汉中	91	92
	渭南	89	87
中部	邢台	88	82
	大同	78	81
	运城	90	88
	周口	98	96
东北	吉林	85	84
	铁岭	93	94
	牡丹江	94	9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

综合考虑收入和物价两个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小得多,区域收入差距并没有用名义指标衡量的那么大。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大多是东南沿海核心城市,实际收入水平提升的大多是中西部城市。东部核心城市经过物价水平调整后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例如,长三角区域居民名

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水平都很高、购买能力强,具有较高的实际生活水平。而西南、西北、中部及东北部分地区,大部分名义收入较低,虽然总体物价水平不高,经物价指数调整后实际收入排名有所提升,但实际收入水平及购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是实际发展最落后、居民生活水平最低的区域。

五、缩小区域收入差距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实际区域收入差距与名义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并不一致,总体上实际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且较为严峻。缩小区域收入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1. 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区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差异等方面。不同地区居民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会影响各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较高,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较低,同时各地区物价水平的差异又增加了收入差距的复杂性。上文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分析表明,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不一致导致我们不能准确地衡量区域收入差距。从收入与物价水平一致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收入与物价水平相对一致,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与物价水平差距较大,应根据二者的名义收入与物价水平的差异程度有针对性的分类调控。针对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的这些特征,促进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政策和措施。

2. 实际收入受价格因素影响显著

居民购买力是影响消费和居民生活的重要因素,而地区物价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居民的购买力。经济发展水平是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基础,利润、技术水平、收入水平、市场完善度等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而商品的生产价格、供需状况、从商品到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市场完善度、地理区位、交通成本)等共同作用导致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存在差异。地区物价水平深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物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是多个层面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居住、教育、医疗的地区间价格差异最大,同时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受到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国家财力以及经济政策调控力度等的影响和制约,在经营者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房价高、看病贵、教育收费乱的问题。各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缺乏准确全面的统计数据,对测算和比较地区购买力和实际收入差异带来诸多限制。

3. 市场化程度差异影响收入差距

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是导致区域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第一,从区域角度,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对地区收入和物价水平均有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市场化进程较快,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企业。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市场化进程较慢。第二,不同行业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说,新兴产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新兴产业和高科技行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收入水平也比较高。第三,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也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政策因素在市场化程度差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例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是为了促进特定地区或特定行业的发展,从而可能加剧或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进而影响地区间的收入差异。

4.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质量是影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入,改善了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存在差异,导致各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程度不同。一些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丰富,而欠发达地区则较为薄弱,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待遇差异不尽合理。第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已经覆盖了广大城乡居民,但是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有待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其社会权益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第三,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力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们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一些社会服务机构也存在服务质量不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导致供需矛盾突出。

六、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平衡增长是中国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促进各地区物价水平的合理和公正、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缩小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区域民生质量均衡和共同富裕。

1. 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购买能力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在物价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名义收入越高,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也越多,因此,提高居民实际购买能力首要的是增加居民收入。具体来看,可以从发展经济和改善分配两个角度,通过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措施,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素质的提升,尤其是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例如,通过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加强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技能和素质,增强居民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应以提升居民收入和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平衡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收入为目标,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例如,可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根据实际收入水平调整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使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转移支付保障,缩小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同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减轻居民的税负,增加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2. 发挥价格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物价水平合理

地区物价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的购买力。价格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之一是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一是要发挥价格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市场调控为主导、政府调控和引导为辅助,规范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价格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持价格水平的合理性。例如,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对居民收入购买力的影响增大,应完善房地产市场,破解土地财政困境,通过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抑制房地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医疗方面应继续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逐步理顺“以药补医”等不合理的价格机制,降低虚高药价,调整医保药品目录,重点解决重大疾病的用药问题。二是要完善市场机制和价格监管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价格监管体系,规范市场主体的定价行为,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同时,要加强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并解决价格异常波动问题。三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供需平衡,从而稳定物价水平。四是要防范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和措施,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物价造成的不利影响。五是要定期公布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信息,增加物价信息透明度,加强对购买力和实际收入水平的测算和研究,方便公众了解市场动态和价格变化趋势。对物价的调控是维持物价合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但仍应以市场调控为主导、政府调控和引导为辅助,避免对价格的过度干预。

3. 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秩序,缩小市场化程度差距 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是形成价格差异的

重要因素,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秩序、缩小市场化程度差距是实现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减少市场分割、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各地区之间物价的合理稳定。深化市场改革、提高市场完善度,是缩小地区间物价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一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升级流通网络、畅通信息交互、丰富平台功能为抓手,着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建设现代流通网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加大对通信网络、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打造高速、稳定、安全的联通通道;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推动各个产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从而实现市场设施的高效联通。通过提高市场设施的联通水平,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二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政府应加强对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性的顶层设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市场行为;推动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市场、生态环境市场,促使区域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的自由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格局,提高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市场秩序。通过建立跨地区的联通协调机制,引导和鼓励各区域消除市场分割和壁垒,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尽量放开有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形成多部门协同监管的格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4. 增强欠发达地区财政投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是缩小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重要手段。初次分配奠定了分配的基础性框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分配制度基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同时,也必须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政策的调节力度和

精准性,使再分配与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协调、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满足自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能力也较低,国家财政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应重点侧重于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物价水平较高的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投入有助于阻止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等公共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超过发达地区。但是目前国家有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被转换成投资,而用于转移支付和公共投入的明显不足。因此,一方面,应增强国家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投入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公共财政向明显投入偏低的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项目倾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公共财政在民生方面增加投入时,应侧重于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这是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应继续完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应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实际收入水平,科学规划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同时,要注重公共设施的多元化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扩大医保覆盖面和强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等,完善提升住房、医疗、

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

参考文献

- [1] GARDINER B, MARTIN R, TYLER P. Does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crease national growth? some evidence from Europ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6): 979—1006.
- [2] 蔡昉.优化人力资本,冲刺高收入阶段: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笔谈[J].*经济研究*,2020,55(1).
- [3] 樊杰,王亚飞,梁博.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J].*地理学报*,2019,74(12).
- [4] 樊杰.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J].*地理学报*,2014,69(8).
- [5]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
- [6] 刘修岩.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对中国省级层面集聚效应的检验[J].*世界经济*,2014,37(1).
- [7] 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9,35(10).
- [8] 闫梅,李国平,黄金川.中国地区价格指数测度与空间分异[J].*地理研究*,2019,38(6).
- [9] 杨长江,徐盛.长安缘何米贵?中国地区间相对价格水平研究[J].*世界经济*,2021,44(8).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Yan Mei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narrow the income gap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growth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income level equilibrium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parity of region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taking 100 cities as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p of regional real incom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nominal income. The real income level declined mostly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core cities, and the real income level increased most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the price, the real income level of the core cities in the east has declined, but it is still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northeast. However, due to relatively low real income levels and purchasing power, parts of southwest, northwest, central and northeast China are the regions with the lowest living standards for residents. In order to narrow the actual regional income gap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 and purchasing ability of residents, promoting a reasonable and fair price level, establishing a unified and perfect market order, and guarantee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ppl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Disparity; Real Income; Spatial Disparity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静田 付晓东

摘要: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有区位、制度、产业、国际合作等优势,也存在高标准统筹规划不完善、部门协调和行政审批障碍多、数据要素市场不健全、数字金融风险频发、核心技术和数字人才不足、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不高等挑战。数字经济通过数字生产力,夯实发展动力与经济基础;通过数字分配力,促进成果共享与共同富裕;通过数字流通力,推动要素流通与创新格局;通过数字消费力,实现数实融合与供需匹配;通过数字整合力,优化治理效能与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合作区的高质量发展。面对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合作区应发挥五大合力优势,优化顶层设计、加强数据安全治理、防范新型金融风险、突破技术与人才短板。

关键词:数字经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机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77-08 **收稿日期:**2024-04-02

***基金项目:**2023年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023GDDXXT030);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度课题“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2023JNUZS01)。

作者简介:王静田,女,中共珠海市委党校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珠海 519000)。

付晓东,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依托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其蕴含的创新潜力和发展动能,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全球主要国家竞相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Moroz, 2017)。比如,美国聚焦前沿技术构建数字经济话语体系,欧盟培育数据生态打造全球数据赋能社会的典范,英国以建立数字强国为导向,新加坡致力于成为亚洲领先的数字经济体。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许多省市也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北京重点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海着力建设国际数字之都,广州着力打造数产融合的数字之城,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深圳,杭州明确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粤港澳大湾区也抢抓机遇,全力打造“数字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简称“合作区”)的开发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如何紧抓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用好澳门自由港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有利因素,提高合作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是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重要任务。

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

讨。一是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在释放消费潜力、拉动投资、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航等,2019)。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度,优化要素配置、实现规模经济、促进产业融合与创新驱动,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曹建飞等,2024;任保平等,2022)。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黄阳华等,2023;陈梦根等,2023)。二是数字经济对政府、产业和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需要从内容、载体、机制、监督、评价五个方面进行政府监管方面的转型(王岭,2024)。数字创新加快形成平台型制造业企业,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小微企业内涵式发展,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周名丁等,2024)。数字经济通过克服服务业鲍莫尔病,激发创新活力,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等途径促进服务业的现代化和融合化,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叶胥等,2024)。数字经济提升了乡村产业数字生产力、流通力、分配力和消费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田昕加等,2024)。三是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供应商全要素生产率(李青原等,2023)。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黄先海等,2023)。数字技术的创新能显著提升并购公司的市场价值,促进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蔡宏波等,202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创造条件。2009年,横琴新区挂牌成立。2015年和2021年,横琴自贸试验片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利好政策相继颁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相关研究逐步推进。横琴合作区面临许多困境,合作区形成了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也面临着跨区治理、跨境治理和跨制治理的挑战(鄞益奋等,2023)。合作区科技创新基础难以支撑澳门产业发展,创新要素跨境流通不畅,高端人才集聚机制尚未健全(邹建伟等,2023),实体经济发展尚不充分(赵超,2022),且存在产业渗透性差、与澳门“适度多元化”衔接不够适配等问题(杨英等,2022)。为此,合作区建设需要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经济特区立法权,通过两地协同立法和司法合作,加强规则衔接(李可等,2022)。合作区要把握创新驱动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主线,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聚引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资源,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武汉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究课题组,2021)。要加强产业、民生、旅游、制度方面的深度合作,满足多元人群发展诉求(方煜等,2022)。

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与发展进行了许多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遗憾的是,由于数字经济对传统理论与实践的颠覆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特殊性,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缺乏对其内在机制和路径等问题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合作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与挑战,其次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赋能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最后提出数字经济赋能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与挑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位于珠海南部,珠江口西岸,是横琴岛“一线”(横琴与澳门)和“二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106平方千米,可开发面积33平方千米,与澳门一水一桥相连,是国内唯一与港澳路桥相通的国家级新区。合作区虽面积有限,但对于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和粤港澳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重要的政策区、试验区、引领区。

1.合作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四大战略定位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合作区的三步走战略是到2024年,初步建立琴澳一体化格局,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顺畅运作,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到2029年,琴澳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全面建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琴澳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

基本实现。合作区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发挥澳门—珠海极点的势能,还能加强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打造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投资环境,形成“港澳平台+内地基础+国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发展新模式,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价值化五个部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推进数字产业化方面,要“建设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生态,构建数字内容创作生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赋能实体经济和城市发

展”;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要“规划建设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等专业园区,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治理方面,要“依托省域治理数字化总平台,建设合作区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和数据中台,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要“构建智慧泛在的物联感知体系,推进‘双千兆’通信网络建设,建设大数据中心,推动一批创客空间、孵化器和科研创新载体建设”;在数据价值化方面,要“探索建立数据产权保护利用、跨境数据监管、数据市场开放等方面的制度”(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及合作区目标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数字化基础设施	数据价值化
细分领域	数字产品制造业	智慧农业	数字政府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数据采集
	数字产品服务业	智慧制造	数字社会	数字融合基础设施	数据确权
	数字技术应用业	数字商贸	—	数字创新基础设施	数据交易
	数字要素驱动业	—	—	—	数据保护
合作区目标	建设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生态,构建数字内容创作生态	加快构建特色微电子产业链,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	建立琴澳融合的智慧应用体系,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客空间、孵化器和科研创新载体	强化数据资源体系与公共运行平台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整理。

2.合作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具有独特的区位、制度、产业基础、国际合作等优势,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一定建树,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第一,横琴合作区高度重视顶层设计,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横琴先后出台了区块链、人工智能、5G网络建设、元宇宙产业、数字人民币试点等若干扶持措施,将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作为横琴四大重点产业方向之一。在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方面,横琴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澳门《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也提出,要“加快推进类脑智能超算中心建设。积极发展元宇宙产业,打造元宇宙超级试验场”。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0.74亿元,吸引了一大批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然而,横琴在推进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高层次、高标准、多机构的统筹谋划,核心技术和数字专业人才短缺,在人力和资金投入、部门协调部署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二,横琴合作区的数字产业化稳步提升,产业数字化面临诸多挑战。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横琴

充分利用澳门集成电路的优势,稳步推进横琴先进智慧计算平台永久基地建设和半导体芯片制造项目的落地,开展元宇宙产业招商工作,加快产业布局和企业集聚。然而,相比于北上广深杭等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横琴还没有形成像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样的龙头企业,数字产业链不够紧密、辐射力不足,半导体芯片、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自主能力也有待提升。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横琴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跨境电商虽快速发展,但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赋能范围有待提升,跨境数据要素流通存在多重障碍,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诸多挑战。

第三,横琴合作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横琴新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国际数据中心项目、澳门四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分部落户横琴。横琴与澳门建立了双边信息交换中心,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两地的政务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信息得以互通共享。但数据中心和基站的建设都需要很高的能耗、用地指标,数字基础设施前期的巨额投资又进一步抑制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用地、用能、资金、审批等问题是制约横

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

第四,横琴合作区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横琴合作区先后开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物业城市”等服务,出台了跨境办公试点政策,85%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申办,50%的政务事项实现“网上全流程办理”,利用小程序开展“非接触式”服务,为横琴和澳门的企业居民营造便利的营商、生活环境。但是实际运行中,跨部门事项存在权责交叉问题,P2P平台暴雷、数字金融欺诈频发,数字治理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数字化治理的制度环境、数字金融业系统性风险防控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五,横琴合作区的数据要素开发处于起步阶段。横琴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建设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建成智慧城市物联网实验室,实现澳门到横琴的跨境光纤互联、共享,这些都为横琴跨境数据的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持。香港、澳门、广深等地的高校在数字经济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合作区可以享有充沛的数字人才储备。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对科技创新制度的试点工作,也可为横琴跨境数据的制度设计提供经验借鉴。但合作区的数据开发利用、要素市场化配置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数据开放共享的水平不高,政企学研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要素的价值尚未得到完全发挥。

三、数字经济赋能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通过厘清数字经济内核功能与特征,构建一套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重点观察数字经济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反应,考察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价值化五个方面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新动能和引擎。

1. 数字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实融合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重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融合经济,

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共享性、即时性、倍增性、融合性和外部经济等特征,可以降低地理约束、产生范围经济、减小数字鸿沟、推动融合创新、形成爆炸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因其强大的内核特征,通过数字生产力、数字分配力、数字流通力、数字消费力、数字整合力对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多样的外部作用、推力与合力(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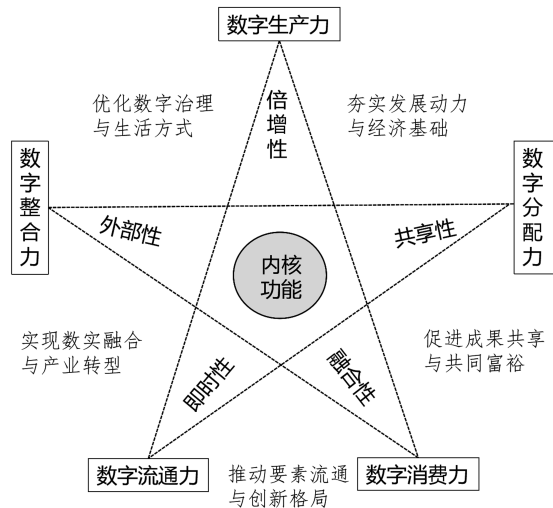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 数字生产力机制:夯实发展动力与经济基础

数字生产力的倍增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有利于做大蛋糕,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基础。数字经济时代,掌握更高水平数字知识和技能劳动者是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劳动要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人类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数据是重要的劳动对象,数字化要素、科技、管理、知识和信息的相互渗透融合,促进了数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优势明显,深圳是全国超级创新基地,广州是人才培育高地、特别是数字经济的算力算法优势突出,珠三角具有生产制造优势,香港有对接国际的传统渠道与关联优势,澳门有联系葡语系国家的便捷通道。作为国内唯一与港澳路桥相通的国家级新区,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是国内最大的AI算力中心,横琴可以充分利用澳门与葡语系国家密切合作的优势,在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与大湾区各城市建立合作共赢的新

机制。

3.数字分配力机制:促进成果共享与共同富裕

数字分配力的共享性影响收入分配方式和结构,有利于分好蛋糕,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数字经济可以改变信息传递方式,打破时空界限,减弱空间距离的影响,弱化地理资源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连接与协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弱化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限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缩小了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增强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中小城市、落后地区也可以获得发展机会。数字平台的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推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服务均等化,偏远地区也可以得到教育、医疗等服务。横琴合作区应当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深入推进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畅通两地数据信息流动,加强澳门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数据信息共享。

4.数字流通力机制:推动要素流通与创新格局

数字流通力的即时性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数据、知识信息共享和创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加快了信息和数据的流通速度,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产品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形成范围经济。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借助平台降低了产品仓储、运输和销售成本,缩短了产品流通时间,实现了产销之间的精准匹配,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家、工程师等掌握数字技术的高端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数据与知识的流通、共享有助于形成创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打造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如港珠澳大桥、广佛高铁、深中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交通工程的建设和完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前沿平台又不断进行创新体制的突破。横琴具有税收政策优势,对于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对在横琴工作的高层次人才,超过15%的税率予以免征。合作区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下,可以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探索大数据交易市场,发挥数据要素的最大效能,引导企业加快技术研发,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还可以加

强与港澳的政策对接,与澳门联合设立重点实验室,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横琴企业与港澳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制定数字经济课程体系、数字人才认定和评价办法,实现人才要素的流动,形成“虹吸全球资源+汇聚全球智慧+协同创新”的创新格局。

5.数字消费力机制:实现数实融合与供需匹配

数字消费力的融合性推动了数实融合与供需匹配,有利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产业边界愈发模糊,在竞争中不断催生一系列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经济方式发生变化,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匹配。传统的地理集聚与地理协同变为线上集聚和线上协同,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便捷地了解各自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促进了消费内容的网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消费者可以快速搜索所需产品的信息,生产者可以及时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库存等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经济发展不充分、缺乏龙头企业与高端人才要素等问题,而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是产业链相对完善的制造业基地,是数实融合的示范地。横琴应当给予资金、政策、配套设施等吸引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落户发展,引导金融信贷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予以支持,构建与澳门对接的政策体系,推动横琴跨境电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信息等科技攻关与产业突破,扩大数字产业规模效应。横琴还应当抓住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加大对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支持数字技术在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农业、现代物流、教育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6.数字整合力机制:优化治理效能与生活方式

数字整合力的外部性优化了数字治理效能及大众的生活方式,在规范的法规约束下,数字经济可以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正向的外部性。数字化治理是基于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包括对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探索。数字化的发展代

表着信息量的快速增加,而良莠不齐的数据信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数据筛选与监管。数字技术可以赋能政府治理,提升政府政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打破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众能够实时监督政府行为,推动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革新了政府传统的办公方式,克服了“经验决策”的弊端,借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搜集分析数据,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政务处理效率。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构建远程医疗平台、教育资源平台、线上文娱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了跨区域、跨城乡的公共服务合作与共享,更新了大众的生活方式。

横琴致力于构建与港澳相适应,与国际规则相接轨的体制机制,2018—2020年连续三年获评“最佳营商环境成就奖”。横琴亟须建立健全数据采集机制,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务数据分级分类共享机制,有序开放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城市管理等应用场景,推进电子证照等政府服务改革,实现基层治理、监管执法、便民服务等数据对接,推进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监管效能,优化大众生活。

五大机制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动、联动、共同施展着巨大的功能,形成合力,显现出数字经济前所未有的颠覆力、整合力、推进力。

四、数字经济赋能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合作区应从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加强数据安全治理、防范新型金融风险、突破技术与人才短板等方面发挥数字经济五大合力的赋能优势。

1. 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一国两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发挥两种制度上的优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目的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一是在顶层设计方面,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合作区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用一种特殊的监管体制和制度安排去融合两种制度,推动一些规则、机制、公共服务、社会

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衔接,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发挥“两制”优势的深度合作区。比如,在数字监管和评估方面,要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条例、法规的制定,聘请国内外专家团队,为合作区的建设出谋划策,检查和监督数字经济建设的各种方案,加大数字经济建设的考核力度,评估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二是在数据立法方面,出台包括数据确权、数据流转、数据共享等一系列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数据的产权确定、数据性质分类、开放对象和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数据定价、收入分配等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规则体系和机制,为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三是在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建设数字人才库,推进数字人才信息化管理,加强人才的产学研合作。四是在产业方面,融合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数据链,打通数实融合的痛点和堵点。五是在人员出入境管理方面,在“一线”管理上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与澳门直接并轨,建设无障碍通道,让澳门居民,特别是专业数字技术人员能自由进出横琴合作区。在“二线”管理方面,探索横琴合作区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成果向内地辐射和内地赴横琴发展的政策设计。六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推进政务服务“跨境通办”,在货物进出口、市场准入清单、备案制度、投资者资质、税收优惠等方面,全面促进与澳门监管标准接轨、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电子签名互认通用标准,提升“一网通办”服务效能。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允许 Facebook、推特等境外网站在横琴合作区运用。

2. 加强数据安全治理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数据安全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紧迫和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一是数据滥用和“数据孤岛”问题急需解决。企业“上云用数赋”牵涉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诸多商业机密,若这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与保护,则会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不断出现,网络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滥用数据问题屡见不鲜,数据确权和定价机制不清晰,数据流通在技术层面缺乏统一的标准,数据安全治理面临困境。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推动跨层次、跨地域、跨部门、跨组织的数据互联互通,打破部门、机构间的“数据孤岛”问题,利用大数据手段提升政府数据治理能力。打造配套支撑,比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

和其他计算科学和前沿技术,以促进数据的传输、存储和应用。要探索建立国际互联网跨境数据管理体系,促进数据要素资源高效便捷流动。二是数据标准不统一问题急需解决。横琴的区位优势、产业、人才和政策红利为跨境数据交易提供便利,尽显“一国两制”之便。但是数据跨境的背后是利益的冲突,由于横琴的独特性,政府部门缺乏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数据标准不统一,无法实现数据共享互联互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促进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框架下,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研究建设固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绿色通道,探索形成既能便利数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机制”。对于横琴合作区而言,要在法律协同、技术支持、人员管理等方面加强举措,处理好粤澳两地的法律协调和衔接问题,在遵守国内法律和尊重澳门习俗的基础上,协商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要求,创建有利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则体系。

3. 防范新型金融风险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在线银行、金融服务外包、在线贷款、在线保险、在线基金等金融服务的出现,同时也带来网络贷款、数字监管受限、隐私泄露、征信系统不健全、非法集资等新型金融风险。一是数字经济具有虚拟化的特点,现有的税收征管方式和征管手段难以满足对经济数字化的征税要求和税收信息共享的界定。根据对相关部门的座谈得知,跨境交税问题、在澳门自助办税系统上部署广东税务业务功能的对策等都是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横琴应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变革机遇,探索契合澳门的金融开放和跨境金融深度合作方法。横琴应积极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好地与葡语系国家合作,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创新发展财富管理、债券市场、融资租赁等现代金融业,加快澳门金融业的服务外溢,开展境外发债、跨境资产转让、并购融资等业务。二是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交叉网络效应及算法和算力导致的“监管脱敏”,导致平台经济极易出现垄断问题,比如大数据“杀熟”、虚假评论、恶意差评、挤对竞争对手、规避监管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屡见不鲜。横琴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离岸金融的重要开放和创新平台,需要明确平台经济的市场范

围,提高反垄断监管和技术识别能力,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的新监管模式,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4. 突破技术与人才短板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化人才供不应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桎梏。一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横琴在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卡脖子”领域,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些关键领域的数字软硬件技术,比如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和传感器、光刻机、基础软件、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仍然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攻破。合作区应充分利用毗邻港澳,与葡语系国家紧密合作的的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二是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存在瓶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澳门、紧邻香港、面向东南亚,区位和交通优势十分明显。拥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分部。但是合作区面临人才瓶颈问题,比如,人才引进政策缺乏力度,本土的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吸引人才的配套设施仍然不够,人才聚集效应尚未形成,人才的区域争夺愈发激烈等。合作区应当强化制度创新、平台建设、服务保障,汇集全球创新科技人才,围绕琴澳所需,聚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所需要的产业人才,推动与澳门大学电子强校、研究机构合作,多渠道培育数字人才,加快国际高端人才和澳门优秀青年人才的聚集。

参考文献

- [1] MOROZ M.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oland and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Foundations of management, 2017, 9(1): 175—190.
- [2] 刘航, 伏霖, 李涛, 等. 基于中国实践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 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 [J]. 经济研究, 2019(3).
- [3] 曹建飞, 李凯. 数字经济、资源错配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兼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 [J]. 调研世界, 2024(4).
- [4] 任保平, 李培伟. 数字经济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机制与路径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 [5] 黄阳华, 张佳佳, 蔡宇涵, 等.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 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0).
- [6] 陈梦根, 周元任. 数字经济、分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10).

- [7]王岭.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研究[J].管理世界,2024(3).
- [8]周名丁,胡春生.数字创新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24(3).
- [9]叶胥,蔡睿堃,龙燕妮.数字经济如何有效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24(4).
- [10]田昕加,章刘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4(3).
- [11]李青原,李昱,章尹赛楠,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3(7).
- [12]黄先海,高亚兴.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3(11).
- [13]蔡宏波,韩金镛.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24(5).
- [14]鄞益奋,曾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共管体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 [15]邹建伟,张明,唐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困境及对策:以科技创新领域为主要观察视角[J].特区经济,2023(4).
- [16]赵超.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J].广东经济,2022(9).
- [17]杨英,李媛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强极”为着力点的建设思路研究[J].中国发展,2022(4).
- [18]李可,唐晓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J].港澳研究,2022(1).
- [19]武汉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究课题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新驱动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10).
- [20]方煜,白晶,李林晴,等.以多元人群融合推动粤澳深度合作路径探讨:以横琴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2(S1).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Wang Jingtian Fu Xiaodong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has advantages in location, system,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aspects in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t also has challenges such as imperfect high-level overall planning, many obstacles in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imperfect data element market, frequent digital financial risks, insufficient cor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alents, and low level of industrial Internet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economy solidifies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hrough digital productivity, promote achievement shar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digital allocation of power, promote factor circulation and innovative patterns through digital communication power;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and match supply and demand through digital consumption power; optimiz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lifestyle through digital integration, thereby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on zone. Fac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ooperation zone should leverage its five major strengths, optimize top-level design, strengthen data security governance, prevent new financial risks, and break through technological and talent gap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Mechanism

(责任编辑:江 夏)

【区域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机制、异质性及策略*

庄贇 吴自炜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措施,对于促进产业绿色化转型、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机制传导作用;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提升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面对长江经济带在利用数字经济推动绿色发展时仍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和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低等问题,建议通过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激励企业创新及培养高端人才等策略,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江经济带;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85-09 收稿日期:2024-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质量公共服务空间极化破解及均等化路径”(22BJL084);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福建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FJ2024A003)。

作者简介:庄贇,女,集美大学财经学院教授,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经济系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厦门 361021)。

吴自炜,男,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硕士生(厦门 361021)。

一、引言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这表明,党和国家积极提倡保护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要避免以往利用环境和资源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做到有机结合,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实现经济绿色化、可持续化的发展目标。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3)》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已达到50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超过四成。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通过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活力,为产生具有高科技、高效能的新型生产力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能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在验证数字经济是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提供具体的路径指导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本部分着重对数字经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与可能的边际贡献

关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李金林等(2021)证实了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程文先等(2021)指出数字经济对工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张帆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环境规制有负向影响。诸多专家学者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一是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保护好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神,从地理区位上聚焦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研究结论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二是研究思路创新,首先,从政府政策、企业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等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机制;其次,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三个维度,深入研究它们在两者关系中起到的间接传导机制。这一系列研究结果能够为建设数字强国和绿色低碳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节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1.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层面,它促进了绿色生产模式的形成;政府层面,它优化了环境监管体系;社会层面,它增强了公众的监督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向更加绿色协调的方向发展。首先,数字技术助力企业资源整合与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促进绿色发展。其次,政府利用数字技术革新环境监管模式,实现环境数据的动态管理与高效决策,提升环境质量,进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数字技术搭建公众监督平

台,强化社会监督参与,形成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促进环境状况实时监督与污染行为反馈,推动企业减排,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影响。

2.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凭借东部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人才,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AI、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高效应用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交流与共享,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坚实基础。相对而言,中上游地区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仍有不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人才吸引力较弱,无法发挥出人才集聚优势,因此,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相对缓慢。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位异质性特征。

3.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传导机制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不断更新迭代,物联网、云计算、AI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而且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的崛起,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这一升级过程,使得经济系统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得以更有效地转化和协调利用,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附加值和整体生产效率,并显著减少资源的损耗和浪费。这种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体现在环境效益上。新兴产业的崛起带来了众多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涌现,这些创新推动了经济的绿色化转型。因此,数字经济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和资源节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机构和企业间得到有效解决,这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快速且准确地为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信贷资金支持。这一变革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绿色创新

研发中,从而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企业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借助先进的绿色技术,能够拥有深入挖掘现有资源和能源的潜力,实现更高效的利用,减少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节能环保,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而且通过技术升级和改造,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有利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借助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搭建起数字网络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技术知识的高效、广泛传播。这样的平台将知识资源迅速、便捷地共享到各个网络终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知识的获取与分享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这种变革不仅提高了人与人之间合作交流的频率,更推动了当地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直接增强了劳动生产率,还通过优化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有效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投入,提升了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进而可以显著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数字经济通过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和知识共享机制,不仅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更间接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H3: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增强人力资本水平,形成了一套综合作用机制,间接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研究设计

本节在对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以及其余变量进行测度说明的基础上,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和机制模型以实证检验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

(一)变量测度与样本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本文借鉴杨翔等(2015)、刘钻扩等(2018)等多位学者的做法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进行测算。选取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衡量指标,将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数作为劳动力投入衡量指标,将全社会用电量作为能源投入衡量指标,将各城市实际GDP作为期望产出衡量指标,将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的组成部分。采用Matlab软件进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由于测算的GML指数以及分解指数是基于相对效率的结果,衡量的是第*t*期到第*t+1*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故本文参考聂长飞等(2021)的方法,将2011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为1,乘以2012年对比2011的GML指数,得到2012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类推,计算得到各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测算了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所使用的投入产出变量以及最后测算得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表1 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投入产出变量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单位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本存量	亿元	1296	15049	15725	1435.8	140000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万人	1296	68.9099	108.8557	2.1400	986.8700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1296	163.7887	234.8532	3.3083	1574.3
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296	3163.7622	4245.5486	178.5010	38471.3789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1296	6667.0633	8388.2351	113	71307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1296	38.1423	1263.8	0.0124	45500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万吨	1296	2.3424	5.6094	0.0229	134.7367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i>GTFP</i>)		1296	1.1596	0.4887	0.1912	5.439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各年公开统计资料计算。最新一期的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2023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两个指标自2019年后不再公布,观察这两个指标的变动趋势符合线性时间序列趋势,运用Stata软件的线性插值公式补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得到。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在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应当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方面。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拥有极快的信息传输能力,使得知识溢出效应不再受限于空间距离,同时还促进了企业间、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交流,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进而有利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金融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贷资金支持,降低了绿色金融投资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激发了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时,

借鉴刘军等(2020)和赵涛等(2020)的做法,将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指标构建的基础。对于互联网发展水平,以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关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使用郭峰等(2020)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含3个细分指标)来衡量。采用功效系数法对上述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过熵值法对其进行赋权,再加权综合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及测算得到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表2 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及综合发展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单位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百人	1296	26.0923	17.2970	2.6687	181.8552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1296	1.3257	1.0516	0.0127	8.6979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元/每人	1296	869.9559	948.9477	45.0653	16809.3613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户/百人	1296	96.6856	32.5574	24.5530	245.8800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	1296	185.1004	77.3287	5.1000	378.9101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	1296	197.0276	72.7802	13.2800	377.8900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	1296	226.0428	87.3819	7.9000	437.9100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		1296	0.1112	0.0848	0.0166	1.574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各年公开统计资料计算。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2011—202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C)”,其他指标来源于2012—202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通过熵值法加权测算得到。

3.控制变量(X)

为了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主流学者的做法,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PGDP)、外商直接投资(FDI)、科研投入水平(RD)、人口密度(POP)、基础设施水平(POAD)五个控制变量。

4.机制变量(Media)

(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IS)

产业结构升级应该涵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因此本文借鉴徐敏等(2015)的做法,引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IS_{it} = \sum_{n=1}^3 q_{nit} \times n$$

其中:IS_{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q_{n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产业n增加值占总

产值的比重。

(2)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E)

大多数学者认为专利的创新性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故本文选取当年各城市授权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占年末专利总授权数量来衡量。

(3)人力资本水平(HUM)

人力资本的衡量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袁航等(2018)的做法,采用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与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根据上述变量测度方法计算得到的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控制变量和机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

表3 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控制变量和机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PGDP</i>	人均实际GDP的对数	1296	10.8263	0.6225	9.0912	12.5739
<i>FDI</i>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	1296	2.0477	1.7976	0.0002	9.3172
<i>RD</i>	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	1296	0.3976	0.3229	0.0014	2.4508
<i>POPU</i>	年末总人口与行政面积的比值	1296	4.9201	3.0159	0.5508	23.4979
<i>POAD</i>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1296	19.3981	8.0206	1.6200	69.5600
<i>IS</i>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1296	2.3301	0.1550	1.9512	2.9575
<i>GTE</i>	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占年末专利总授权数量的比重(%)	1296	0.7357	0.1668	0.1911	1.3838
<i>HUM</i>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地区年末人口总数的比重(%)	1296	1.9640	2.4819	0.0044	18.179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各年公开统计资料计算。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E*)测算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2011—2022年的绿色专利研究数据库。外商直接投资(*FDI*)利用《2023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将美元换算为人民币,再求占GDP比重。其余变量测算的原始指标来源于2012—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二)实证模型

1.基准回归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文的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G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DE_{it} + \alpha X + x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指的是观测城市, t 指的是观测年份; $GTFP_{it}$ 是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DE_{it} 是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X 是控制变量矩阵。 x_i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 δ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2.间接传导机制模型的构建

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三条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机制,采用江艇(2022)对于因果关系作用渠道检验方法的建议,构建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Media_{it} = \beta_0 + \beta_1 DE_{it} + \beta X + x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Media_{it}$ 是机制变量,其余变量的含义同基准回归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在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验证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能否成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特征。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从表4第(1)列基准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数

字经济对被解释变量*GTFP*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GTFP*的提升。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如下几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利用主成分法计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替换熵值法综合得分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对应表4第(2)列;二是考虑到各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的经济水平、政策优势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都明显优于其他城市,可能造成结果的误差,因此剔除了样本中11个省会城市与直辖市后重新回归,结果对应表4第(3)列;三是为了克服异常值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1%和5%缩尾处理,结果对应表4第(4)与第(5)列。

表4 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i>GTFP</i>	<i>GTFP</i>	<i>GTFP</i>	<i>GTFP</i>	<i>GTFP</i>
<i>DE</i>	1.9988*** (0.3772)	0.0569*** (0.0167)	1.9115*** (0.6738)	1.6983*** (0.3733)	0.8789** (0.379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296	1296	1164	1296	1296
<i>R</i> ²	0.6020	0.5720	0.5672	0.6252	0.635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根据表4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第(2)—(5)列,我们可以发现,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剔除了各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样本数据以及处

理了异常值影响后,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的回归系数值仍然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的问题,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019)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在1984年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因为1984年的邮电历史数据是截面数据,为了和本文12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相匹配,借鉴Nunn N, et al.(2014)的研究方法,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这一变量与历史邮电数据相乘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1)	(2)
	<i>GTFP</i>	<i>GTFP</i>
<i>DE</i>	3.3884*** (0.7371)	2.6825*** (0.8710)
控制变量	NO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35.7070 [0.0000]	39.0070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31.9970 {16.38}	32.8660 {16.38}
<i>N</i>	1032	1032
<i>R</i> ²	0.0760	0.1431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5工具变量检验结果中,通过K-P rk LM统计检验和K-P rk Wald F统计检验,本文有效排除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从而确认了选定工具变量的适当性。表5第(1)列和第(3)列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H1。

(三)异质性检验

本文按照城市所在的区位进行异质性分析,将长江经济带下游25个城市区位虚拟变量赋值为1,上中游其他城市赋值为0,在此基础上,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城市区位虚拟变量(*Group*)与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DE*)的交互项,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因城市所在区位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表6报告了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交互项(*DE*×*Group*)系数为正,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可以看出相较于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对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提升效果会更加明显,从而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有诸多优势条件:国家政策倾斜程度较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吸引大量的人才并能充分发挥好人才集聚效应,加之其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国际贸易发展时间长,速度快,质量优,同国际贸易不断加深合作,为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故能够更好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表6 区位的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i>GTFP</i>
<i>DE</i>	1.1606** (0.5692)
<i>DE</i> × <i>Group</i>	0.8249* (0.4462)
控制变量	YES
<i>N</i>	1296
<i>R</i> ²	0.6046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四)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水平(*IS*)、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E*)和人力资本水平(*HUM*)提升三种途径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表7为上文构建的间接传导机制模型式(2)中三个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7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3)
	<i>IS</i>	<i>GTE</i>	<i>HUM</i>
<i>DE</i>	0.2199*** (0.0789)	0.6583*** (0.2420)	1.8702*** (0.554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i>N</i>	1296	1296	1296
<i>R</i> ²	0.2339	0.2393	0.245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7第(1)—(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DE*)对*IS*、*GTE*和*HUM*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实证检验(逯进等,2021;范丹等,2020;苏科等,2021)。因此,实证结

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设H3中的三条机制传导路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上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得以更为精准地洞察数字经济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传导机制,这些机制的发挥对于实现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位异质性,其中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下游地区较好的基础设施、更多的人才集聚和更高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可见,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要全面利用数字经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长江经济带在深化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一) 制约因素分析

1. 区域发展不平衡

长江经济带内部存在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特别是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相比,在基础设施、人才吸引力等方面存在不足,这限制了数字经济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影响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 and 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受限,制约了数字经济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其次,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和人才流失问题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尤为突出,无法像下游地区那样充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这不仅制约了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最后,国际贸易合作水平有限,中上游地区地处内陆,国际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与国际市场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都有限,这也限制了数字经济在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作用。

2. 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

长江经济带内部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这些产业往往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转型难度大,企业在技术、

资金、人才等方面可能面临瓶颈,导致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其次,新兴产业虽然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但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并不均衡,一些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新兴产业难以快速成长。因此,尽管产业结构升级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但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导致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到更具绿色发展潜力的产业,限制了新技术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直接影响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整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制约了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低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其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些创新成果在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制约因素。首先,技术市场不完善,部分地区可能存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绿色技术创新难以找到合适的买家或投资者,影响了技术的市场化进程;其次,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支持力度不足、政策覆盖面不广等问题,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和积极性受到影响;最后,融资渠道有限,绿色技术创新往往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而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的融资渠道相对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为突出,制约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深入发展。

(二) 政策建议

针对上文提到的制约因素,我们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潜力,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供参考。

1.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长江经济带内部差距

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均衡发展并缩小区域间的差距,政府应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政府需要深入研究各地区的数字经济现状和发展潜力,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确保资源能够在区域内得到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针对长江经济带中上下游地区的独特条件和发展需求,应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推动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此外,政府应优化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特别关注中上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度,提升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水平,为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建立区域间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根据各地区的特色和优势,加强信息技术的合作与共享,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长江经济带应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优化整合,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不仅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能够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内各地区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对于下游地区,应重点强化数字产业的创新能力,发挥大型企业的示范作用,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并引领整个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前进方向。对于中上游地区,政策应聚焦于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普及数字经济应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的潜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确保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都能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能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

2.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绿色升级

为了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重要途径,而利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提供改造和创新升级的支持,如智能制造、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性,关键在于完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需要优先加快5G网络、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平台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确保数字经济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同时,必须构建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以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这包括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和人才培养等综合措施,确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政策激励和支持。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增强整个经济体的活力和可持续性,从而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

3.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为了赋予绿色经济发展新的动力,需要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提升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第一,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提供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例如,云南税务部门为了更好地服务绿色经济发展,帮助企业向绿色发展过渡、转型,聚焦税费政策落实,让绿色创新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所

得税优惠政策,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为企业注入了绿色创新发展动力。第二,强化环境保护的监管和考核体系。参考深圳出台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做法,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广泛实行“探头站岗、鼠标巡逻”,通过环境法规执行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有效引导企业自觉遵守环保法规,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同时建立健全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探索推行“承诺+修订、一次办完”信用修复机制,推行企业自证履行生态环境法律义务模式。第三,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通过实施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计划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股权投资,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等多种资本形式参与企业绿色研发生产,解决他们绿色技术及绿色产品的研发资金需求。此外,可以充分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保险等多元化金融工具来支持这一领域的创新活动。同时,鼓励地方政府财政性担保机构对那些致力于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及其示范应用的企业,提供额外的融资担保和信用增强支持,进而鼓励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创新。

4. 培养高端人才,支撑绿色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是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第一,建立绿色经济人才培养基地。选择若干具有示范效应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绿色经济人才培养基地,如参考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MBA项目,专注于绿色技术、环境科学、能源管理等领域的人才培养。第二,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构建集研发载体、产业需求和创新资源于一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如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培养近1500名集萃研究生,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研究课题全部来自企业真实的技术需求和技术难题,通过项目合作、工作坊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真实的绿色经济项目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充分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提升绿色经济从业人员水平。利用中国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实践经验,提供灵活多样的绿色技术和数字经济相关课程,让在职人员也能提升绿色经济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可以开发绿色经济领域的专业认证体系,如生态环境部推出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认证,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水

平。第四,制定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开展行业调研,进行需求分析与人才定位,明确绿色经济领域的关键岗位和紧缺技能,从而确定目标人才的资质要求,如具有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管理、环境科学等背景。通过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子女教育支持等激励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并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建设支持等,以吸引领军人才。开展项目驱动的人才引进办法,参考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做法,通过绿色经济相关的重大项目和研发计划,吸引高端人才加入,为参与项目的人才提供项目津贴、成果转化收益分享等激励。第五,鼓励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际组织、海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和引进国际人才,鼓励海外人才参与国内绿色经济项目,提供签证便利、文化交流等支持。

参考文献

- [1]李金林,陈立泰,刘梅.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0).
- [2]程文先,钱学锋.数字经济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21(8).
- [3]张帆,施震凯,武戈.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南京社会科学,2022(6).
- [4]杨翔,李小平,周大川.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差异与收敛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2).
- [5]刘钻扩,辛丽.“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2).
- [6]聂长飞,卢建新,冯苑,等.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
- [7]刘军,杨渊鉴,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6).
- [8]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
- [9]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4).
- [10]徐敏,姜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
- [11]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8).
- [12]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
- [13]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
- [14]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104(6):1630-1666.
- [15]逯进,李婷婷.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视角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1(4).
- [16]范丹,孙晓婷.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6).
- [17]苏科,周超.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数据分析[J].经济问题,2021(5).

Empower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Digital Economy: Mechanisms, Heterogeneity and Strategies

Zhuang Yun Wu Ziwei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and vitality,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gtfp.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anel data of 1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2 to explore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es gtfp.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gtfp; second,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ng green technology are key mechanisms in this relationship; third, heterogeneity testing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promoting gtfp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acing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icult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low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till faces in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ptimiz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courag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cultivate high-end tale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gtfp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fluence Mechanism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内在逻辑、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向

李昀 孔维铮

摘要: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的关键力量,对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生态化转型为核心,旨在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发展差距,并通过优化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资料赋能劳动对象价值升级,实现生产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的变革之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完美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城乡融合可创新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向。形成机制方面,新质生产力外显于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因此可通过作用于上述三种生产力构成要素来提升新质生产力。为此,应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推动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加快技术创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协同发展。

关键词:城乡融合;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94-08 **收稿日期:**2024-04-03

作者简介:李昀,女,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0)。

孔维铮,男,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助教(郑州 450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迫切需求,也凸显了对城乡发展均衡化的深刻认识。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标志着我国发展策略的一大创新。新质生产力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策略,它强调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发展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即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带动乡村阶段,这就要求加快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模式(孙祥栋等,2023)。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途径,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鉴

于此,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开展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研究对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成果,相关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第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内涵特征。高帆(2023)的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与其多维内涵,突出了这一概念是如何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的。蒲清平等(2024)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细节,指出它不仅包含技术创新、知识更新等方面,还涵盖了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经济结构等多维度的变化。

王珏等(2024)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研究。第二,新质生产力实现路径与策略。胡莹(2024)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如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加快信息化建设等。同时为了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徐政等,2023a;徐政等,2023b)。第三,新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众多研究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关系。徐政、郑霖豪和程梦瑶的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徐政等,2023a;徐政等,2023b),而周绍东和胡华杰的研究则强调了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周绍东等,2024)。此外,关于教育在培养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李奕,2023)、新质生产力下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刘志彪等,2023)都进一步丰富了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与应用。

究其本质,新质生产力缘起于生产力,仍属生产力概念范畴,它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应用,赋能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水平,优化劳动对象的特性和可塑性,提升劳动资料的种类和质量,从而实现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那么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将会如何嬗变?以往研究中,诸多研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之间的紧密关系,如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王琴梅等(2023)的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促进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侯冠宇等(2024)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杜传忠等(2023)指出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促进产业间关联互动,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进而促进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张震宇(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要素流通。

由此可见,城乡融合与新质生产力两者概念的共同取向是生产要素的融合流通与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融合可赋能新质生产力要素创新发展。即新质生产力可赋能城乡融合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进一步为新质生产

力创造实践向度。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生态化转型为核心,旨在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发展差距,并通过优化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资料赋能劳动对象价值升级,实现生产效率和全面质量提升的变革之力。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从传统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具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也强调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机制。

二、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创新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和完善劳动资料的配置方式,提高城乡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另一方面,城乡融合通过创新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实践路向,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和应用。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完满实现

新质生产力所引发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变革将赋能中国城乡融合的完满实现。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能力,促进城乡劳动力的融合。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使其具备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城乡劳动力的有机融合。通过与城市交流技能和知识,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实现技术下乡,促进乡村振兴。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对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劳动对象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领域。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推动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加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促进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和融合。最后,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资料的质量和效能,推动城乡资源的融合利用。劳动资料包括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资源。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村土地的产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发展。同时,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推广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促进城乡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推动城乡资源的融合利用。

(二)中国城乡融合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向

中国城乡融合将引起实践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新向度出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与应用。首先,中国城乡融合通过促进人口流动和人才培育,创新劳动者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进一步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提供实践空间。一方面,城乡融合激活了城乡之间的互促互补的发展机制,不仅促进了城乡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融合,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样化和质量更高的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城乡融合注重提升乡村本土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其整体素质,进而提升乡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其次,中国城乡融合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创新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一方面,城乡融合鼓励农村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引领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城乡融合注重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挖乡村资源优势,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最后,中国城乡融合通过协同资源配置和完善乡村保障,创新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的配置方式和使用方式。一方面,城乡融合强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流动,实现城乡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城乡融合注重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改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

基于上述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内在逻辑,构建了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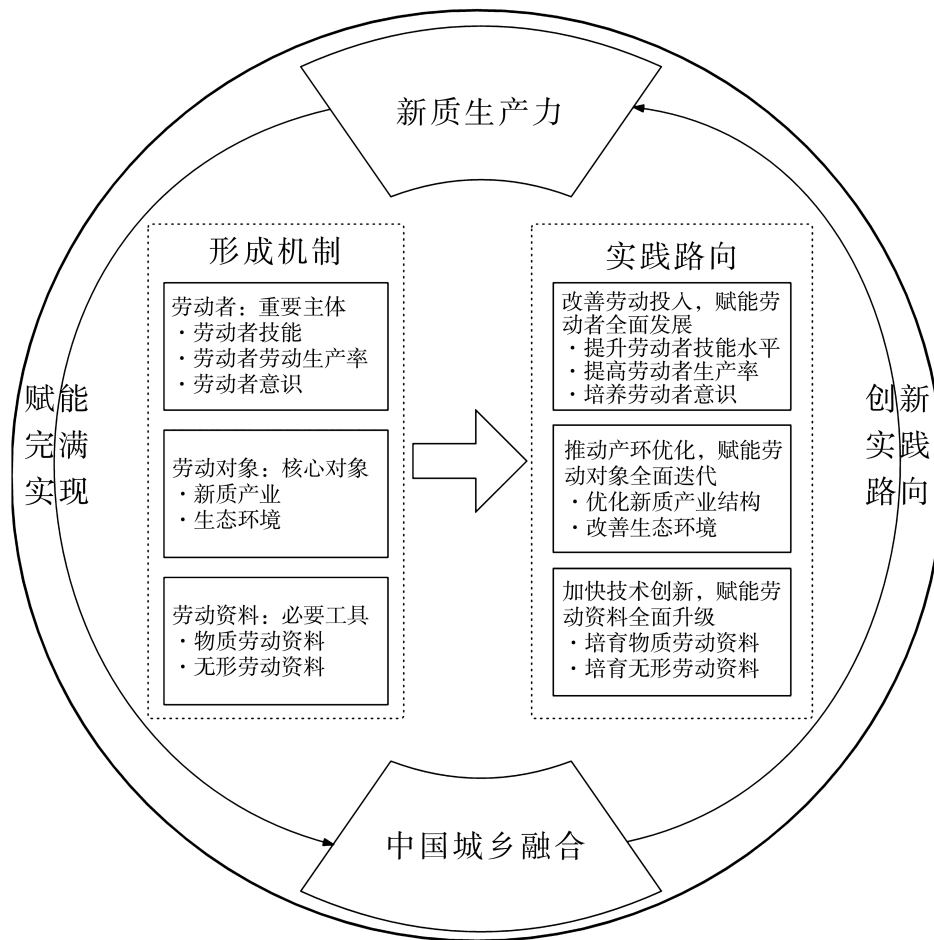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

“新质生产力”概念缘起于生产力,是生产力中的某一个要素或某几个要素在质上引起的大幅提高所呈现的创新性的变革之力,与生产力构成要素相吻合,皆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者构成。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边界逐渐消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完满实现,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呈现形式和形成机制也必将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以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为分析框架(王珏,2024),厘清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奠定后续研究基础。

(一)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主体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主体,包括劳动者技能、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意识。第一,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职业培训和教育,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新的技能和知识,适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例如,培训农民工成为高技能工人,提高他们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水平,以及在新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竞争力,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第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来实现。在城乡融合背景下,通过优化城乡劳动力要素的组织和管理,提升劳动力要素的流通效率、提高劳动过程的协同性和流程效率,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加强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鼓励他们参与技术创新和 workflows 改进,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劳动者意识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劳动者意识包括对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加强城乡劳动者意识培养,提高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可以促进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模式。其次,劳动者意识还包括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这种意识可以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中,不仅是追求技术上的突破,还要在服务模式、管理方法上寻求新的路径,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创

新和创业不应被视为高不可攀的目标,而是城乡所有劳动者都能参与其中的过程,劳动者的小创意、小尝试都可能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劳动者意识还应该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职业道德不仅涵盖了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同事的尊重,而且包括了对客户和社会的负责。社会责任意识则让劳动者在工作中考虑到自身行为对环境、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从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培养这种意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更重要的是,它能促进形成一个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

(二)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对象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对象,包括新质产业与生态环境。一方面,发展新质产业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形成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新质产业是指以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为基础的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和高创新性的特点。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展新质产业可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例如,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既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对于劳动者的健康和生产力具有重要影响。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例如,发展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态农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保护生态环境还可以提供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

(三)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工具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工具,包括物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两个方面。其中,物质劳动资料包括基础设施和能源消耗,而无形劳动资料包括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水平。这些方面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物质劳动资料方面,基础设施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城乡融合需要建

设和完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以提高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例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可以加快农产品运输速度,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此外,城乡融合还需要加强能源消耗的合理利用,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无形劳动资料方面,科技创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例如,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可以实现精准农业管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此外,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城乡信息要素的流通和共享,促进城乡居民的互联互通。例如,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民可以获取到市场信息和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

四、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向

基于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向上应当着重关注其构成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在培育以上三者的实践层面仍存在诸多挑战。第一,劳动者方面。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人口流动和职业结构变化。但是这种转变现阶段仍停留在区域性变化,而城乡融合背景下的新质就业岗位往往需要高技能、高效率和高意识自觉的劳动者。因此,亟须培育提升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劳动者的技能、生产率和意识。第二,劳动对象方面。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传统产业正在向新兴产业转型,城乡生态环境向绿色转型。但是我国产业在生产水平以及行业与地区间发展的差异依然十分突出,仍然存在新质产业培育环境缺失、城乡产业融合聚集度低和生态融合发展度低等问题。因此,亟须培育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新质产业,塑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第三,劳动资料方面。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尽管当前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乡村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城市,乡村地区资源匮乏问题尤为突出。例如,乡村地区的交通物流网络、水利电力设施以及信息网络基站等物质劳动资

料供给不足,数字化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数据管理机制等无形劳动资料仍较落后。因此,亟须加强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物质劳动资料的生产与供应,加快完善与新质生产力配套的无形劳动资料。概而言之,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存在诸多现实挑战,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等利益相关者应当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着手,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推动产环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加快技术创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

(一)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

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关注劳动者技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意识三个方面。

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适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技能。因此,培训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投入,提供技能培训课程和培训机会,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使其适应新的生产要求,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新兴产业的技术和知识,如信息技术、机械制造、生物技术等。其次,可以加强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教育,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通过开设职业技术学校 and 职业培训中心,为农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还可以鼓励农村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和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最后,积极加强农村劳动者的终身学习习惯的培养,鼓励他们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政府可以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如在线教育平台和职业培训网站,方便农村劳动者进行学习和培训。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道路。

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首先,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城乡融合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钱力等,2024)。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等群体的关注和支持,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地区旅游、投资、创业等,同时引导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居住等,促进城乡人口的流动和融合。其次,吸引高级人力资本参

与区域城乡建设。高技能和创新型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各级政府需强化对关键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但是也要加大对农村劳动者的工作保障和福利支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优质的工作条件。同时,提供多种形式的政策扶持,如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措施。最后,加强城乡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采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比如数字化管理工具和平台,以及采用更加灵活和自主的工作方式。通过这些管理创新,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着力,为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铺平道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效果。

培养劳动者意识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培养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通过宣传成功的创新和创业案例,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力和创业热情。同时,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劳动者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创新创业的支持和保障。其次,积极提升劳动者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政府可以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团队合作培训,提高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最后,积极加强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法律法规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二)推动产环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

劳动对象是劳动作用其上的物质,包括产业及其体系的形成和对自然的作用,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因此,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涉及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通过优化新质产业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可实现城乡融合的协调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下面从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细化阐述。

新质产业是指以新兴技术和创新模式为基础,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和高可持续性的产业。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培育新质产业是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践:第一,加强对乡村地区创新创业的政策

支持,鼓励和引导创业者在新质产业领域进行创新创业。政府可以提供创业资金、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支持,为乡村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第二,乡村新质产业集聚发展。通过乡村产业集聚,形成新质产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速城乡新质产业融合。通过在城乡地区建设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和创新创业基地等方式,吸引和集聚新质产业相关企业和机构,形成产业链条和创新生态系统。第三,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强新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可以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建立创新平台和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推动新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绿色转型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抓手,这需要生态环境提供供给。因此,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城乡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践:第一,保护与修复城乡生态环境。要加强城乡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可以采取在乡村地区设立生态保护区、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环境监测等方式,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第二,推动城乡绿色与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的转型,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乡村地区推广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和践行城乡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环保意识。通过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推广绿色出行和倡导节约用水等方式,引导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第三,发展生态农业,推行城乡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城乡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基金、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技术等方式,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加快技术创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用以生产和创造的媒介和手段。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涉及物质劳动资料 and 无形劳动资料。通过加快物质劳动资料 and 无形劳动资料的技术创新,可实现城乡融合的协调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下面从培育

物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两个方面进行细化阐述。

培育物质劳动资料需加快交通物流网络、水利电力设施以及信息网络基站建设的创新与应用。第一,协同发展城乡交通路网建设。城乡交通网络的协同优化是实现区域资源高效流通的关键。现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城乡间联系的基础性桥梁,对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通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着力提高新型生产力水平,加快建设现代社会的新型路网,尤其是扩展和加密新型农村交通网络。这不仅涉及公路、铁路的建设和升级,还包括仓储物流设施的优化,旨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城乡间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为城乡资源融合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协同发展城乡新型水利电力设施。加强农村水利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灌溉需求和农村生活用电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第三,协同发展城乡通信设施建设。通信设施的均衡建设是推动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要推动农村宽带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全面覆盖,为农村地区接入现代信息网络提供扎实的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广泛应用。这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发展,还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一体化进程。

培育无形劳动资料需加快数字化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数据管理机制的完善。第一,协同发展城乡数字技术,推动农村地区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拓宽农村居民的服务获取渠道,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通过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城乡社会差距,拓宽数字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激发农村家庭的消费活力(侯冠宇等,2023)。第二,加快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品质量。鼓励农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参与科技创新活动,通过技术改造升级传统农业。同时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加强科研机构与农村地区的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和普及。第三,完善数据管理机制。一方面,完善城乡数据安全监管制度,维

护区域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是维护区域数据安全的前提。为了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以确保数据安全的有效监控和保护。政府部门要利用新型技术手段,加强对数据的监督管理,确保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构建起一个全面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作为保障数据安全的“屏障”。另一方面,推动城乡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城乡间的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和共享策略,可以有效增强城乡间数据的互联互通性,从而提升数据的利用效率和价值。如长三角地区的跨区域科学数据中心已形成一套数据标准化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内的数据共享与应用,有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2]孙祥栋,王红雨,刘锐剑.中国式城乡融合政策演化、理论框架及其突破进路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1).
- [3]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
- [4]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5]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
- [6]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 [7]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
- [8]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
- [9]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10]李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教育贡献:来自首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10).
- [11]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23(11).
- [12]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 [13]侯冠宇,张震宇,董劭伟.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4(1).
- [14]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
- [15]张震宇.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2).
- [16]王珏.新质生产力: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17]钱力,程雅娴.劳动力流动赋能城乡融合: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安徽省6县100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OL].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05.T.20231117.1656.004>.
- [18]侯冠宇,胡宁宁.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3(1).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Internal Logic,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Li Yun Kong Weizheng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 force of change centered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upgrading the value of labor objects by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laborers and the means of labor, so as to achieve an overall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empowe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innovate the wa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actice. A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workers, objects and means of labor, so it can be enhanced by acting on the above three productivity components. Accordingly, we should improve labor inputs to empower workers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new-quality industri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o empower the comprehensive iteration of labor objects; and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mpower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labor materials, so as to cultivat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aborer; Objects of Labor; Means of Labor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经验、 制约因素、突破路径*

杨梦洁

摘要: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时代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硬道理。当前安徽、湖北作为典型代表,中部地区在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做强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向前推进。但受到内生性、外部性、结构性、周期性多重因素制约,综合来看中部地区整体产业竞争力不及东部地区,增长爆发力不及西部地区,正处在产业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调整成效有待时日显现的艰难过渡期。应深刻研判自身问题与外部形势,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补齐市场化营商环境不足、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构筑内陆开放新优势等方面着重发力。

关键词: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02-08 收稿日期:2024-04-2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赋能河南制造强省建设问题研究”(242400411092);202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河南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究(24E030)”。

作者简介:杨梦洁,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1464)。

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并围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划定了产业蓝图。

回顾中部地区崛起发展历程,2002年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GDP增长率分别为10.92%、8.53%、9.04%,中部地区增速“垫底”现象引发广泛关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概念,并在2006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家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10年左右,一些学

者结合GDP等重要经济指标,对该政策实施效果予以肯定(范恒山,2013;杨兰桥等,2014;郭小燕等,2014)。2016年之后不少学者结合经济新常态等变化,对中部地区崛起新形势与新挑战做出研判(范恒山,2017;彭志敏等,2017;周毅仁,2018;徐阳,2019),其中部分学者就战略实施成效进行实证检验,虽有少量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未能显著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王升泉,2017;陈凡等,2022),但更多学者验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能够通过拉动产业投资增长、发展工业企业、促进技术创新等方式有力带动经济增长(陆军等,2018;黄敦平等,2022)。2024年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召开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迅速关注并发声,指出中部地区崛起迎来政策新机遇。

我们应清醒地看出，中部地区距离真正全面崛起仍有不小差距，特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崛起之路上的不确定性增加，形势更为多变复杂。系统梳理中部地区在产业上取得的新进展，研究新时代中部地区面对新形势，如何建设产业结构更加高级、产业分工更加有序、产业动能更加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地融入和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经验

中部地区近年来紧抓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谋划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把握各项国家级战略叠加优势，积极融入全国区域经济三大支撑带和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城市群，以更强发展实力站在了中部地区崛起更高起点，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后发赶超”，成为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先行者。

(一) 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典型案例

1. 安徽“先进制造”带动经济全面腾飞

2023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50875亿元，同比增速8.9%，总量跃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与全国第七位，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迅猛，带动安徽GDP以5.8%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是“世界显示之都”实力突出。安徽从2008年京东方6代线落户投产之后，不断深耕谋划，竞逐产业前沿，集聚京东方、维信诺等一批产业链主企业，搭建完整产业链，新型显示产业成长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根据2023年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大会数据，安徽各类显示面板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7.8%，出货量约占全国的1/7，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实力位居十大城市之首。二是“新三样”产品迅速出道。2022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居于中西部第四位，2023年，以8.9%的高增速反超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突破5万亿元跃居中西部第一位，其背后是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强势带动。安徽目前集聚了奇瑞集团、比亚迪合肥、

江汽集团、蔚来等7家整车企业，以及中创新航、国轩高科等1100余家关键零部件企业，各地市配套协作构建全省完整强大的全产业链体系。2023年，全省汽车产量249.1万辆，居全国第二位，其中新能源汽车86.8万辆，同比增长60.5%，汽车出口714.6亿元，同比增长120%。在汽车出口的强力加持下，安徽2023年外贸经济总量达到8052.2亿元，距外贸大省河南仅相差55亿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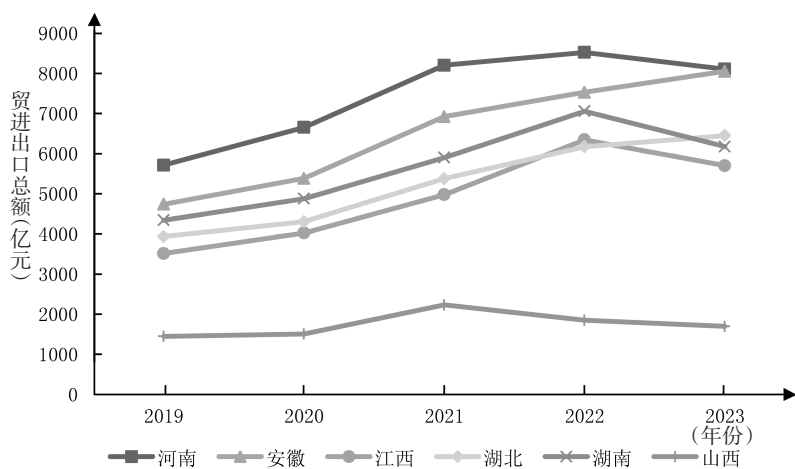


图1 2019—2023年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2019—2023年中部地区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湖北“软硬协同”锻造中部产业名片

2023年，湖北GDP增速6%，在经济大省与中部地区中位居第一，其中数字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数字新引擎动力强劲，占GDP的4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是中部地区唯一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一是“中国软件名城”建设稳步推进。湖北是中部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高地，2023年，业务收入3049.93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9%，规模位居全国第十位，占中部六省之和的43.8%，以绝对优势撑起中部地区软件业“半壁江山”。二是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聚焦信息光电子、能量光电子、生命光电子三大领域，以“中国光谷”为基地，引领“光芯屏端网”产业规模在2023年达到8470亿元，成为湖北叫响全国的数字产业集群品牌。根据湖北经信厅数据，湖北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光纤光缆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2与全球的1/4，位居世界第一位。2023年，激光切割设备出口总额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位居全国第四位，成功造出中国首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的

高端晶圆激光切割设备。国家存储基地、国家集成电路基地建设也取得了耀眼成就,长江存储是国内大陆地区第一家专注于存储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2022年推出国内首款八层3D NAND闪存芯片,达到世界先进232层级研发水平,为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打破国外进口依赖做出卓越贡献。

(二)中部先发地区经验举措分析

1.打破传统思维惯性,大胆改革创新施策

实现“后发赶超”需要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落地新政策打开新局面。安徽针对高技术产业高风险特点,积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培育,对国资平台进行以管资本为主,按照市场化逻辑运营的产业赋能型改革,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招引重大产业项目,享有“最佳政府投行”之誉。2022年,合肥设立总规模200亿元市政府引导母基金,以17条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为中心,持续创新升级“合肥模式”,提出“创投城市计划”,加速引培基金管理机构,全力打造科创资本中心。湖北为解决创新链卡点堵点问题,早在2012年就出台“黄金十条”,以东湖高新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依托,在全国率先大胆创新,提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70%归研发团队的重大举措,迄今仍然具有政策先进性,打破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的限制,带动一大批高端技术人才参与企业创新,激发人才和企业创新活力,截至2023年8月,东湖高新区高企总数突破5700家,位

居全国高新区第四位。湖北全省国家级科技企业数量已突破五万家,位居全国第五位,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超过三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即将突破两万家。

2.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培高能级创新平台

安徽合肥是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湖北武汉是继北京、上海、粤港澳国际科创中心和成渝区域科创中心之后,又一个明确支持建设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两地分别拥有中部地区最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方面,大科学装置也是各个区域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2023年底,安徽合肥拥有12个大科学装置,其中3个已投入使用,湖北也有六个大科学装置正式进入国家序列,在中部地区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两地均将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强化产业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底,安徽拥有国家同步辐射、微尺度物质科学、磁约束核聚变三个国家实验室,建成223家“国字号”创新平台,34家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九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的强大梯队。湖北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是全国唯一的光电子国家级实验室,并布局建有光纤光缆制备技术、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等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华为光通讯半导体芯片研发中心等重量级研发机构,对光电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创新支撑作用。

3.聚焦优势特色产业,贯彻链式集群思路

湖北“光芯屏端网”与安徽“芯屏器合,集终生智”产业集群均是两地经由数十年时间深耕发力,围绕优势点,集聚规模链打造的产业名片。以安徽为例,在认识到自身产业链关键环节“缺芯少屏”的断点之后,2006年就举全市之力风险投资京东方,一举奠定显示面板及相关半导体产业发展基础。在集成电路产业上,2013年合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统计过全市家用电器、面板显示等产业每年对芯片有超300亿元的巨大需求,及早谋划成立微电子学院培养相关人才,并组建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从事半导体产业招商引资及企业服务。这种围绕已有产业基础,在链条上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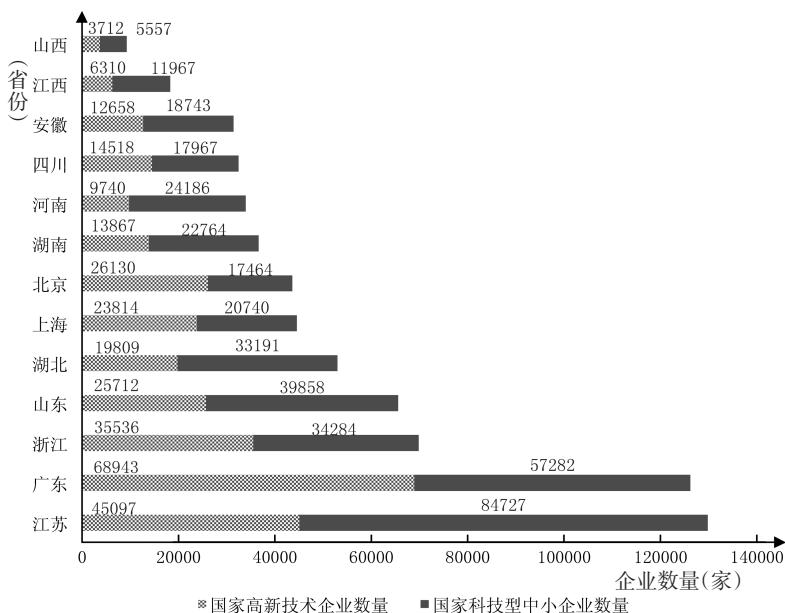


图2 2023年8月国家级科技企业TOP10地区及中部地区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网站以及各省科技厅网站数据。

深挖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环节,以政府投融资招引关键高技术性企业,随即带动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陆续落户的产业链思维始终贯穿产业集群培育全过程。2020年合肥先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启动“链长制”,围绕重点产业链率先打造了一批具有产业链思维与全产业链知识图谱的招商干部队伍。

4.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湖北将创新联合体作为融合各类要素资源,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率先围绕优势主导产业组建光纤激光器、车规级芯片等创新联合体,融通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配套建立一名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面向一个主攻方向,打造一个高水平研发团队,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创新,推动一个产业集群的“五个一”模式,打通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完整链条。同时高质量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截至2023年,湖北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超过50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84家,持续位居全国第五位,并积极同深圳合作,学习先进经验在孵化器中应用“楼上楼下,创新创业”模式,建立“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双创服务体系。安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率先启动场景创新工作,打造全国场景创新应用高地。在场景提供与技术供给中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作创新生态,参与场景中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享有便利,能够和清华合肥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深入合作,孵化出无限可能的“小场景”,让技术成果在真实场景应用中加速迭代。

二、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制约因素

进入新时代,中部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向前推进。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处于白热化阶段的区域产业竞争格局以及自身存在的薄弱短板,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全面崛起仍面临不少挑战。

(一)中部地区内生性矛盾突出

1.产业带动能力偏弱

从经济增速来看,“东西快,中部慢”现象仍然

突出。2023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GDP增速分别为5.4%、4.9%、5.5%、4.8%,中部地区仅高出东北地区0.1%,中部地区发展呈现疲态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竞争力与结构性问题。东部作为先发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质量领先全国,长三角、珠三角各个集群的产业生态系统较为完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具有较强实力,产业结构更加稳定完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韧性均处于更高层级。中部地区整体制造业结构相对单一,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较重,缺乏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多元化支撑,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不及处于发展初期增长势头迅猛、政策倾斜力度更大的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明显,整体处在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调整成效有待时日显现的艰难过渡期。

2.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剧

过去数十年发展历程中,中部地区没有产生具有主导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能力的“极核”中心城市,如珠三角的广州、深圳,长三角的上海等,中部地区崛起相关支持政策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相比也不存在特殊优势,缺乏核心区引领、内在产业关联性与强政策凝聚力的中部地区受到周边增长极吸引,在发展转型期“多级分化”现象更加凸显。安徽向东全面融入长三角地区,2023年8月印发《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山西产业类型较为特殊,区位上向京津冀地区靠拢。湖南、江西紧邻广东,湖南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与珠三角地区保持良好互动,江西稀土、锂电池等则具有链条上下游互补关系,湖南与江西成为珠三角产业转移、区域分工合作的首选地区。根据广东省商务厅数据,2023年,广东与湖南、江西签订了256个合作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材料等领域,投资总额2375.16亿元。湖北积极融入经济增长更快的长江经济带,河南则是最典型的中部地区,发展受限较大。2024年一季度,依靠“新三样”产品强势带动,安徽外贸进出口以9.8%的增速跃居中部第一位,而机电类产业占比较重的河南、湖南、江西增速分别下降29.3%、38.3%、47.5%。

(二)国内东西部地区双向挤压

一是东部地区“反向招商”引流中部地区优质产业资源。近两年上海等东部地区频频到武汉、成

都等地“反向招商”,将目光瞄准中西部地区具有高成长性的初创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专精特新”企业,以自身较为完备的创新生态吸引这类企业转移到东部,中部地区创新型企业出现一定“外流”现象。二是西部地区抱团发展成效显著形成较强压迫力。西部地区近年来紧抓各项国家战略叠加机遇,成渝地区2021年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建设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2023年成渝双城经济圈GDP达到81986.7亿元,占西部地区的30.4%,其中四川GDP突破6万亿元,反超河南,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GDP第一强省。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地区高技术企业数量仅为东部地区的1/3,虽然企业数量超西部地区将近一倍,但是利润总额却不及西部地区,在数量、质量多个维度上表现出“双落后”之势。

表1 2023年全国四大区域高技术产业经营情况对比

高技术产业	企业数量(个)	用工数量(个)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全国	50074	14872175	223403.9	15589.18
东部地区	33277	10000269	148952.8	10819.37
中部地区	10191	2701570	37385.58	1927.218
西部地区	5437	1863630	33072.5	2295.516
东北地区	1169	306706	3993.056	547.0708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3)》。

(三)国外产业链调整形势复杂

一是产业链布局思路发生转变,底层逻辑政治特征明显。产业链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人类技术进步产生的创新大爆炸,打破传统分工平衡局面,本次全球产业链重塑调整也要归因于深度席卷全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产业链布局从单纯追求效率向安全第一、效率第二转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明显的“去中国化”迹象,一些违背正常经济规律与跨国公司利益的制裁、断供、遏制行为频现。二是全球产业链趋于放缓,呈现内向化、区域化、本土化等新动向。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在经历数十年飞速发展之后,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中间品贸易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后继乏力,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深度审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技术创新、就业等方面的深层意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各种制造业回流政策。中国

外贸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与供应链转移挑战,2023年我国四大板块外贸出口普遍出现下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出口美元值分别同比增长-4.1%、-9.8%、-4.8%、0.9%,中部地区在新型开放格局中,区位优势不及其他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不及东部地区,受到更大影响。

三、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崛起的突破路径

根据对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的新经验,以及对形势、问题的剖析,各个省份均需“向内求”与“向外修”并重,在瞄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锻造自身产业发展硬实力的同时,高水平融入国内外产业分工新体系中,全面加强各层级区域内外联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带来更为强大的增长新动力与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

(一)以未来、新兴产业为主阵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战场,综合来看中部地区较之发展起步较早、科创资源更为集中的东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产业发展的不确定与高成长性,针对技术研发门槛高、资金投入风险大、成果转化周期长、产品推广耗时久的特点,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打破常规思路,量身定制专项政策,谋求精准突破。

一是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强化原始创新驱动。抓住国家进行区域战略科技创新资源布局的时代新机遇,高标准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对中部地缘相近、产业相关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其他中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高等院校、新型研发机构等,积极谋划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创新资源,在新型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支持“链主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持续性突破一批领先国内外的关键核心技术,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落地,带动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培育国家实验室后备力量。二是建设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完善创新生态圈。各个省份选定产业链优势行业率先实现中试能力、创新联合体、

科创服务平台、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平台全覆盖。学习“合肥模式”先进经验，因地制宜设立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化推进“优势产业+母基金+政策支持”模式，建立“实验室+龙头企业+高等院校+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基金+产业园区”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大力推动“从1到10”的迭代性转化。

（二）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重点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

中部地区食品、装备等传统产业占比较重，且多为各个省份的传统优势产业或支柱型产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本盘。202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中部地区应学习广东等地对传统产业全链条整合与集群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践行“智改数转”与商业模式创新，应用新技术、使用新要素，产生新业态、发展新经济，推动产业新旧动能变革。

一是装备制造等重型制造产业，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为提升方向。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优势环节，发展“装备+平台+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种新模式，促进企业向一体化系统集成商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二是新材料、化工等链条长、跨域广的产业，以高端化、绿色化、前沿化为提升方向。依托多氟多、兴发化工、赣锋锂业、平煤神马集团、纳新新材料等企业，组建“龙头企业+创新平台”的创新网络，研发突破一批竞争力强的高性能、高精尖新型材料、先进合金产品。紧跟国内外产业发展前沿，主动对接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在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等领域发展，实现创新动能整体跃升。三是食品、服装等消费性产业，以新理念、新模式、功能化、场景化等为提升方向。把握新消费升级趋势，融合新国潮、新康养各类新元素，围绕时尚化、个性化、保健化等新消费主体需求，借助数字化、工业设计等工具，从市场消费端出发，进行品牌再定义、产品再设计，反向整合供应链，创新商业运营模式与市场运营模式，传动影响生产端，带动全链条创新升级。

（三）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方向充分激发产业主体活力

截至2023年底，中部地区新增经营主体583.77

万户，增速15.5%，高出全国2.9%，实有经营主体数量达到4356.56万户，其中河南经营主体数量1094万户，位居全国第四位，这是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产业主体优势，需要对标东部先发地区找准市场化思维的不足，持续深化市场化营商环境改革，激发千万户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全面释放经济增长动力。

一是充分调动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性。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要求，在要素配置、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营商环境自审自查，确保严格执行“一视同仁”准则，特别对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灵活创新高效配置，开展优质产业空间供给试点等，满足实体经济民营企业的产业发展需求。二是创新性做好增值服务，提高体验感。从市场主体角度对政府政务服务进行改革，在做好“减法”提高政务便利性的同时，学习苏州、广州、深圳等地先进经验，积极提供衍生性增值服务。例如注重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服务，构建为企服务新生态；设置“一机构、一平台、一个码、一类事”，整合财政、工信、科技等多部门职能，向企业提供集成服务。三是普惠性保障大中小微企业发展需求。在对重点企业一以贯之开展一对一重点服务的同时，关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富含潜力、规模巨大的中小微企业群体及海量个体创业者需求，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手段，扩大电子执照应用范围，增强市场准入、登记便利性；加快信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数字化精准监管新模式，数字赋能为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创造安全便利的融资条件。

（四）以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为抓手提升产业融合发展优势

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及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内涵需要产业融合，国家对中部地区定位要求以及中部地区农业农村责任重，传统制造业占比高、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的现状也需要产业融合。新时代中部地区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顺应新消费升级趋势，推动城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集合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产业新业态。

一是综合运用新技术与新装备，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在农业生产与加工

中全面推广数字技术及产品应用,依靠温度、湿度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从源头提升各类农产品质量。发挥中部地区先进农机装备产业集群优势,依托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重要平台,持续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及应用水平,发展智慧农机,率先建设“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二是创新运营模式与商业模式,带动三大产业共同提升。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结合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农村资源,积极对接引入先发地区优质运营团队,打造若干全国知名的县域电商直播基地。支持发展平台经济,借助平台强大的组织架构与资源整合能力,破解各链条之间、各环节之间及各主体之间对接难题。学习推广“澄明模式”先进经验,反向重构从第三产业市场选品销售,到第二产业供应链加工制造,再到第一产业高效农区的“一二三产融合”全流程,实现农民、企业、投资方、政府、产业园区群体性受益。

(五)以拓展产业发展新通道为目标构筑内陆开放新优势

2023年,中部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六个省份“一带一路”外贸进出口在各自进出口总额中占比均超过40%,其中湖南、安徽超过50%,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产业链密集调整以及复杂多变的外贸形势,中部地区需要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住既得良好开放格局,从激烈动荡的产业链重构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开拓更加稳定广阔的海外市场。

一是多渠道建立多元化贸易合作关系。高质量参与中欧班列,稳定深化“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积极拓展与我国具有产业互补关系的印度、越南、泰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围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跨境电商产业带,稳定外贸局势,培育新增长点。二是支持优势集群优质企业抱团出海。立足各省省情,结合特定产业链全球发展形势分析,瞄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链环节、不同应用场景的海外市场,推动重点产业链优势力量走出去。鼓励企业海外品牌推广,参评国际奖项等,在品牌创新、市场拓展、渠道开拓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政策扶持力度。探索跨区域、多部门联合共建“走出去”平台,为企业提供“走出去”的

法律、担保、投资等问题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三是深度建设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比照东部开放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各个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探索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机制、“无证明自贸试验区”、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套餐式”服务平台等制度创新,提高贸易通商便利度。进一步推动外商投资自由化改革,在金融、航空、医疗等领域扩大外商投资范围,加大外商投资利用力度。

(六)以加强衔接重大战略为指引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中部地区向东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紧邻,向西链接西部广阔能源市场与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充分结合这一特殊区位,将向外分化力转变为内在聚合力,从东、西、南、北、海、陆、空各个方向同重大战略衔接,结合中部地区产业类型与结构特点,建设产业过渡与支撑的中间地带,探索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合作新机制,形成更加协同、互为提升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一是深化开放合作链接先进资源要素。东部地区在新兴、未来产业领域是区域创新龙头,要差异化发挥中部地区产业配套体系完备以及市场空间广阔的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建设成为成果转化高地,发展各类中试基地等成果转化平台,在与东部地区深度合作中,建立跨区域科技成果孵化转化链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东部地区设立域外研发中心,建设“科创飞地”,对接当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高端创新要素,借智借力突破中部地区科创资源限制。二是创新对接模式打造新型产业合作关系。探索“两地双园”合作建设,中部地区各个省份可以同产业关系密切,上下游连接紧密的沿海、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窗口地区展开广泛深度的产业合作。依托自贸区、省内开发区、优势产业集群与产业龙头企业,同重庆、广西、云南等地联手,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同海南、广东等开放水平高的地区联手实现“借道出海”,将中部产业资源优势与这些地区对外开放优势相结合,建设国内跳板,撬动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A. KARLSEN, H. B. LUND, M. STEEN. The roles of intermediaries in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s:

- Enhancing cluster absorptive capacity[J]. *Competition & Change*, 2023,27(1).
- [2] KHAREL S., SINGH P.. Effects of transport corridor advancement on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Dallas Fort Worth (US) case study[J]. *GeoScape*, 2022, 16(2).
- [3] 陈凡,周民良.中部崛起战略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22(2).
- [4] 刘怀德.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
- [5] 吴志军,舒晓杰.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及其提升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2(5).
- [6]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站到更高起点挺起中部“脊梁”[N].*人民日报*,2024-03-23(001).
- [7] 谭永生.数字赋能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4(1).
- [8] 李燕.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J].*经济纵横*,2023(11).
- [9] 王建胜.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知识流动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机制与效应[J].*经济地理*,2024(2).

New Progress and Dir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New Era

Yang Mengjie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upported b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s the hard truth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at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in the new era. Currently, Anhui and Hubei, a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driv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 brands, and stimulating new momentu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being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However,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endogeneity, externality, structure, and periodicity, the overal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explosive growth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currently in a “difficult transition period” where the new and old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es are deeply transform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djustments needs to be demonstrated over time. We should deeply analyze our own problems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and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lling the gap in market-orien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building new advantages of inl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The New Era; Central Reg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责任编辑:彦 伦)

【城市经济研究】

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幂律分布规律与层级结构特征*

盛广耀

摘要:城市群的网络联系存在幂率分布规律,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城市网络是“有等级倾向的网络”,其网络结构必然表现为明显的层级特征。首先,基于城市引力模型测度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实证检验城市群城市间联系强度的概率分布规律,证明城市网络联系符合幂律分布的特征,且具有标度不变性。城市群的联系网络为服从幂率分布的无标度网络。然后,基于头尾断裂法对城市群城市网络的层级结构进行了划分和比较分析。尽管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的规模、强度和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强关联关系的空间形态也有明显的方向性不同,但其网络结构都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特征。

关键词:城市群;城市网络;幂律分布;头尾断裂法;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10-09 **收稿日期:**2024-05-13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城市群网络协同效应与治理模式研究”(GDZK-2021-010);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城市水文模型模拟及深度学习算法读取视频积水信息的城市暴雨积涝临界雨量分析研究”(8222018)。

作者简介:盛广耀,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10)。

一、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形态,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作为“城市的第二本质”(Taylor, 2004),是城市群发展演化的驱动因素。随着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的增强,城市空间组织逐渐由传统中心地模式向多中心、网络化模式转变,城市网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丁如曦等, 2020)。而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本质也是城市间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和扩大的过程(魏丽华, 2018)。形成联系紧密且结构合理的城市网络,是城市群发展的目标所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

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从城市网络的角度,探讨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一般规律与共性特征,有助于了解城市群的发展演化过程,可为城市群的网络化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城市群的城市网络结构近年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分别从城市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企业连锁网络模型、人口流动、交通流量、社交网络等不同角度,对城市间联系强度进行测度,并对这些关系指标构成的城市网络联系展开相应分析。同时,部分文献还对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的等级结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苗洪亮等, 2017;刘湘平等, 2021)。综合来看,对城市群网络结构的研究还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已有研究对城市群不同类型关系网络的个性特征的分析较多,对城市群网络联系共性特征的探讨还较少。

城市网络是一个具有自组织性质的复杂网络系统,其网络连接应当具有某些共性的演进特征。更具体的议题如:城市网络是随机网络还是无标度网络?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分布是符合对数正态分布还是幂率分布?如果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则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网络是随机网络;如果符合幂率分布特征,则为无标度网络。二是多数研究忽略了城市网络层级的概念,对城市网络联系的层级结构特征探讨不多。城市网络模式是相对于中心地模式而提出的,它突破了中心地理论中城市规模的等级关系,强调城市之间水平、横向的功能联系(Camagni, 1993; Meijers, 2007),并有学者认为,城市网络将取代中心地的等级体系成为城市间联系的主要形式(丁如曦等, 2020)。这似乎给人以“城市等级体系与城市网络结构相对立”的混淆观点。或者说,在城市网络范式下,城市之间的组织联系是水平的,城市等级体系被大大削弱而不再重要。而实际上,城市网络联系也存在鲜明的层级结构特征。所不同的是,城市等级制度从以规模为基础,转变为以城市间网络为基础,而且可能被加强(Neal, 2010)。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城市群网络结构的一些共性特征,运用概率分布拟合、头尾断裂法对城市网络联系的数据分布和层级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强度分布的一般规律;二是比较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的层级结构特征。基本的假设是:城市网络如同其他具有自组织性质的复杂网络一样,其网络联系存在幂率分布规律;而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城市网络是“有等级倾向的网络”,其网络结构必然表现为明显的层级特征。

二、研究设计

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幂律分布与层级结构特征具有普遍性,不同城市群在此方面具有相似的网络结构特性。为便于结果展示,本文以中国发育程度相对较好的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实证分析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一般规律与层级结构特征。

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群的规划范围是不断扩展的。鉴于

城市网络是一个开放系统,本研究的初始范围为较大的省级空间,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珠三角区域为广东省^①,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两市一省。基本分析单元为地级及以上节点城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分别包含25个、21个、13个地级及以上节点城市,其城市网络分别由300个、210个和78个城市联系数据所构成。

由于三大城市群涉及的空间范围、城市数量相差较大,在分析城市联系强度分布规律时,采用多种空间范围的设定,如省市范围和距核心城市400千米、300千米、200千米空间范围等,进行幂律分布特征检验。在分析城市群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时,则采用头尾断裂法对城市网络联系的层级进行划分,并对城市群一级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数据为市辖区非农产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数据为市区常住人口,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交通距离数据为城市间最短公路里程,来源于高德地图。

2. 分析方法

第一,城市引力模型。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城市之间通过商品、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是衡量城市群空间联系的关键指标,也是测度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的依据。城市相互作用强度,一是根据调查统计的要素流进行测算,以城市之间某一类要素的流动量指代城市联系强弱;二是利用城市引力模型,对城市之间的综合联系强度进行测度。前者为城市之间已经发生的某一要素流的实际联系,但它只是城市联系的一个子系统;后者为综合性城市相互作用指标,表示理论上的城市联系或称为城市联系潜力(王欣等, 2006;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 2019),但其与城市联系的实际强度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研究的是城市之间综合性的经济社会网络,而不是这些城市的某一类要素流、企业或组织之间的网络。同时,考虑到城市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性,要素流的可获得性、数据质量以及指代城市联系指标的代表性等原因,基于研究需要,采用

修正城市引力模型来测算城市联系强度。城市引力模型是衡量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的一个较好的综合性指标。运用引力模型计算的潜在城市联系强度,与实际城市联系强度虽有一定差异,但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城市引力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城市质量(规模)越大,城市间距离(可达性)越近,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就越大。不同研究所选择的城市质量和距离指标略有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R_{ij} = k \frac{M_i \times M_j}{d_{ij}^2} = k \frac{\sqrt{G_i \times P_i} \times \sqrt{G_j \times P_j}}{d_{ij}^2} \quad (1)$$

式(1)中, R_{ij} 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联系强度, M 为城市质量, G 为城市市辖区二三产业增加值, P 为市区常住人口, d_{ij} 为城市间最短公路里程; k 为常数,一般设为1。此公式计算的城市间联系强度为无向引力值。依据城市联系强度建立的城市网络为无向含权网络。

第二,幂律分布检验。在探讨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分布规律时,对城市间联系强度是否符合幂律分布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幂律分布的数学形式一般可以表示为: $y=cx^{-\alpha}$;其图形呈现出陡峭且延伸很长的长尾分布特征。如果两边取对数,则为: $\ln y = \ln c - \alpha \ln x$;在双对数坐标下,其图形是斜率为负的直线。如果城市间联系强度分布符合幂律分布特征,则可以用式(2)对联系强度值与排序的幂律分布参数进行估计。

$$\ln(R) = A - b \ln(N) \quad (2)$$

式(2)中, R 为城市间联系强度值, N 为城市间联系强度的位序数, A 为常数, b 为幂指数。幂指数越大,说明城市之间强关联关系越集中于某几个城市,城市联系强度头部数据少、数值差异大,依此排序的城市间联系强度值下降得更快。

第三,头尾断裂法。在分析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层级结构特征时,借鉴Jiang(2013,2015)针对长尾分布数据提出的头尾断裂(Head/tail Breaks)分类方法,对城市群的城市联系网络进行层次结构划分。头尾断裂法是基于数据的长尾分布特征,即数据序列中数值大的“头部”数据占整个数据的较少部分,数值小的“尾部”数据占绝大部分,进行层级分类的方法。它首先将所有数据值按平均值分成两部分,以此为断裂点划分为两个层级;然后对高于平均值的上半部分数据,继续按此范围的

平均值进行更高层级的划分;如有必要,持续进行递归划分过程,直到剩余部分数据不再是长尾分布,或者说,下半部分的数据不再远多于上半部分。

三、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幂律分布规律

本部分首先对区域整体的城市联系状态进行分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为例,采用城市引力模型分别计算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

1.城市群区域网络联系的特征分析

第一,城市间联系强度的数据具有明显的长尾分布特征。将城市联系强度按位序进行排列,各区域城市联系强度的分布呈现上尾稀疏、下尾密集且越往下越密集的状态。这种分布表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联系强度差距很大,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不高,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联系紧密,有着相当高的联系强度。例如,珠三角地级以上节点城市联系强度最高的广州—佛山高达27280.6,长三角城市联系强度最高的上海—苏州为2394.6,京津冀城市联系强度最高的北京—天津为2229.3;而三个区域城市联系强度很小的“尾部”数据很多只在0.1左右。

第二,在空间尺度上,城市群网络联系强度的分布具有标度不变性。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见图1),无论是在江浙沪一市两省空间范围内,还是在距核心城市(上海)400千米、300千米、200千米以内的范围,城市联系强度分布均呈现出相似的长尾特征。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城市网络联系具有自相似性。

第三,城市联系网络并非随机网络,而是存在枢纽性质的节点城市。也即少数中心城市与网络中的其他城市具有很高的联系强度,节点中心度很高;此外的多数城市与区内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节点度数很小。城市个体与区域联系的紧密度(即城市中心度)的数据序列也有长尾分布的特性(见图2)。由于长三角、京津冀与珠三角位序前列的联系强度数据差距很大,在同一坐标下长尾分布特征不够清楚,图2单独展示后,可清晰呈现同样的长尾特征。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中,城市中心度前5位数据合计占全部城市联系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2.2%、90.8%和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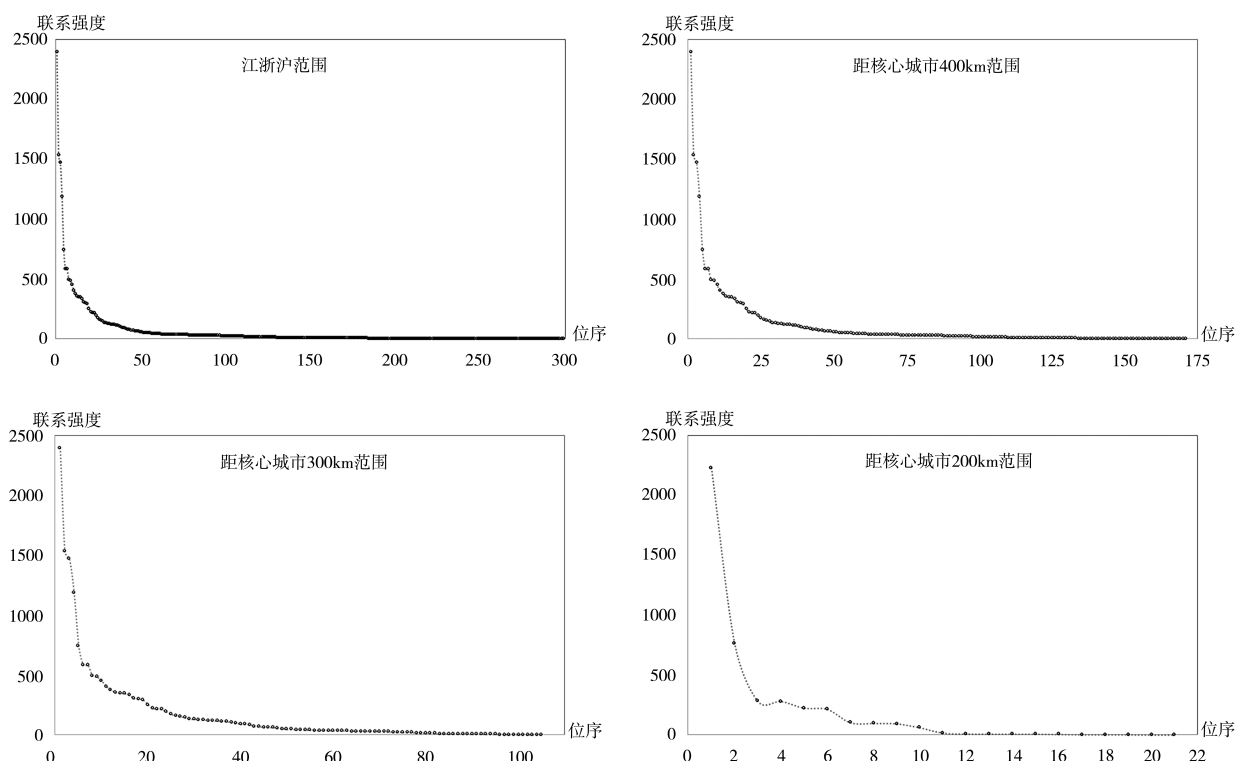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网络联系分布的标度不变性(以长三角为例)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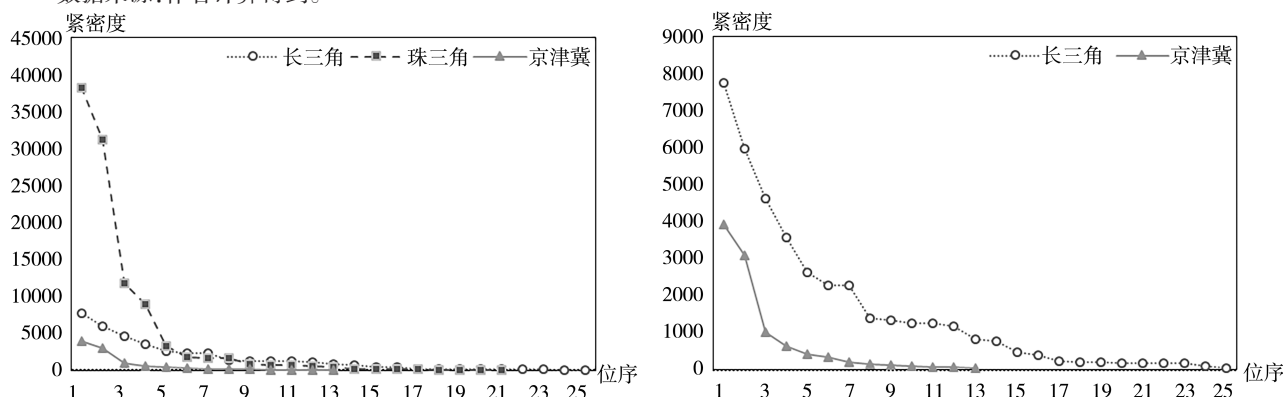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与网络联系紧密度的位序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第四,除了具有相似网络联系分布的共性特征,不同城市群也存在着较大的个体特征差异。各区域城市网络联系的规模、紧密程度和城市联系强度差异较大。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城市网络联系差异悬殊,地级以上节点城市联系强度总量分别为19718、51409和5074,平均强度分别为65.7、244.8和65.1。珠三角城市群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最高,不论是联系强度总量还是平均联系强度,均大幅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2.城市联系强度的幂律分布检验

具有长尾分布特征的数据通常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幂率分布。对各区域城市联系强度数据进

行对数正态性检验,可以发现不同空间尺度的数据均不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然后采用幂律分布函数,在双对数坐标系下,对城市联系强度分布进行模型拟合,估计结果见表1。用双对数幂律函数拟合城市间联系强度分布,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多在90%左右,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且指数的绝对值均大于1。可以认为,城市群的城市联系网络服从幂律分布规律。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城市联系强度的分布均符合幂律分布特征,具有标度不变性,即与划定的区域范围无关,这表明城市网络属于无标度网络。

但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间联系强度幂

表1 城市联系强度的幂律分布检验

样本选择	研究区域	城市数	样本量	幂指数	常数项	拟合优度R ²
省市范围	江浙沪	25	300	1.9126	11.236	0.8779
	广东	21	210	2.4087	12.423	0.9282
	京津冀	13	78	2.2987	9.454	0.9199
核心城市400千米区域	长三角	19	171	1.7959	10.593	0.8510
	珠三角	18	153	2.5483	12.483	0.9239
	京津冀	11	55	2.3972	9.367	0.9173
核心城市300千米区域	长三角	15	105	1.6869	10.069	0.8046
	珠三角	15	105	2.6281	12.502	0.8904
	京津冀	11	55	2.3972	9.367	0.9173
核心城市200千米区域	长三角	9	36	1.5497	9.083	0.8778
	珠三角	11	55	2.2360	11.337	0.8779
	京津冀	7	21	2.3311	9.914	0.8589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指数和拟合优度存在差异,这与样本数量有关。如果区域范围过大,样本数量过多,大量网络边缘与区域联系松散的城市纳入其中,双对数曲线随样本序列增多,下尾部会有明显的折弯下垂,使得整个

回归直线上翘(见图3)。这也影响了城市联系强度对数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精度。

对于城市群而言,将过多与其他城市联系松散的区域边缘城市纳入,并无太大意义。有研究在进行

幂律分布的实证检验时,将大量底层低值数据称为“跛鸭层”(lame-duck class),在建模中作为异常值处理(蒋明华,2021)。

为更好比较三大城市群区域,以京津冀样本数量为限,选择相同的样本数量,即城市群联系强度前78位的数据,采用长三角、珠三角的截尾数据再次进行模型估计(见图4)。

可以看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城市联系强度幂律函数的拟合度明显提高,没有回归直线上部上翘、样本曲线下尾部折弯下垂的现象;而京津冀区域城市联系强度分布的下尾部折弯下垂,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较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发育水平更低,在相同样本数量的情况下,仍有部分与城市群联系松散的城市纳入其中。在相同样本数量的情况下,京津冀城市群的幂指数高于珠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又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即回归直线的斜率依次下降。这表明京津冀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更集中于少数城市之间,城市群的等级结构较为极化,区域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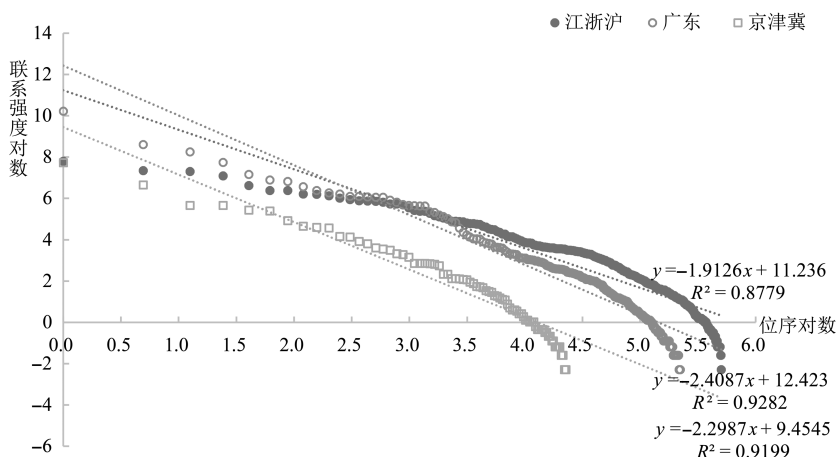


图3 三大区域城市联系强度—位序双对数坐标图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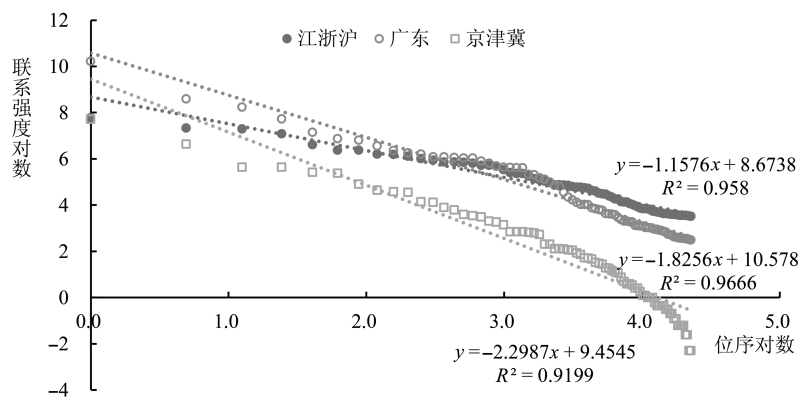


图4 三大区域前78位城市联系强度—位序双对数坐标图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3. 节点中心度的幂律分布检验

巴拉巴西和阿尔伯特(Barabási、Albert, 1999)将幂律分布引入网络分析,提出了无标度网络模型(即BA模型)。他们认为,具有复杂拓扑结构的网络有一个共同特性:节点连接性遵循无标度幂律分布。这一特征被认为是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即网络通过增加新的节点不断生长,而新的节点优先连接于已经有较多连接的节点。BA模型解释的是网络中节点度数分布呈现的幂律特性,表现为各节点之间连接关系(数量)上的特征。城市群内的城市网络是一个完备网络,城市之间均存在着或强或弱的联系,但仍可对各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联系强度总量(即含权网络的个体中心度)是否存在幂率分布特征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幂律函数拟合,城市网络联系的节点中心度在双对数坐标下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5),符合幂率分布特征。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在95%左右,长三角城市群的拟合优度相对低一点,为85%;三者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指数的绝对值都大于1。这说明,对于城市群的发展,在城市网络联系的扩展过程中,不同城市的网络地位存在相当大的落差。这也表明,在城市网络中存在以节点中心度衡量的城市等级体系。

四、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层级结构特征

本部分利用头尾断裂法,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城市联系网络进行层次结构划分,并比较得出三者城市网络结构的不同特征。

1. 头尾断裂法划分的城市网络层级

利用头尾断裂法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网络进行层级结构划分。首先,计算区域整体网络城市联系强度的平均值,大于均值的城市联系网络构成城市群的一级网络;其次,计算一级网络所有联系强度的平均值,大于此均值的城市联系网络构成城市群的核心层;最后,如有必要,可继续进行划分。区域整体网络是所有城市间均存在或大或小联系的完备网络,而头尾断裂法划分的一级网络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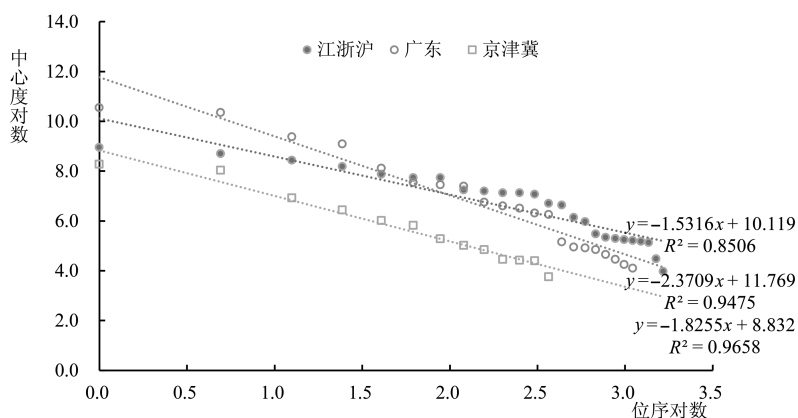


图5 三大区域城市中心度—位序双对数坐标图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核心层(网络)是由较强关联关系所构成,表示城市群中城市联系较为紧密的网络部分。

头尾断裂法是对城市网络的层级结构进行划分的一种有效方法。采取此方法,可以清晰地揭示城市群网络结构的层次性。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可以进行三次层级划分,核心层仍可分出层次;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则可进行两次层级划分(见表2)。可见,城市群城市间网络联系的组织形态都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不同城市按一定的层级结构相互连接;不同层级之间的城市联系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网络、一级网络、核心层城市联系强度均值的比值关系分别为1:5.5:13.6、1:8.6:39.6和1:6.8:23.0,层级之间城市联系强度相差悬殊。

此外,三大区域之间城市联系网络的层级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城市网络规模和节点城市空间分布有很大关系。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网络规模较大,一级网络之上的核心层还可再分为核心网络和核心区两个层次。核心网络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绍兴8个节点城市构成;核心区为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绍兴5个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城市间联系最为密切,不论是整体网络、一级网络还是核心层,平均联系强度均为最大;核心层有广州、佛山、东莞、深圳4个城市。而京津冀城市群网络规模最小,网络紧密度最低;核心层仅有北京、廊坊和天津3个城市。

2. 城市群网络层级结构特征的比较

中国城市群规划范围差异较大,空间界定缺乏一致标准,通常难于比较分析。而通过对城市网络的层级划分,则可以比较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网

表2 三大城市群城市联系网络层级划分

区域	指标	整体网络	一级网络	核心层	
长三角城市群	联系强度总量	19718.0	16591.4	10711.0	6587.3
	联系强度均值	65.7	360.7	892.6	1646.8
	联络线数(条)	300	46	12	4
	城市数(个)	25	17	8	5
珠三角城市群	联系强度总量	51409.5	48430.1	38736.6	
	联系强度均值	244.8	2105.7	9684.2	
	联络线数(条)	210	23	4	
	城市数(个)	21	10	4	
京津冀城市群	联系强度总量	5074.2	4429.4	2991.7	
	联系强度均值	65.1	442.9	1495.9	
	联络线数(条)	78	10	2	
	城市数(个)	13	8	3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网络的层级结构特征。上文的分析表明,不同城市群区域内的城市联系强度分布,均服从幂律分布规律,且具有无标度特征。这一特性决定了剔除城市群边缘城市,并不会改变城市网络结构的总体特征。通过对比分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城市网络结构具有以下异同之处。

第一,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的发育程度不同。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网络结构特征,如网络规模、层级数量、联系强度等有着较大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网络规模大,层级多,结构复杂;珠三角城市联系紧密度最高,网络凝聚力强;京津冀城市网络规模小,结构简单,紧密度最低。

第二,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的空间联络形态不

同。以头尾断裂法提取的表现城市强关联关系的一级联系网络,可大体勾勒出网络空间形态的方向性。从各城市群一级网络关系图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空间形态存在明显的方向性差异(见图6)。长三角城市群一级网络的空间联系以上海为核心,基本沿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两条主轴,呈“Z”字型网聚分布。珠三角城市群一级网络以广州为核心,围绕珠江东西两岸呈扇形展开。京津冀城市群一级网络联系明显呈现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发散分布。这种一级网络联系是各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主体架构。

第三,不同城市群具有同样的网络组织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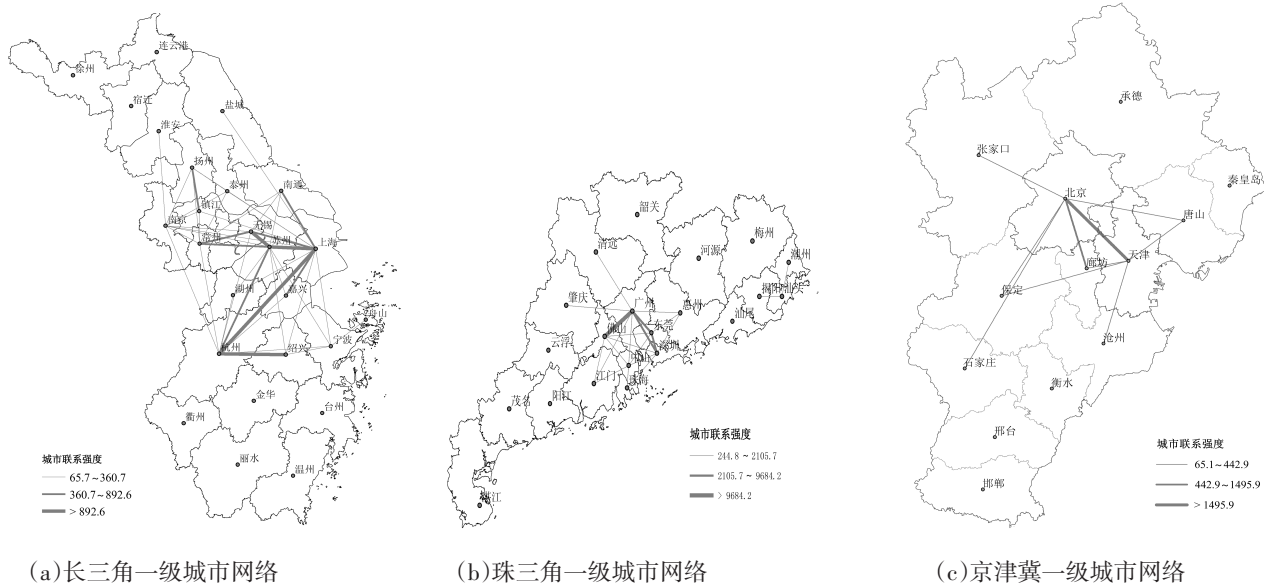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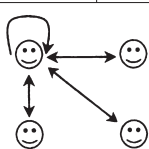


图6 三大城市群一级城市联系网络

资料来源: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即“核心—边缘”结构。通过块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城市群的网络规模、联系强度和空间形态的差异很大,但都具有相同的网络结构特征。即使是在一级城市网络,城市群的网络联系也是围绕几个主要节点城市组织连接起来的,存在明显的核心与边缘的角色差异。例如,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核心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和常州;珠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核心为广州、深圳和东莞;京津冀城市网络的组织核心为北京和天津。处于核心地位的城市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构成凝聚子群;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相互之间存在较弱的关系,甚至不存在关系,但它们与核心城市之间有着相对较强的关系。如表3的块密度矩阵所示,针对城市群一级城市网络,长三角核心城市子群内部城市联系的块密度为608.1,边缘城市子群与核心城市子群联系的块密度仅为101.8,而边缘城市子群内部城市联系的块密度只有13.6。

表3 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块密度矩阵

长三角城市网络			珠三角城市网络		
	1	2		1	2
1	608.1	101.8	1	3818.7	1646.2
2	101.8	13.6	2	1646.2	88.1
京津冀城市网络			简化图: 		
	1	2			
1	2229.3	183.3			
2	183.3	0.0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注:1为核心城市块,2为边缘城市块。

五、结论与讨论

上文利用城市引力模型构建城市联系网络,通过网络联系的幂率分布检验、基于头尾断裂法的网络层级划分和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分析,探讨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城市网络演化的某些共性特征,形成了系列结论,但对于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幂率分布与层级结构的研究,未来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 主要结论

第一,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强度呈现明显的长尾分布形态,其概率分布服从幂律分布规律。但在双对数坐标下,样本曲线几乎都存在下尾部折弯下垂的现象,截尾数据的模型拟合度会明显提高。推

测幂律函数的拟合精度,与城市群发育程度和区域范围界定的匹配关系有关。这一判断可以作为基于城市联系的城市群范围识别的标准之一。

第二,城市群内的城市联系网络并非随机网络,而是无标度网络。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数据检验,发现城市联系强度分布具有标度不变性,即在不同空间范围,城市间联系强度的分布均符合幂律分布的特征。这说明,城市群网络联系的发展演化具有自组织的性质,城市网络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

第三,城市群内的城市网络是“有等级倾向的网络”,其网络结构表现为明显的层级性。在城市网络中,存在基于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通过头尾断裂法可以将城市网络划分出联系强度相差悬殊的若干层级。各城市群均是由少数城市为重要枢纽节点,在不同的规模层次上自我组织建立起来的网络联系,它们具有相似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

2. 进一步讨论

第一,本文主要基于城市引力模型的综合性的城市网络联系数据展开研究,城市之间的专业性网络如企业关联网络、科技创新网络、交通流和信息流网络等,其联系强度数据是否也同样具有幂率分布特征,值得进一步验证。对此,初步利用已有文献中的数据验证后发现,其他类型的城市联系网络也具有相似的幂率分布特征。例如,利用唐子来和张泽(2022)研究中的长江下游区域城市之间企业关联网络数据,进行幂率分布检验,拟合优度高达97.8%;利用张鹏飞(2023)研究中关于京津冀城市群节点城市间信息流联系网络数据,进行模型检验的拟合度也达94.2%。

第二,本文在数学上探讨了城市网络联系的幂率分布规律,如何在理论上阐释城市网络联系幂率分布的形成机制有待继续研究。城市网络的无标度幂率分布现象不是偶然的,必然存在一定的形成机制。其中可能的理论解释包括:网络生长与优先连接机制、城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城市相互作用的规模与近邻效应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本文证明了城市群内的城市网络是“有等级倾向的网络”,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运用网络化发展模式,以协调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有待继续讨论。网络发展模式为区域内不同城市的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同时也为城市在网络发展格局中保持或提高竞争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城市群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如何在规划和政策层面有效利用和扩大城市网络的协同效应,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香港、澳门与广东省内城市存在制度差异,不完全适用基于交通距离的城市引力模型测度城市联系强度,故本文研究中未纳入港澳两地。本文认为如有合适方法将其纳入,文中的分析数据会有差异,但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BARABÁSI A, ALBERT R.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J]. *Science*, 1999, 286: 509—512 .

[2] CAMAGNI R P. From city hierarchy to city network: reflections about an emerging paradigm [C] // LASCHMANAN T, NIJKAMP P, et al.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the space economy* [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93: 66—87.

[3] JIANG B. Head/tail breaks for visualization of city structure and dynamics[J]. *Cities*, 2015, 43(3): 69—77.

[4] JIANG B. Head/tail breaks: A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data with a heavy-tailed distribution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3, 65(3): 482—494.

[5] MEIJERS E J. From central place to network model: Theory and evidence of a paradigm change[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7, 98 (2) : 245—259.

[6] NEAL Z P. From Central Places to Network Bases: A Transition in the U.S. Urban Hierarchy, 1900—2000[J]. *City & Community*, 2010, 10(1): 49—75.

[7] TAYLOR P 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8] 丁如曦,刘梅,李东坤.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区域协调发展驱动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统计研究*, 2020, 37(11).

[9] 蒋明华.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分布及结构特征:齐夫定律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6).

[10] 刘湘平,刘慧平,邹滨,等.基于城市联系网络的城市群等级结构对比[J].*经济地理*, 2021, 41(2).

[11] 苗洪亮,周慧.中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和等级结构的比较:基于综合引力模型的分析[J].*经济地理*, 2017, 37(6).

[12] 唐子来,张泽.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新视野和新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13] 王欣,吴殿廷,王红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定量计算[J].*城市发展研究*, 2006(3).

[14] 魏丽华.论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基于京津冀与沪苏浙的比较[J].*地理科学*, 2018, 38(4).

[15] 张鹏飞.流空间视阈下城市群网络结构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3.

[16]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引力测度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J].*金融论坛*, 2019, 24(4).

Power-Law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Network Linkages

Sheng Guangyao

Abstract: There is a power distribution law for urban network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law, urban networks are “networks with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and their network structures are necessarily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hierarchical features. First, based on the city gravity model to measure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cities,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strength of inter-city linkag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a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city network linkages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law distribution and are scale-invariant. The city network linkag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a scale-invariant network that follows a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e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network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divided and comparatively analysed based on the head/tail breaks method. 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ize, streng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networks of different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trong linkages also differ in direction, their network structures all have obvious “core-edge”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s; City Networks; Power-Law Distribution; Head/Tail Breaks Method; Network Analysis

(责任编辑:文 锐)

【城市经济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阎东彬 王蒙蒙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借助2011—2021年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剖析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查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9大中心城市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态势,但韧性绝对值相对偏小;各中心城市相关影响因素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化明显,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说明本地区域和邻近区域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各中心城市应立足区位特征,从优化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增强城市韧性,推动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实力跃升。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韧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19-10 **收稿日期:**2024-0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城市群功能空间系统重塑的机制及动力研究”(23BJY042);2023年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阎东彬,女,河北金融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城市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保定 071051)。

王蒙蒙,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100029),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保定 07105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近年来地质灾害和特大暴雨以及新冠疫情等灾害频发,加之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压力,使得城市现代化进程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与冲击,城市脆性崩裂风险与韧性提升的双重诉求愈加强烈。而建设韧性城市恰是实现城市现代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中国城镇体系规划设置的最高层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平台和

战略支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家中心城市承担着引领我国城市建设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再以多中心多层级的空间方式带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以中国式城市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战略任务。截至目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郑州、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9个城市获此殊荣。率先推进国家中心城市韧性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最小化中心城市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的负面影响,而且能够为其他城市树立城市韧性典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韧性提升,增强城市应对风险能力。

由此引发以下思考: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等冲击时,国家中心城市是否具有强劲的韧性抵抗冲击?城市韧性时间发展趋势及空间演变特征如何?是否引领周围城市逐步从形成性城市向成熟性城市转变,保持健康良好发展?如何根据自身实际禀赋制定增强综合韧性路径?基于此,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出发,试图分析9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成因,以期为周边城市韧性提升提供范例,以城市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对策。

一、研究综述

韧性的概念被研究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比如生态学(Holling, 1973)、工程学、社会生态系统(Alberti, 2005)、城市规划和灾害风险管理(Thomas等, 2007)等。根据应用学科的不同,韧性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和含义。韧性有动态和静态之分,静态韧性多用于研究工程领域,表示系统恢复到原有状态。动态韧性多与社会生态学有关,是基于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不可能恢复到以前平衡状态这一假设来进行分析的。

城市韧性的概念被用于支持城市政策(邵亦文等, 2015),其目的是创建能应对各方压力和自然灾害的有韧性的城市。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社区等不同学科领域中都对城市韧性进行了研究。城市韧性是在Holling(1973)提出的社会生态学复原力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仅涉及复苏和反复,更重要的是转变、变化以及适应的过程。城市韧性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基础设施等维度(李亚等, 2016; 孙阳等, 2017; 张鹏等, 2018)。从单一维度来看,城市经济韧性中财政支出和FDI(徐媛媛等, 2017)、企业创新(齐昕等, 2019)、产业多样化和创新(杜志威等, 2019)等都影响经济韧性。就城市社会韧性而言,完善城市社区保障体系(Allenby, 2005)在提升社会韧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加速经济转型(王思斌, 2016)和增强经济韧性(张恩嘉等, 2018)。城市生态韧性是指城市系统遭受冲击后的自我恢复能力,有学者使用城市的社会韧性、生态韧性分析城市韧性(陈天等, 2019; 周利敏, 2015)情况,并分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在城市韧性水平测度研究中,不同学者分别从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组织与生态等

多维(李刚等, 2018; 张明斗等, 2018; 张鹏等, 2018)视角量化分析,而暴向平和张学波(2021)、朱金鹤和孙红雪(2021)分别从抵御恢复力、适应调整力和创新转型力三个方面对城市韧性进行评价。研究区域多针对单一省份(孙亚南等, 2021; 林耿等, 2020)、城市群(张悦倩等, 2022; Meyer等, 2019)或某一类地区(彭荣熙等, 2021)。当前我国对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张鹏(2019)指出市场力与人口密度会对城市各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部分学者认为科技创新力能够对城市发展质量带来正向影响。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综合实力强劲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其城市韧性大小,为国家进一步推广建设城市韧性提供引领示范作用;在研究方法上,结合熵值法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以期精准测度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空间演变规律,为更全面、更精准地研究城市韧性提供参考;针对城市发展质量情况,从政府、市场、技术、开放性和金融等5个方面选取9个指标,动态分析其对我国中心城市韧性的影响力水平,以期厘清城市韧性影响机制,为提高国家中心城市应对系统危机能力提供依据。

二、城市韧性评价方法

城市韧性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生态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系统,系统内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并发挥各自功能,其中经济韧性是动力,社会韧性是基础,生态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是环境和物质基础,各个子系统共同构成城市韧性,并最终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韧性各子系统框架

城市社会韧性是城市居民在应对社会和政治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治理水平的影响,评价内容包括三方面:人类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同时,城市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应该控制在合理区间,一旦超过某一阈值,就可能会对社会和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并难以修复。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社会韧性也很重要,因为较低的教育水平往往会增加城市脆性,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对提升城市韧性

有积极影响,信息和知识可以为居民提供应对冲击和压力的能力,居民之间建立良好联系,依靠文化纽带创建和谐社会,创建有韧性的城市。此外,城市社会治理能力也不容忽视,全面应急管理系统使政府能够有效应对紧急情况。

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经济体应对外部压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经济体系将经济波动影响降到最低的能力。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居民和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一个有韧性的经济体需要拥有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经济禀赋,过于依赖单一产业的城市在经历危机、灾难或者风险后恢复和适应能力较差。当城市应对外部经济动荡时,多元化经济将成为应对这些动荡的新模式,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强大的经济体系能使城市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并在压力下追求长期繁荣发展。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商业投资环境、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均使城市经济体系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韧性是城市依靠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快速有效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韧性能够恢复和维持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基础设施必须能够应对突发灾害,并通过系统内部协调恢复其原始结构和功能。

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居民日常公共服务设施,比如通信和电力系统是城市健康运行的基础,以及城市应对风险或灾害的关键资源和基本保障。同时,创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依靠技术水平快速从压力和风险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城市生态韧性是指当城市气候发生变化时,将城市生态压力降到最低的能力,是城市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并保持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居民在自然系统中获得生活必需品,但这些基本资源在风险来临时为居民提供重要服务。无论是日常需求还是紧急需求,都会给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和污染,因此,需要保护自然资源来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为城市发展提供自然屏障。

(二)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不同城市特征可以呈现不同强度的城市韧性,而城市特征中的冗余、多样性、包容性、公平、去中心化、灵活性、前瞻性、自适应能力等都对增强和保持城市韧性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根据上述评价分析框架,从整体角度分析城市韧性,结合研究区域特点及数据获取程度,将城市韧性分为4个子系统,包括城市社会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每个子系统根据其特性构建相关子元素,共有9个二级指标和26个三级指标,构成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属性
城市社会系统	人口发展	城镇化率(%)	0.012223653	+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0.014152871	+
	社会发展水平	R&D从业人员(人)	0.063677138	+
		期末失业率(%)	0.020353548	-
社会治理水平	医院床位数(床)	0.037223265	+	
	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量(人)	0.011778161	+	
城市经济系统	经济禀赋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个)	0.035171487	+
		居民存款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	0.068601928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0.041582697	+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0.071625177	+
		人均GDP(元)	0.024221911	+
	经济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0.019606015	+
城市基础设施系统	基础设施水平	城市用电量(万千瓦时)	0.038154007	+
		公路线路里程(千米)	0.179388134	+
		供水管道长度(千米)	0.048226219	+
		公共交通客运量(万人)	0.080788816	+
		互联网接入数量(万户)	0.045004101	+
		创新能力	专利授权数量(件)	0.04517930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续表 1

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属性
城市生态系统	资源利用水平	能源强度(吨标准煤/万元)	0.019195138	-
		人均可用水量(吨)	0.061836602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06323946	+
	环境治理能力	污水处理率(%)	0.005478687	+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0.009947649	+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0.007464483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24989941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三)模型分析

1.城市韧性评价模型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城市韧性各指标权重,以便客观准确地评价研究对象。在测度各中心城市韧性时,首先对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进而得到各相关城市的城市韧性指数,并分层级地对城市韧性进行评价。

2.空间相关性模型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地理事物都有空间相关性,但距离越近的事物空间相关性越大。各中心城市的空间相关性是指中心城市对邻近城市韧性的溢出或扩散效应,本文通过识别城市集聚程度,得到城市韧性的空间演化规律和特征。

(1)全局空间相关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检测城市是否在空间中表现出集聚,并描述其在整个研究区域中的空间特征。一般情况,使用Moran指数测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Moran指数 I 的取值一般在 $[-1, 1]$,取值小于0表示空间邻近或邻接的区域单元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越接近于-1表示城市间的差异性越大;等于0表示不相干;大于0是正相关关系,越接近于1表示城市间关系越密切,相似度越高。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i \neq j) \quad (1)$$

其中, n 是地区总数, x_i, x_j 分别是第 i 、第 j 个地区的观测值, \bar{x} 表示空间测量值的均值, S^2 为方差,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标准化的Moran' I 统计量公式如下:

$$Z = \frac{I - E(I)}{\sqrt{\text{Var}(I)}} \quad (2)$$

(2)局部空间相关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前提是区域同质性假设,但是实际中区域异质性更常见,总体上高度自相关并不意味着局部区域也高度相关。所以,局部空间自相关通过比较观测值、邻近值和全局值之间关系,更准确地捕捉局部空间元素的集聚和分化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一般使用局部Moran指数和Moran散点图。

其中,局部Moran指数被定义为:

$$I_i = \frac{(x_i - \bar{x})}{S^2} \sum_j W_{ij} (x_j - \bar{x}) \quad (3)$$

正的局部Moran指数表示该城市与邻近城市的属性相似(“高一高”或者“低—低”),负的局部Moran指数表示该区域与其邻近区域的属性不相似(“高一低”或“低—高”)。

(3)空间权重矩阵的改进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计算结果的差异性。空间权重矩阵是对称矩阵,其组成元素 W_{ij} 表示第 i 个和第 j 个空间单元之间的接近关系,一般基于地理距离标准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而以地理区位差异反映出的区域空间联系及其强度,仅体现地理邻近特征影响,而中心城市区域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其他非地理邻近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居民人均收入被用作反映经济发展差距的指标,空间权重 W_{ij} 可以用 i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 j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之差的倒数来表示。如果两个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较小,则经济相关度较大,权重也较大;相反,则经济相关度小,权重也很小。因此,本文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具体公式如下:

$$w_2 = \frac{1}{|p_i - p_j|} \quad (i \neq j) \quad (4)$$

3.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根据变量选择的可操作性、科学性和导向性原则,本文从政府、市场、技术、开放性、金融5个方面甄选出与城市韧性高度相关的系列影响因素(见表2)。

表2 城市韧性影响因素指标

影响因素	指标	衡量方法
政府因素	财政规模(CG)	财政收入/GDP
	财政风险(CF)	财政赤字/GDP
市场因素	市场容量(SR)	人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市场潜力(SQ)	人口密度
技术因素	技术创新力(TC)	科技支出/GDP
开放性因素	外资投入(FDI)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外贸水平(FT)	进出口总额/GDP
金融因素	金融规模(BS)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
	金融效率(BE)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贷款总额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因空间杜宾模型在识别变量间空间相互关系与结构模式上,具有同时考虑因变量和自变量空间相关性的优势。考虑到各中心城市韧性不仅受到同期自变量的影响,也受前一期各因素以及自身过去值的影响,因此,将时间和空间滞后变量加入模型中,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城市韧性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UR_{it} = \alpha + \rho w_{ij} UR_{jt} + \tau UR_{it-1} + \kappa w_{ij} UR_{jt-1} + \lambda_1 CG_{it} + \lambda_2 CF_{it} + \lambda_3 SR_{it} + \lambda_4 SQ_{it} + \lambda_5 TC_{it} + \lambda_6 FDI_{it} + \lambda_7 FT_{it} + \lambda_8 BS_{it} + \lambda_9 BE_{it} + \delta w_{ij} X_{j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UR_{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韧性值,解释变量包括 UR 滞后一期值、 CG 、 CF 、 SR 、 SQ 、 TC 、 FDI 、 FT 、 BS 、 BE , κ 表示内生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衡量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的影响程度, δ 表示外生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衡量自变量空间影响情况。 α 、 μ_i 、 η_t 、 ε_{it} 分别表示常数项、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和误差项。

(四)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11—2021年,研究单元为9个国家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郑州、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22年各中心城市统计年鉴、2011—2021年各中心城市统计公报和统计局网站。

三、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分析

本节结合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莫兰指数对国家级中心城市韧性时间变化趋势及空

间演化规律进行分析。

(一)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表3测算结果,可以得到2011—2021年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基本水平。总体来看,2011—2021年间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平均韧性值从0.2146增加到0.38768,增长率为80.65%,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韧性发展态势良好;从城市韧性增速发现,2020年和2021年增长速度都有所放缓,从侧面反映出外界环境对整个城市系统功能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压力还是失业人口的增加,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行。具体到各中心城市,北京城市韧性平均水平最高(均值为0.43832),韧性值从2011年的0.31279增加到2021年的0.59398,增长率为89.90%。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综合性中心城市,各项功能基本保持全国首位,发展优势明显。其次是重庆(均值为0.37582)和上海(均值为0.36148),从2011年到2021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5.27%和70.17%。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节点,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机会较多,相应的韧性水平也较高。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门户,综合实力雄厚,韧性水平也较高。广州经济实力雄厚,地理位置优越,且韧性水平增长较为平缓,武汉拥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科研教育资源,综合韧性水平虽不高,但发展潜力巨大;郑州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韧性水平与其他中心城市还有一定差距。而天津、成都和西安3个中心城市韧性均呈现波动式上升状态,其中,天津2016年韧性下降12.68%,外贸依存度、公共交通客运量、互联网宽带接入数量均有缓步下降趋势,且R&D从业人员数量下降趋势明显,由2015年的177725人下降到2016年的111262人,下降37.40%,对R&D人员的弱吸附力影响天津市韧性大小;成都从2014年城市韧性下降,2016年韧性又逆势增加,表现为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量、人均GDP、城市用电量和专利授权量不同程度下降;西安城市韧性均值仅是北京韧性均值的40%,且2014年开始缓慢下降,2016年又逐渐回升。从宏观来看,国家中心城市韧性虽然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绝对数值相对偏小,特别是西安和郑州,说明国家中心城市韧性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体现出韧性城市建设和增强城市韧性研究的重要性。

从城市韧性各子系统来看,城市社会系统中,

表3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综合测算结果

城市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均值
北京	0.31279	0.34554	0.37438	0.36777	0.38750	0.41861	0.43632	0.47521	0.54215	0.56731	0.59398	0.43832
天津	0.16885	0.17981	0.20483	0.24391	0.25297	0.22089	0.23279	0.24862	0.25645	0.27756	0.29479	0.23468
上海	0.30235	0.31602	0.33221	0.32933	0.33652	0.35411	0.32921	0.35922	0.38479	0.41801	0.51452	0.36148
郑州	0.12911	0.13596	0.14618	0.16179	0.16487	0.17726	0.18817	0.20089	0.21636	0.23908	0.24622	0.18235
武汉	0.12253	0.14481	0.16949	0.17341	0.18542	0.19575	0.19777	0.22955	0.24500	0.27208	0.29000	0.20235
广州	0.22988	0.24959	0.29719	0.28598	0.29455	0.30848	0.31173	0.31903	0.33846	0.38842	0.42290	0.31329
重庆	0.32444	0.34784	0.33818	0.34226	0.34598	0.36154	0.35186	0.37042	0.42352	0.45670	0.47133	0.37582
成都	0.20698	0.22351	0.24198	0.20911	0.20887	0.22959	0.31100	0.31796	0.33297	0.39961	0.42834	0.28272
西安	0.13450	0.14024	0.16971	0.16684	0.15685	0.16036	0.17806	0.17513	0.19480	0.21058	0.22709	0.17401
均值	0.21460	0.23148	0.25268	0.25337	0.25928	0.26962	0.28187	0.29955	0.32605	0.35881	0.3876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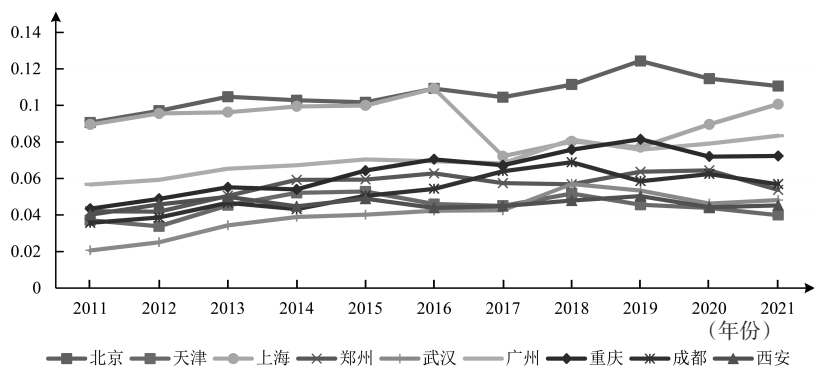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中心城市社会系统韧性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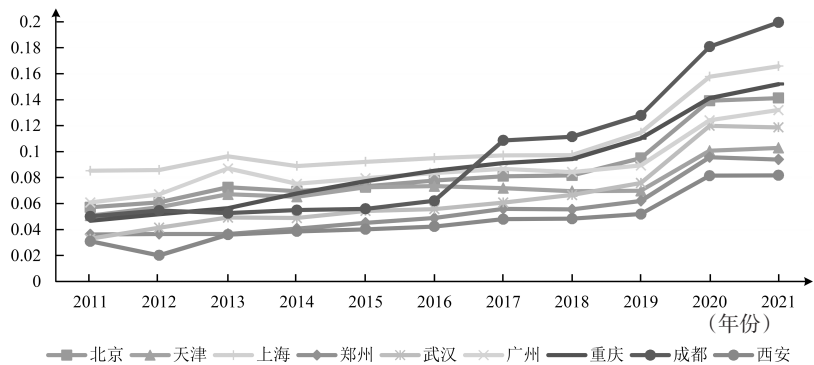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中心城市经济系统韧性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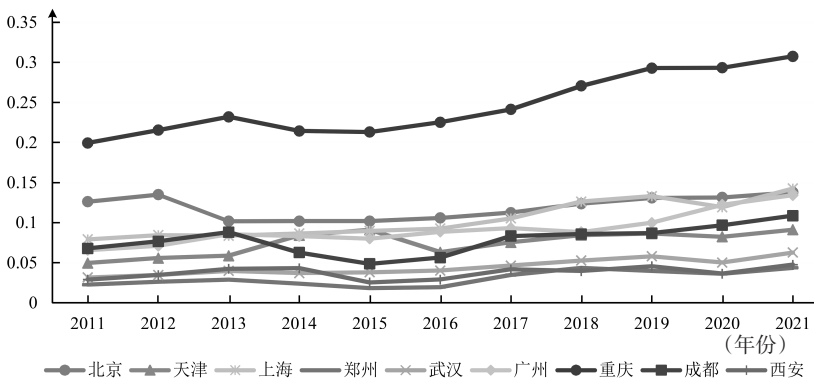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系统韧性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北京和上海社会系统韧性水平远高于其他中心城市(见图1);城市经济系统韧性中,上海经济韧性水平较为平稳,而成都在2017年之后经济韧性水平高于其他中心城市,且各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见图2);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系统中,重庆和北京韧性较高(见图3)。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良、基础设施完善、社会资源丰富,城市功能也相对较为完善,所以各系统韧性水平较为接近,但西安和郑州的经济韧性水平和基础设施韧性水平与其他中心城市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实力不足,公共产品供应水平有待提高。

(二)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

本文采用经济地理矩阵对国家中心城市空间关联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1.空间全局相关特征

表4显示,国家级中心城市间在2015年之前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2016年开始各中心城市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且城市间的相关性越来越紧密,且2018—2020年显著性低于5%,表明中心

表4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全局莫兰指数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Moran I 指数	-0.177	-0.223	-0.262	-0.264	-0.324	-0.345*	-0.469*	-0.519**	-0.487**	-0.496**	-0.42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2—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城市韧性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 空间局部相关特征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揭示各中心城市与其他经济地理距离相近城市的城市韧性关联空间特征。在莫兰指数散点图中,北京和上海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为高值聚类(H-H)^①,天津始终处于第三象限,为低值聚类(L-L);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城市之间的集聚度在不断下降,从2017年开始,郑州和成都由L-L型城市分别转为L-H型和H-L型,说明郑州作为中心城市正在不断受到外界及政府关注,对其周边区域的积极作用初现;成都对周边辐射作用达到一定瓶颈。而武汉和西安始终是L-H型城市,广州和重庆为H-L型城市,资源要素未能有效地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流动,导致其城市韧性提升甚微。城市韧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导致城市韧性水平的不同,进而推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发展。各中心城市多种因素的梯度发展也在不断促进城市韧性综合水平的提高。

四、国家中心城市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各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具有一定空间关联特征。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空间估计结果显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中因变量的空间滞后和时空滞后系数估计值在5%水平均显著。城市韧性不仅在空间上产生溢出效应,在时间上也具有前后项的关联性。时空交互项系数估计结果表明, $t-1$ 期本地城市韧性会对当期城市韧性产生正向影响。这也表明建立时间交互效应的动态空间模型可有效描述各中心城市韧性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溢出效应。

(1)扩大财政规模对国际中心城市韧性的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财政规模越大,越

能集中配置社会资源。适度财政规模有利于政府进行有效宏观调控。若财政规模过大,超过社会剩余产品总量,便不利于社会市场资金的周转,而国家中心城市多为成熟性城市,同样财政规模带来的经济效应弱于形成期城市。财政风险会阻碍各中心城市城市韧性的提升,但是对邻近区域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心城市的财政风险对本地产生压力,但是却有助于提升邻近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

(2)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均产生正向本地效应,而对邻近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一方面,提高市场容量更有助于提升经济内生动力,进而增强本地城市韧性,但国家中心城市市场容量增加的原因是获取邻近城市市场资源,这样就削弱了邻近城市的城市韧性;另一方面,国家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使人口向其迁移,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集聚。但从影响力来看,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高,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影响较小。

(3)技术创新对城市韧性的本地效应是正向,对邻近区域有负向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提升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韧性,但科研产出具有一定滞后效应。而创新负向溢出效应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区域的研发会被更发达城市占领先机,进而阻碍其城市韧性的发展。

(4)外资投入和外贸水平的城市韧性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但外贸水平的本地效应不显著。外资利用水平不断增强可以提升经济多元化水平,提高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增强城市韧性。外贸水平影响着产业结构,并不断对贸易进出口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以顺应国际市场供求变动,进而产生积极的外贸效应来提升城市韧性。

(5)金融规模对城市韧性有正向影响,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金融效率无论是本地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均为负。金融规模的扩大通过增强社会闲散资金的集聚效应进而提升城市韧性,但是对邻近城市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可能

是由于中心城市吸收邻近城市存款,降低邻近城市金融规模,不利于韧性提升。金融效率是金融机构存款额度与贷款额度之比,因此,金融效率的提升表明银行盈利能力下降,风险防范能力下降,并且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这些无疑不利于城市韧性的增强。

另外,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由于存在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不能完全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长短期效应既可以展示长期均衡的状态,也能对短期变动进行分析,是识别长短期差异的重要工具。从实证结果来看,长期效应未通过检验的情况与短期未能通过检验的数量相同,故在整个作用系统中,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都能产生影响。市场容量、市场潜力以及外贸水平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不显著,说明中心城市市场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且市场容量有“透支”趋势,影响力度有限。在新发展格局情况下,外贸水平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

从直接效应来看,财政规模和财政风险对城市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表明从短期看,中心城市财政规模和财政风险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再进一步扩大财政规模和财政风险会滋生城市刚性色彩,使其缺乏韧性;但是长期来看,效果非常显著。由于技术创新效果的时滞性,短期内其对城市韧性提升作用效果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但是长期效果显著。FDI短期来看对城市韧性呈显著正效应,但是长期对城市韧性的提升具有负向作用。金融规模在短期对城市韧性有正向作用,长期则为负向作用;金融风险短期而言是负向作用,长期转为正向作用。在间接效应中,长期效果不显著变量较多,所以长期均衡只是理论上的期许,而城市韧性影响仍以短期溢出效应为主,即本地区的财政规模、财政风险、利用外资以及金融规模和金融风险对邻近地区城市韧性有显著影响,即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过程,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9大中心城市韧性呈持续性增长态势,从平均韧性值来看,北京城市韧性最高,其次是重庆和

上海,韧性水平最低的中心城市是西安;但整体上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绝对数值相对偏小,特别是西安和郑州,说明国家中心城市韧性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2)从各中心城市城市韧性的空间演变规律来看,全局莫兰指数表明中心城市韧性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局部莫兰指数表明北京和上海始终为高值聚类(H-H),天津始终为低值聚类(L-L),其他中心城市的集聚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各中心城市多种因素的梯度发展也在不断促进城市韧性综合水平的提高。

(3)相关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差异化明显,其中,财政规模、财政风险和金融效率对中心城市韧性有负向作用,表明中心城市财政规模过大,反而不利于社会资源周转,财政风险的提升也不利于增强中心城市韧性,金融效率的提升意味着银行盈利能力下降,风险防范能力下降,并且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这些无疑不利于城市韧性的增强;市场因素、技术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以及金融规模对中心城市韧性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可促进中心城市韧性的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潜力和容量均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市场因素影响较小;科技创新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在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可以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韧性;开放性因素通过加强中心城市对外贸易,提高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金融规模扩大可提升社会资金利用效率,有助于中心城市建设进而强化城市韧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优化政府职能。在国家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为提高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应变能力,政府要加强服务角色转换。一是重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层社区建设,弥补社区规范管理短板,以多元化治理主体增强中心城市治理包容性和聚合性。在完善政府服务能力基础上,加快完善中心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应急处理技术及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完善财政预算和支出体系,提高财政支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利用效率,科学规划中心城市发展任务。三是制定更具操作性的韧性城市相关制度,加快建立与周边地区的区域一体化防控机制,提高区域整体应急管理水平和,进而达到巩固强化各中心城市社会系

统韧性的目的。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更有利金融条件,各中心城市要不断突破地域界限,积极探索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心的金融产业互动,促进彼此交流、学习,推动不同中心城市间的金融合作,打造金融改革试验区,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渠道,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然后,根据各中心城市的外溢辐射作用,通过释放大量金融需求方式,集聚更多更高层次的金融资源,全面推动金融资源集聚与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高效衔接,实现城市金融效率提升、金融发展结构优化、金融规模拓展,通过高层级的金融集聚推动城市韧性提升,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态势。

(3)完善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势产业,集聚高端创新创业要素、平台,吸引海内外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创新创业团队、产业研究院、创新平台、科研院所等到中心城市来,作为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各国家中心城市应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技术空间溢出效应,组建科研创新团队,壮大研究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低韧性中心城市要努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进而增强城市韧性度。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协作,针对各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集聚行业上下游和产学研力量,集优秀人才与资源进行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4)进一步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动建立畅通无阻的经济大循环,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向规则制定转变,作为各区域经济中心和对外交流窗口的中心城市,需积极开拓市场空间、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打造多元化开放通道,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节点。一方面,要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以自贸区、综保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方式,开展多类型对外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贸易便利化,推动本土企业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要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构建一流服务贸易平台,积极构建全球经贸合作新通道。在鼓励外商投资并购的同时,各国家中心城市要积极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严控企业资源消耗与生态绩效,切实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消费潜力优势,积极打造和巩固以消费和服务为核心的城市

功能,成为吸引国内外消费资源的强磁场,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强韧性城市。

注释

①H-H:城市自身韧性与邻市城市韧性较高的地带;H-L:城市自身韧性较高而邻市城市韧性较低的地带;L-H:城市自身韧性较低而邻市城市韧性较高的地带;L-L:城市自身韧性与邻市城市韧性较低的地带。

参考文献

- [1] C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1—23.
- [2] ALBERTI M. The effects of urban patterns on ecosystem function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5, 28(2):168—192.
- [3] THOMAS J WILBANKS, JAYANT SATHAYE. Integrating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s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 synthesis [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2007,12(5).
- [4] 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国际城市规划,2015(2).
- [5] 李亚,翟国方,顾福妹.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的定量评估方法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6).
- [6] 孙阳,张落成,姚士谋.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8).
- [7] 张鹏,于伟,张延伟.山东省城市韧性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城市问题,2018(9).
- [8] 徐媛媛,王琛.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7(8).
- [9] 齐昕,张景帅,徐维祥.浙江省县域经济韧性发展评价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9(5).
- [10] 杜志威,金利霞,刘秋华.产业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基于后危机时期珠三角的实证[J].热带地理,2019(2).
- [11] B ALLENBY, J FINK. Toward inherently secure and resilient societies [J]. Science, 2005,309(5737):1034—1036.
- [12] 王思斌.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及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6(3).
- [13] 张恩嘉,张梦洁,彭翀.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韧性的时空格局及其关联性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6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755—766.
- [14] 陈天,李阳力.生态韧性视角下的城市水环境导向的城市设计策略[J].科技导报,2019(8).

- [15]周利敏.从社会脆弱性到社会生态韧性: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J].思想战线,2015(6).
- [16]李刚,徐波.中国城市韧性水平的测度及提升路径[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17]张明斗,冯晓青.中国城市韧性度综合评价[J].城市问题,2018(10).
- [18]张鹏,于伟,张延伟.山东省城市韧性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城市问题,2018(9).
- [19]暴向平,张学波.内蒙古经济韧性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9).
- [20]朱金鹤,孙红雪.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J].现代经济探讨,2021(10).
- [21]孙亚南,尤晓彤.城市韧性的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化规律: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21(7).
- [22]宋海朋.中国城市建设模式的演进历程及其特征[J].中国名城,2023(5).
- [23]林耿,徐昕,杨帆.佛山市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2020(9).
- [24]张悦倩,刘全龙,李新春.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J].城市问题,2022(5).
- [25]MEYER M, AURIACOMBE C. Good urban governance and city resilience: An afrocentric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 (19):5514.
- [26]彭荣熙,刘涛,曹广忠.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产业结构解释[J].地理研究,2021(6).
- [27]王俊松,颜燕,胡曙虹.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地理科学,2017(1).
- [28]王雨飞,倪鹏飞.国家中心城市分功能评价与测度:基于多源采集数据[J].社会科学研究,2020(3).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an Dongbin Wang Mengmeng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Move faster to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super-large and mega cities, and build livable, resilient, and smart cit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nine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from 2011—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lience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uses the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resilience of the nine central cities is showing a continuous growth trend, but the absolute value of resilience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local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various central citi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the significant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dicate that local and neighboring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urban resilienc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ach central city should focus on its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enhance urban resilience from optimiz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deepening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of central cities, and developing a high-level open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to leap.

Key Words: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rban Resilience; Dynamic Spatial Dupin

(责任编辑:柳 阳)

【城市经济研究】

智慧城市中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研究*

马丽 田世华

摘要: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是当前学术讨论与政策制定关注的焦点,也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概念之间具备较强的关联性,共享理念、数字技术、数据驱动、本地化构成两者之间相匹配的共性元素。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共享经济不仅依赖于独特的城市条件,而且给城市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共享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引发诸如加剧本地化的负外部性、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法规摩擦和监管冲突等问题。推动智慧城市中共享经济的规范发展,地方政府应优化共享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探索推进实验性监管,形成协商合作的治理模式,进而实现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

关键词:智慧城市;共享经济;实验性监管;协商共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29-08 收稿日期:2024-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平台权力的行政法规制研究”(22BFX026)。

作者简介:马丽,女,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郑州 450046)。

田世华,男,河南省科学院科研事业部副主任(郑州 450046)。

一、引言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深入发展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工程”的重要内容。共享经济新业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关注和强调,成为各地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对推动城市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意义重大(贾振博等,2023)。

发展共享经济已成为当前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冯祥辉等,2023)。共享经济和智慧城市一直是学术讨论与政策制定的热议主题,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密切关联,共享经济与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深度交织(Nestor M Davidson & John Infranca, 2016),已有研究从城市密度、社交网络、劳动力过剩或商品未充分利用等方面,分析共享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城市条件(Michèle Finck & Sofia

Ranchordás, 2016);从生活方式、经济社会治理、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分析共享经济给城市带来的深远影响(张鹤鸣等,2018)。已有研究为深入认识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的互动问题奠定了基础,但对共享经济的城市特性与由此产生的监管问题之间的联系探究不多,对共享经济的城市治理研究也需加强。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归纳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共性特征与互动,分析共享经济在当前法律框架内引发的城市监管问题,探讨地方政府如何以更智慧的管理方式,规范共享经济实践,进而实现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

二、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共性特征与互动

共享经济与智慧城市存在诸多相匹配的共性因素,且二者之间深度依赖、双向互动,构成共享经济在智慧城市中得以蓬勃发展的潜力。

(一)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共性特征

第一,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均秉持共享理念。“共享”一词是指通过共同利用空间、商品、信息、人才和经验等资源,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活动。共享本身是一种内在的城市现象,城市生活的空间限制和人口密度使得城市生活更倾向于共享资源而非消费资产所有权。公共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数据信息的制度化共享是大多数智慧城市固有的做法。共享经济的扩张也似乎表明,人们更倾向于获取而不是拥有,随时随地分享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服务、知识、技能,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私人 and 公共城市资源。

第二,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均由数字技术主导。数字技术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嵌入城市结构,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尖端数字技术应用不仅能够提高智慧城市系统运行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共享经济的即时交易。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物物交换、共享和租赁通过数字技术被重新激活。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全球定位系统(GPS)、即时通信、在线支付、评级系统等数字技术促进共享,使得用户拥有从本地即时共享服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第三,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均由数据驱动。创新的实践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从本质上讲,共享经济是一种数据驱动的经济,对供需平衡度、满意度、留存率等数据指标的深入分析,是通往用户更佳体验的关键。智慧城市也极为重视数据科学,城市治理的“智慧”取决于该城市在行政决策和公共服务中使用数据科学分析预测的能力。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借助数据预测和分析来提升服务和决策的效率。在这两种情况下,数据用于向公民/消费者提供目标服务,并且是两类模式的核心。

第四,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围绕社区参与,表现出明显的本地化特征。共享经济尽管是一种全新类型的信息商务模式,依赖于看似与地点无关的数字技术,但仍然深刻地以地方为基础,是一种牢牢扎根于城市地理的创新。邻近促进互动,平台构建的共享系统在本地社区和短距离内服务最佳。点对点市场中,当参与者生活距离较近,合作起来才更有效率。这也是为何共享平台即使具备全球规模,却也总是本地化运作的原因所在。同样,智

慧城市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设,但也无法忽视社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通过以社区为单位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能够以点带面地逐渐实现整个城市的智能化。

(二)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互动

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城市不仅塑造了共享经济,自身也被共享经济所塑造。

1.智慧城市:共享经济发展的自然场所

城市是共享活动驱动的新型循环经济的滋生地。共享依赖于独特的城市条件。首先,城市一直是协作和共享的环境。共享基础设施(如道路或桥梁)和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是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基础。城市居民通过共享使用当地资源来获得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街道、公园、公共空间以及社区设施。其次,城市邻近性和密度带来集聚效益。城市内部人口密度不断增长,为大量资源和供应商提供了基础,以支持在线市场的本地化服务。供需双方在地理上的接近促进了信息的流动,以及产品、服务和知识的交换。邻近性与人口密度相互作用,使供需双方的联系更加紧密。联系紧密的更大范围的市场确保了更高效的匹配。最后,城市往往是发展社交网络的最佳场所,能够促进基于相互信任、共同规范以及合作意愿的高效市场交易。

由于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网络、社交网络等一系列因素的集聚,智慧城市成为生产和创新集群,能够创造有利于协作交流的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共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产品和服务广泛分布、易于共享的地方,共享网络应运而生,数字平台的出现提升了共享网络的潜力。随着智慧城市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技术来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共享经济往往会成为首要的城市现象。共享须满足的城市密度、网络连接、劳动力过剩或商品未充分利用这几类条件在智慧城市中普遍存在。很难想象,在缺乏密集的供应商和消费者网络的情况下,共享数字平台还能在城市得以快速扩张。考虑到智慧城市密度和资源集中带来的益处,以及互联网连接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不难发现共享经济正在智慧城市中获得更多的吸引力。

2.共享经济: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

智慧城市与共享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智慧城市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也以一种新颖

的方式触动和影响城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

首先,共享经济通过提供符合智慧城市需求的服务,直接提升了城市的“智慧”。一是共享经济给城市带来更智慧的共享服务,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共享交通模式方便居民日常出行,解决出行往返“第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问题。共享住宿在特定的城市社区提供住房,获取比大型酒店更“真实”的地方体验。二是共享经济帮助城市节约成本。美国密歇根州和俄勒冈州等多地市政当局,通过平台 MuniRent 与其他地方政府共享重型设备来节省资源,能够减少政府总体支出。三是共享经济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共享单车促进城市地区清洁、节能、可持续的出行模式,2022 年两轮车共享带来的碳减排量约为 169 万吨。共享住宿也比酒店能够节约更多的水、电能源。通过技术最大化利用资源,共享可以抵消城市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实现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共享经济能够推动社区、全市层面的经济增长。共享经济正迅速成为城市居民获取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方式,促进经济转型。一方面,共享经济成为各种创业者的福音,通过简化进入市场的门槛,扩大个体对新经济的参与,为传统渠道拒之门外的人们打开新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可以利用闲置资源或碎片化时间,有更多的机会创造价值、增加收入。58 同城网站入驻劳动者由 2021 的 60 万人上升至 2022 年的 130 万人,劳动者收入同比提升了 50%。另一方面,某一辖区内共享活动的增长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经济效益。以共享住宿为例,可负担性提高和短期住宿范围扩大,可以增加游客的旅行频率和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从而创造额外的商业机会,如一个社区外来游客的增加可能会使当地餐馆、商店等利益相关者获益,这意味着最终会改善城市经济。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对共享服务开放,肯定会吸引商业机会。

最后,共享经济也在更新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城市逐渐开始依靠共享平台来完成传统的公共任务,在公共交通、应急响应等方面优化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例如,滴滴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交通出行数据资源进行挖掘,赋能交通规划,优化公共交通调度,有效帮助城市缓

解拥堵,实现城市交通智慧管理。美国 Airbnb 平台与旧金山合作开发新的服务功能,在湾区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时激活免费的住宿列表,帮助灾害中流离失所的人找到房屋。数字共享平台企业提供智慧治理的技术方案,有助于政府在平台运营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三、智慧城市中共享经济规范发展存在的问题

正如共享经济在城市蓬勃发展一样,共享服务也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增加了当地监管部门的治理难度。发展共享经济有助于打造智慧城市,但也须正视城市中共享服务引发的主要问题。

(一)加剧本地化的外部性

在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享经济,无疑也在地方层面上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考虑到共享经济的本地性质,其产生的外部性也高度地方化。城市为共享企业提供了培育市场的密度和邻近性,也会放大这些活动对当地的负面影响。通过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和释放过剩产能,共享平台在城市地区迅速扩张时,会产生集中、本地化的外部性。

关于高度本地化外部性的担忧已经引发极大的关注。如果共享经济实践造成了问题,通常会让城市邻近居民感到不安。

首先,共享经济商品和服务供应的非专业化,使当地消费者暴露于风险之中。非专业化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可能面临低于预期的服务体验和安全风险。例如,部分民宿房屋未达到消防安全标准,大多数共享经济平台将其员工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这些都会引发用户安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关切。

其次,共享商业化的趋势也给城市和街区带来了额外的问题,这些副作用包括公共空间私有化、环境破坏、安全隐患等。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虽然共享出行利用过剩的个人交通能力来减少汽车使用量,但城市仍然面临额外或替代驾驶服务的直接溢出效应,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城市已经开始研究拼车对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和安全的影响。共享住宿被理解为对现有住房的强化使用,会在社区甚

至街区层面产生更多的局部外部性,冲击社区的日常生活,包括短期游客涌入导致的噪声、过度拥挤、房价上涨及污染水平上升等。共享单车若管理不善,乱停乱放也会影响市容市貌。2022年,南方某一线城市公安局全年查处共享电单车交通违法事件超过3400起(田建川,2023)。

(二)冲击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冲击。一些大型数字共享平台基于相关先发优势,呈现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特性,倾向于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例如滴滴公司较早进入了网约车市场,并迅速占据了几乎垄断的地位,新进入者很难参与竞争。此外,共享平台企业通过规避适用于竞争对手的监管约束,被认为是以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切入市场。共享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传统企业获得市场优势的领域与其发生冲突,地方监管机构易于被困于传统企业和新市场进入者之间的(即数字共享平台)利益斗争。

共享平台新的垄断可能性也以一种不同形式存在于智慧城市全景中。智慧城市模式涉及大量部门,如交通、旅游、能源、卫生等部门。这一生态系统的关键在于互联互通。因此,就整个机制的运作而言,战略的一体化程度越高,效果就越好。地方政府往往选择一家共享数字平台企业运营商提供智慧城市所需的创新和高科技解决方案,这些参与者可能负责实现智慧城市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升级,构成地方政府一站式合作伙伴。然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导致“赢者通吃”局面的出现,单一主导解决方案将会构成市场竞争和持续创新的风险因素。例如,如果滴滴公司开始完全控制城市的交通,不仅可能驱逐传统出租车、其他约车平台等替代选择,还会减少公共交通的载客量,这将对城市提供基本服务的长期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三)产生法规摩擦与监管冲突

共享经济是一种颠覆传统市场范式的新经济形态。城市过去制定的关于旅游住宿、餐饮和交通出租法规,以及应对传统市场失灵的许可制度,在数字时代已经远远落后于新经济模式创新。城市针对传统行业模式而制定的监管规则与数字共享经济新模式之间常常产生摩擦与不协调,法规摩擦已经蔓延到诸多不同的法律领域。共享活动

在法律空白或灰色地带展开,规避了地方关于旅游住宿、消防安全、私人交通、地方税收以及劳动法保护的规定,对法律体系的传统设计构成了挑战。例如,共享住宿使用住宅区域的私人物业进行经营活动,不符合传统旅馆业对卫生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共享服务的提供者通常被视为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家或独立承包商,承担所提供的经济活动的全部风险,但其却不受劳动法中相关规则的保护。此外,个体分散交易中共享税征缴极其困难,经营者很容易逃避传统税收要求。在创新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地方政府难以执行现有的法规或创建新法规。

除既有法规的范围和适用性问题外,城市当局还面临着复杂的监管难题。面对大多数共享平台企业的运作方式与地方传统行业监管规则不协调的问题,以及数字共享平台的快速增长所造成的诸多负外部性挑战,城市政府正面临着管理的两难之境:一方面,传统法律规制方案是以现有经济活动的典型组织形式为蓝本设计,简单套用为规模化商业活动而适用的传统法规,禁止或严格限制共享活动会导致共享创新被过度的监管扼杀。另一方面,如果共享长期处于某种监管真空状态,平台企业既会拥有不公平的反竞争优势,也会危及对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如何使总体风险可控,但又能给予各种创新模式一定的容错空间,成为城市市场监管的难题。

截至目前,城市政府对数字共享平台快速增长所造成的诸多挑战仍缺乏一致的监管回应,一些城市对这些创新做法采取“放任”或最低限度的监管方式,予以容忍。例如,一些城市未制定共享住宿相关法规,仅根据投诉来具体解决问题;一些城市则采用原本为传统商业交易而设计的监管法规,限制共享服务运营。例如,个别城市“一刀切”式清退共享电单车,引发社会争议。总地来说,地方政府面临着共享创新和监管冲突的压力,城市与共享经济的最终关系仍不明朗。

四、智慧城市中共享经济发展的规范框架

考虑到共享实践给城市管理带来的多重风险因素,政府监管对公共利益保护是必要的。根据辅助性原则,城市当局在决定如何监管共享经济方面

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及政策灵活性。地方政府面临着更新公共政策的挑战,同时又不能削弱共享经济创造的价值。如何在鼓励共享创新中展开更智慧、更赋能的干预,成为智慧城市规范共享经济的核心命题。

(一)优化城市共享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

中国共享经济从2010年起兴起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共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创新创业的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促进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共享新业态的政策法规导向对城市营商环境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几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关于共享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部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为城市共享的规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培育、扶持新经济的发展。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要“发展共享经济”“培育形式多样的新型业态”。2016年11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网约车获得合法地位。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2017)、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明确提出以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对待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为弥合民生需求缺口、推动国内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两次提及“共享经济”,要求“健全共享经济管理规范,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进一步深化共享经济在生活服务领域的应用,拓展资源共享新空间。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将“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视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培育方向。中央层面利好政策激发了共享经济市场活力,推动了共享行业快速发展。2018—

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从29420亿元增长至38320亿元(见图1),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在地方层面,为落实和完善“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政策导向,持续优化城市共享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须平衡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政府是推动城市共享的重要力量,在监管态度方面,首先是支持和鼓励。政府应根据共享经济业态属性,并结合其发展阶段,制定适应共享行业发展特点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有利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兴行业,设置一定的观察期,审慎出台新业态准入限制政策,对创新企业给予先行先试机会;对尚处于培育期、具有成长性的新业态,清理资质资格获取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条件,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降低对经营活动的干预。目前,广州、重庆、石家庄等地在地方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或发展规划中均已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共享经济的政策导向(见表1)。其次是引导和规范。针对城市共享经济暴露出的不少问题与矛盾,地方政府需要在支持的政策导向上加以引导和规范,在肯定城市共享合法性地位的同时,建立健全适应当地发展实际的监管规则 and 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对于逾越安全和质量红线,危及人身健康、公共安全,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启动监管执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益,营造新旧业态公平竞争的环境,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目前,一些地方出台了如《北京市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珠海民宿管理暂行办法》《三亚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对共享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规范作用(见表1)。通过平衡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激发新经济创新创业活力,优化城市共享发展的营商环境,助力智慧城市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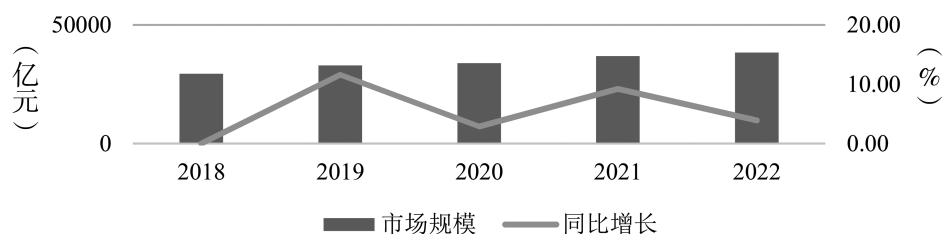


图1 2018—2022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表1 地方共享经济政策法规

发布时间	颁布机构	文件名称	政策要点
2021年12月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发展数字经济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市场主导、创新引领、共建共享、包容审慎、数据安全的原则
2021年12月	重庆市政府	《重庆市数字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年)》	鼓励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以包容审慎态度保护平台相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培育发展共享出行、共享居住、共享物品、共享办公等新业态新模式
2022年4月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统筹推动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创新发展,鼓励探索共享设备、共享车间、共享工厂、共享科技资源、共享物流、共享出行等共享经济新型组织模式
2023年11月	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石家庄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促进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创新发展
2017年9月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	《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	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021年2月	珠海市政府	《珠海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民宿经营管理,促进民宿业持续健康发展
2023年12月	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探索推进实验性监管

城市是实验性监管的完美实验室,地方政府是实验主义的天然引擎。共享经济的主要调控轨迹是分布式的,这为反映当地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实验主义开辟了空间。在过去的几年里,多个国家的城市监管机构决定转向实验主义,来规范共享经济内部复杂的创新现象。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了实验性的规则制定,试图为创新和不断发展的数字共享经济测试新的规则。我国学界也主张采用“实验性监管”来解决共享经济所带来的监管难题。实验性监管是一种包含暂时性、容错性和循证立法思想的政府监管模式,适用于快速变化的创新复杂领域。考虑到共享实践的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特征,采用实验性监管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可能提供城市政府寻求的智慧治理路径。实验性监管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允许地方政府制定灵活的法规,并测试实验规则的可行性。实验性监管鼓励地方率先监管,以共享住宿为例,我国中央层面尚未制定统一的监管要求,城市政府可以先就共享住宿问题展开实验立法,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在“偏离”现有酒店法规和房屋租赁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性监管,颁发一定期限的试验许可证,或以登记、备案代替办理执照,观察其效果并核实“实验规则”是否解决

了潜在的问题,在回应实验期间收集的获益及风险证据的同时,决定是否维持或起草新规则。无论实验的结果是否对共享平台有利,愿意采用“实验规则”都表明了城市“尝试和观察”的开放态度。

第二,实验性立法在时间和适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实验规则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实施,或在一个样本组中进行。例如,在实验性监管中,设置A组(对照组)、B组(样本组),A组必须遵守之前已存在的规则,而B组则受新规定的约束,通过将两组规则实施的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估法规的有效性。例如,根据共享模式的利用程度,区分专业化和非专业化供给者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或根据平台规模的不同,豁免一组小型共享经济平台适用正在试验的规则。实验监管适用范围有限也意味着在小规模的基础上测试新法规的效果,从而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学习与评估是实施实验性监管的必要步骤。在实验期间,监管机构能收集更多关于这些实验规则有效性的信息,从观察到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中学习。而且,实验监管的正面、负面效果也应受到评估,核实此类监管是否解决了潜在的问题,并决定根据收集的信息更新现有的规则,这种实验性的方法将监管转变为一种迭代的学习路径。在我国,各地网约车新规实施一段时间后,一些城市诸

如临沂、南通等地对本市出台的网约车细则展开公共政策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细则进行优化改进。定期审查评估有助于提高实验性法规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三)构建多方协商共治机制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度目标。智慧治理蕴含智慧城市治理活动中的多主体包容性,智慧治理在主张利用智能技术工具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同时,也广泛吸纳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治理。面对共享经济创新,城市管理者设计地方监管方案时可以考虑放在更广泛的协商共治的背景下,创建一个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协作、灵活的治理架构来实现。协商共治主张公、私行为者之间的协商和合作,提供了一个较好平衡公共与私人利益的路径。在城市共享语境里,协商共治指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合作的智慧城市运行机制,通过以下方式协商共治并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基于数字技术实现更优的多方协同。

第一,协商规则制定。协商规则制定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美国,用来表示受监管影响的利益主体通过协商来促进共识方案达成的程序机制。在共享服务规则制定过程中,城市可设立协商委员会,邀请利益相关方就拟议的监管规则进行协商,通过面对面申辩各自立场,形成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方案。例如,在美国新奥尔良,市议会和Airbnb平台达成促进该市短租合法化的协议,前提是Airbnb必须遵守数据共享、房东登记、缴纳税款的要求。目前,我国多地在共享民宿规则制定前开展了调研论证,邀请相关监管部门、共享住宿平台、民宿业主、社区居民等面对面座谈,征求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立法的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拟定民宿立法草案,协商出台的地方民宿法规能够符合各方的共识,是“最大公约数的产物”。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各大城市也可尝试利用在线参与平台、虚拟公共会议和公民众包等工具,邀请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积极参加城市共享规则制定和公共治理。由此可见,城市政府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就共享实践的拟议规则进行谈判、对话,合意形成相关规则,增进了实施可能性、透明度和合规潜力,实际的解决方案对每一方都是双赢。

第二,营造城市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是智慧城

市的核心资源,城市更聪明更智慧的前提是城市数据流的畅通无阻。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结合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城市数据融合”。为实现不同数据源之间的互联互通,城市可以探索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为公共和私营组织之间的数据共享创建一个市场。在比较法层面,“个人数据的公共信托”“数据合作社”等模式已经对此展开有益探索。例如哥本哈根的城市数据交易所、巴塞罗那和阿姆斯特丹分布式数据生态系统(DECODER)等。城市数据市场激励多方数据持有者收集和共享数据,这些数据会以匿名的形式保存在城市开放数据系统中,各方都有权从数据市场获取和使用数据,平等共享资源。城市与平台之间数据共享有助于形成一个更有针对性和循证基础的监管回应。例如,平台企业可以使用大量用户的城市出行数据,开发以数据为导向的解决方案,解决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通过开放获取数据,地方政府也可采取更多数据驱动的政策制定,以响应性更强的监管制度管理共享经济活动。

第三,构建公私伙伴关系。公主体和私主体之间的合作意味着某些公共任务的有限授权,私营组织能够解决城市政府技术和资源匮乏问题,给公共治理带来革新的潜力。数字共享平台能够在各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共享信息并协调行动、资源和需求。目前Airbnb已经通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方式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Airbnb与阿姆斯特丹、米兰、阿布扎比等城市签订收税协议,代替地方政府缴纳税款。在我国,2021年成都市锦江区政府与小猪短租合作,推出全国首例将城市老旧小区整体改造为共享民宿新业态的城市更新项目。共享平台也正在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建立应急伙伴关系,为灾难和危机管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新冠疫情暴发后,挪威政府支持使用共享应用程序Nabohjelp(邻居互助)作为沟通和帮助被隔离者的一种手段,缓解新冠疫情隔离封锁政策产生的困境。共享数字平台有能力在地方层面动员大量的私主体执行不同任务,政府要积极与平台企业合作,以便在未来的危机中充分动员共享经济。

数字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创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目标,共享经济通过有效利用、配置社会资源来响应这些目标。智慧城市在

共享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共享经济正面效应的主要受益者,也最容易受其负面外部性影响,进而给城市监管带来挑战。在此背景下,智慧城市不应错失共享经济提供的机遇,而应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监管实验或协商共治规范共享经济,实现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这样一来,城市才能更好、更智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新经济也才会在智慧城市中结出硕果。

参考文献

- [1]贾振博,袁正.发展共享经济 助力共同富裕[J].宏观经济管理,2023(11).
- [2]冯祥晖,云周,杨文.新型智慧城市与数字经济融合方式的研究[J].通信与信息技术,2023(1).
- [3]张鹤鸣,王鹏.智慧共享城市:共享经济导向的智慧城市空间响应[J].城市建筑,2018(5).
- [4]傅荣校.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与推进路径[J].求索,2019(5).
- [5]孟凡坤,吴湘玲.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2).
- [6]高秦伟.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J].法学家,2017(4).
- [7][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M].毕洪海,陈标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8]傅荣校.智慧城市应成为智慧治理的场域支撑[J].国家治理,2020(7).
- [9]田建川.政策不明确,执行有偏差,监管存盲点 共享电单车,该放还是该禁?[J].半月谈,2023(13).
- [10]邹伟,郑春勇.发达国家的“分享型城市”建设实践、争议与启示[J].电子政务,2018(9).
- [11]胡业飞,张怡梦.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慧治理:赋能机制与达成路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 [12]张燎,李文钊.智慧城市治理的美国镜鉴[J].人民论坛,2023(2).
- [13]PAULA GORI, PIER LUIGI PARCU, MARIA STASI. Smart cities and sharing economy [J].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RSCAS 2015/96.
- [14]NESTOR M DAVIDSON, JOHN INFRANCA. The sharing economy as an urban phenomenon [J].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2016,34(2).
- [15]NESTOR M DAVIDSON, JOHN INFRANCA. The plac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M]// In Nestor Davidson, Michèle Finck & John Infranca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6]FINCK M, RANCHORDÁS S. Sharing and the City [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16(49):1299.
- [17]RANCHORDAS S. Innovation experimen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J]. Lewis & Clark L. Review, 2015(19):871.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Smart Cities

Ma Li Tian Shihua

Abstract: The smart city and sharing economy are the focus of current academic and policy discussions, as well as the main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ies and sharing economy have strong relevance. The shared concept, digital technology, data-driven, and localization constitute matching common elements between th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cities and sharing economy is a two-way interaction. Sharing economy not only relies on unique urban conditions, but also brings transformative impact to the cit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lso challenges urban governance, causing issues such as intensifying local negative externalities, disrupting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regulatory frictions, and regulatory conflicts. To promote the regul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smart cities, local governments are recommended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explore experi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m a consultativ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to achieve smart governance in smart cities.

Key Words: Smart City; Sharing Economy; Experimental Regul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开放与合作】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 路径选择

聂新伟 卢伟

摘要:随着全球数字化变革加速,跨境流动“数据”成为数字贸易发展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载体。然而,数据安全与数字贸易壁垒相互强化,影响了全球数字贸易开放进程。从制度型开放视角对数字贸易开放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数字贸易开放的内涵范畴应包括:数字技术溢出、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放开和数字空间治理。基于此,结合中国数据安全评估制度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港)等开放平台的试验探索,对数字贸易开放安全评估路径、数据“全周期”安全管理机制,以及试点对接隐私和安全类高标准规则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进行了梳理归纳,同时也指出了正在面临的企业合规成本增加等问题挑战。建议统筹开放与安全,以高质量实施自贸区(港)提升战略为契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加强数字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办法和数据出境合规渠道,逐步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协调互促格局。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化;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评估

中图分类号:F744,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5-0137-13 **收稿日期:**2024-01-10

作者简介:聂新伟,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开放室(北京 100038)。

卢伟,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开放室(北京 100038)。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习近平,2021)。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由数据流作为连接纽带,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已超越以往的实体贸易(Lund, et al., 2018)。数据的生产和使用正引领着经济和贸易的数字化(Meltzer, 2019),全球化步入了以“数据要素”为主要动力的新时代(Chakravorti, et al., 2019)。数字技术不仅创造了新市场、新贸易方式和新产品,还降低了贸易成本并改变了贸易模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将面临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数字贸易收益的机

遇。数字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的时空限制,对全球贸易的模式、结构、规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据WTO预测,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促进全球贸易量每年增长1.8—2%,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在数字技术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数字贸易相伴而生的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竞争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引起人们对隐私损失、消费者保护和安全威胁的关注,各国加强了国内监管框架的制定。由于各国政府的监管方法不同,适用的监管领域各异,在推动各国对数据安全、数字鸿沟、个人隐私、市场集中(如平台企业的寡头垄断)、道德伦理等方面关切愈发热烈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家间经济贸易政策不同

引起的紧张局面(Aaronson, 2016)。不少经济体正在追求分化性的贸易政策(WTO, 2018),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关系中越来越有争议的领域,“数字保护主义”或“数字贸易壁垒”呈上升趋势(Aaronson, 20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作为贸易强国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深化更宽更广领域合作的重要战略抉择(王文涛, 2022)。当前,数字贸易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亮点、经济发展新引擎。商务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2》显示,2022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为3727.1亿美元,同比增长3.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在贸易规模上,中国已是数字贸易大国,但在开放水平和制度准备上,中国同其他数字贸易大国仍存在差距(刘斌等, 2022),突出表现为中国在数据流动和数字贸易上存在较高的壁垒。立足上海推进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实践,陈晶莹(2022)认为,中国试点地区数字贸易开放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标DEPA的规则要求不够;二是数字贸易市场服务水平不高;三是中小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缺乏对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四是尚未建立合理适配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和市场监管机制;五是尚未就数字贸易特征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和争端解决机制。2018年,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对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评价中,中国的数据限制指数最高,其中最主要的数字贸易壁垒是对数据使用与跨境流动的限制。数字贸易发展的共同趋势是开放,开放的焦点是数据跨境流动,但中国在开放深度上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数据跨境传输与管理上(刘斌等, 2022)。一方面,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各国愈发高度重视发展数字贸易、提速数字贸易对外开放水平的趋向下,中国既没有加入高水平的“数字贸易俱乐部”,也没有形成一套清晰统一、反映本国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使得在当前激烈的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愈发不占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壁垒引发的“贸易成本”正在抵消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随着中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电子商务承诺开放逐步兑现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性多边经贸规则谈判进程加快,积极推进数字贸易规则对接和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衔接愈发迫切与重要。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放宽电信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重点在对数字经济全球化特征事实观察的基础上,对数字贸易开放带来安全与发展困境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阐释,并以此对中国数字贸易开放实践探索中的成效进展、问题挑战及应对建议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为中国下一步应对WTO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和对接DEPA、CPTPP等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和路径选择。

二、数字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特征事实

以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崛起,正推动全球生产贸易方式数字化变革,极大拓展可贸易商品或服务范围领域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支撑数字贸易的基本单元,数据跨境流动成为贸易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量。

(一)数字技术迭代创新:数字化革命、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要素

得益于计算、通信和信息处理领域三股强大技术力量的融合发展,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崛起,驱动经济社会加快数字化变革(史丹等, 2023)。在摩尔定律带来集成电路算力增长、计算机成本下降和普及率提升的同时,通信技术革命性突破也在提高网络的质量、速度、传输能力和价格可承受度,因而使数字化供应更容易、供求主体跨境连接更为便捷(Roy, 2017),技术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在线购买,并以数字方式跨境提供,电信服务、互联网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支柱。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进步使数字基础设施日益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集成电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通用技术成为利用通信基础设施、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技术(江鸿等, 2022)。尤其是5G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数据流入“云”,推动数据中心向云基础设施扩展,云计算使更广泛地使

用或提供需要传输大量数据的服务成为可能,“大数据”顺势崛起。由于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数据的存储、计算和传输成本,并使收集、存储和转换以模拟形式存储的多种形式信息变为可处理的数字信息,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数字化,其中产业(产品)数字化成为技术革命的中心。在数字技术改变原有制造和服务的同时,隐藏在其中的数据则是必要资本存量,获取数据已成为参与知识型经济和数据驱动型经济下的新工业时代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二)数字贸易模式重塑:比较优势、数据跨境流动与数字经济治理

相比于传统的概念,贸易流量是由各国在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相对生产率、地理、基础设施或制度因素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贸易,数据已经成为贸易扩张的关键驱动因素,能够创造数字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领域都可以视作数字智能的一种应用方式)的数据流已经开始成为数字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UNCTAD,2019)。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是孪生兄弟,体现为数据流动是数字贸易的载体(数字产品与服务电子传输)、支持数字贸易的交易(如数字支付、数字认证),同时促进与便利数字贸易(盛斌等,2021)。然而,尽管技术进步是增加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但它并不能保证经济和贸易增长,政策和政治背景同样重要(WTO,2018)。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安全、隐私、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规则和标准来协调。在世界经济高速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治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主要经济体也在积极推动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梁国勇,2023)。

(三)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数字鸿沟、技术垄断与数字安全

数字技术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引发了市场集中、隐私丧失和安全威胁、数字鸿沟等问题挑战。数字技术不对等和不均衡发展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正在形成全新的数字不平等,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庞金友,2022)。一定程度上,数字技术带来的贸易替代效应,将会愈发体现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禀赋驱动贸易模式的惩罚(WTO,2017)。从全球数据价值链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是原始数据的提供者,这导致数据收益分配有失公平,也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

字贸易格局中的依附性(UNCTAD,2019)。虽然缩小技术鸿沟有助于改变各国比较优势并带来参与全球贸易的机会,但具有核心技术或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资源国家越发倾向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对或限制例外情况。基于政策规制使数字技术中的知识外部性局限于边界内,高收入经济体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先发优势将会延续,并为其在数字密集型部门提供持久的竞争优势(Costinot, et al.,2012)。与此同时,由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和信息技术发展相伴相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从单一主体演变为多元主体、从物理形式演变为数据全生命周期(王伟玲,2022),产生的风险也从个人隐私保护、商业利益诉求向国家数据主权升级跃迁。

三、数字贸易开放:概念范畴与“两难”选择

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正在推动过往“线上订购+线下交付”向“线上订购+数字交付”转变,流动“数据”成为贸易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然而,数据流动带来的隐私泄露、安全风险等伴生效应,也引发了数据跨境流动制度规制选择的不同偏向。

(一)数字贸易开放的概念范畴

事关数字主权安全,数字贸易开放的层次、范围和领域应坚持渐进式稳慎式的原则。鉴于当前区域与双边自贸协定关于数字贸易开放的内容与要求,结合各国数字技术发展差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不同选择偏向,数字贸易开放的概念范畴应包括四个层面。

首先,数字技术“跨境”溢出。通信技术是数字贸易模式重塑的底座,数字技术积累和人才禀赋的差异造成数字先进经济体与数字落后经济体之间明显的数字鸿沟,这有碍于数字落后经济体数字化变革潜能的发挥。与此同时,基于数字技术产业的战略性竞争特征,技术先发优势国家对技术后发国家的遏制打压或者防止技术过快的向后发国家溢出,成为构筑新的贸易规则壁垒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次,市场准入水平的提升。从各国外商投资准入禁限类目录看,目前涉及数字贸易开放的禁止类或限制类领域主要为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中国《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将增值电信业务细分为10项。从2022年9月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看,外商企业希望中国继续开放《电信业务

分类目录》，允许获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尤其是互联网接入服务、在线数据处理和交易处理服务等。

再次，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从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争议的焦点看，是否允许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数字空间治理规制的最大分歧所在，也是各国构筑数字贸易壁垒的重要考量因素，更是数字贸易开放的难点与重点所在。从各国争议的核心内容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数据跨境流动对数字贸易发展产生的影响；二是数据跨境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三是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更强调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欧盟更关注个人隐私保护。

最后，加强数字空间治理能力。一般而言，数字风险防控与应对能力涉及国家数字规制体系建设（职能部门、工作机制、政策与制度体系等），是边境后规则的重要体现。从各国实践探索的趋势看，由于数字风险隐患具有伴生性，这就决定了数字贸易开放必须统筹数字主权安全，即“放得开”的前提是“管得住”，更好地“管得住”才能更大程度地“放得开”。

（二）开放与安全的“两难”选择：数字贸易收益最大化还是数字贸易风险最小化

数字技术迭代创新在带来数字鸿沟（技术代差），造成“数字先进”经济体和“数字落后”经济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同时（WTO, 2018），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不同劳动力的数字化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数字化获益与数字化转型风险的巨大差异（黄鹏, 2020）。从经济增长理论看，技术进步能够提升数据要素价值进而驱动经济增长，而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具有可复制、非消耗、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等新特性，因此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和打破自然资源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制约的数据要素，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已经从资本、土地和劳动扩展到技术、知识和信息，其中信息作为一种可以无限利用的生产要素，能够产生递增效益，拓展增长源泉，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Romer, 1986）。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技术带来的孪生难题，数据资源挖掘、利用以及支撑数字贸易快速增长的海量数据产生与跨界频繁传输等，将使数字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指数级上升（王伟玲, 2022）。在此情况下，拥有特定技术的一个数字经济体，既有在收益递增效应下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的动力，也有担忧数据跨境流动带来

风险大幅提升的担忧。对于理性的个体，最大化收益的同时最小化风险或者最小化风险的同时最大化收益是其最优策略选择，但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无限大，风险亦无限大”两种递增效应决定了“要么赢得一切，要么失去一切”，这既考验着各个数字经济体如何平衡贸易收益与数字风险的理性，也影响着各经济体如何平衡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与合作的策略选择。

（三）数字贸易规则选择偏向：安全风险与数字规则壁垒的相互强化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数字空间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外部环境（郎平, 2018）。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在改变比较优势扩大贸易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鸿沟，造成“数字先进”经济体和“数字落后”经济体不同的贸易创造、收缩以及分配效应（WTO, 2018），为获取贸易收益最大化，作为“理性人”国家则不可避免地会偏向技术垄断的政策规制，构成对技术溢出的阻碍效应。另一方面，在底层技术支撑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增长和数字贸易扩张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同时，数据跨境流动伴生的隐私损失、知识产权侵害和国家安全威胁，使得“数字落后”经济体采取一些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或不符措施），如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是必要的，然而这一定程度上被技术优势明显且希望加大数据跨境流动的“数字先进”经济体视为扭曲贸易的新制度壁垒。一定程度上，数字贸易规则分歧反映了数字产业竞争力之争，具备数字产业优势的国家，试图通过开放以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不具备产业优势的国家，试图通过设定条件与限制，给予本地数字产业成长的空间（陈颖等, 2022）。总而言之，技术进步带来比较优势改变和贸易收益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安全风险，而为避免风险扩大危机国家安全就需要加强数字安全治理，随之会有各种平衡收益与风险（规范约束跨境数据类别、流向与流量）的异质化制度需求偏好，多样化的制度规则及其形成的制度差异会因制度壁垒的增加而提升交易成本（贸易壁垒），进而制约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增长。

四、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实践探索与问题挑战

数字贸易发展的共同趋势是开放，开放争议的

焦点是数据跨境流动。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重要方法论指引下,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法律合规体系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和渠道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数字贸易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也在不断增加,进一步扩大开放显得更加系统和复杂。

(一)中国数字贸易开放路径选择的实践探索

中国数字贸易开放以法律合规体系为基础,探索国内重点领域和方向,在跨境流动合规治理建设、对接DEPA等高标准规则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1.以合规安全与业务发展并重推动数字贸易开放政策与制度“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已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为“自贸区(港)”)等开放平台中对电信业务开放采取负面清单模式,主要限制要求包括增值电信经营业务范围、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基础电信业务的控股权等。由于数据流动涉及个人隐私泄露、国家主权安全等,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均坚持立法先行。为促进数据出境流动、保护数据跨境安全,中国制定并颁布了数据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标准等。法律层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当将在中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存储在境内,对数据处理者出境传输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后方可出境。从数据安全规制的视

角看,三部上位法构成了中国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为各地方开放平台试点探索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提供了原则要求与根本遵循。

为进一步明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具体标准、流程等制度规范。在三部上位法指引下,中国又发布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一版)》(2022年9月正式实施),进一步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明确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监管主体、评估对象和实施流程等内容。其中,《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定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前,应当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以及识别当评估结果发生重大变化和如何进行重新申报评估(见图1)。此外,配套的相关标准规范还包括《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征求意见稿)》《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出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重点关注数据处理活动对个人权益造成的影响。随着数据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数据跨境安全建设也正在逐步由合规驱动转变为业务安全与发展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目前看,中国数据出境的企业主要涉及零售、汽车、电商、金融、物流等重要领域。从2022年9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实施以来,企业对数据出境合规性、流程性“工作模式”的理解明显加强。正如李强总理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要努力打破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改革,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李强,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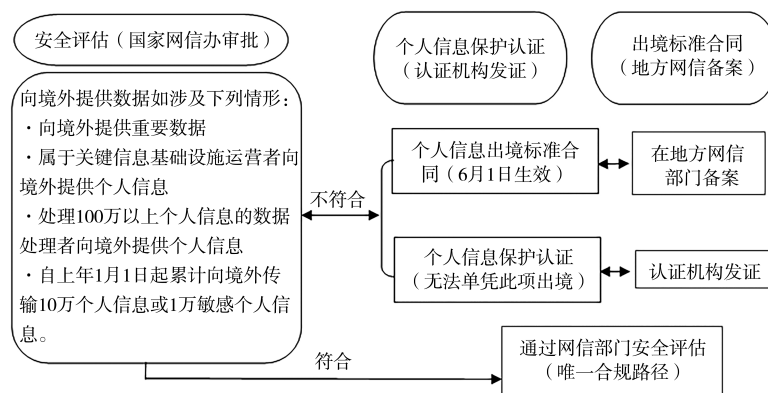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路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2.以自贸区(港)等新时代“试验田”探索数字贸易开放重点领域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自贸区(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

项重要战略举措,是要打造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聂新伟,2022)。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跨境流动自由便利的要求与人员、资金等要素具有共通性,因此包括自贸区(港)在内的开

放平台均把数据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数据流动依法合规“前置要件”的解决,以及中国申请加入CPTPP等自主扩大开放战略的推进,数字贸易开放的范围力度呈现加大趋势。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最高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政策文件关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设计,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开放平台“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制度安排提供了“样板”,主要表现为电信业务的市场准入、数据跨境设施互联互通(涉及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建设国际海底光缆及登陆点,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以及试点允许特定领域数据的跨境流动等。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支持珠海、澳门相

关高校、科研机构在确保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安全前提下,实现科学研究数据跨境互联互通。为了探索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的科创数据互联互通(重点是解决“双向”合规问题),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对接,澳门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依托澳门特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中国澳门《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和中国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间的最大公约数为内嵌规则(即就高匹配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跨境流动“双向”均合规),率先在科研领域构建了集“数据跨境规则+数据跨境管理+数据跨境技术保障”三位一体的、全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促进数据共享的“粤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通道”(见图2)。

随着数据跨境安全合规机制建设逐步向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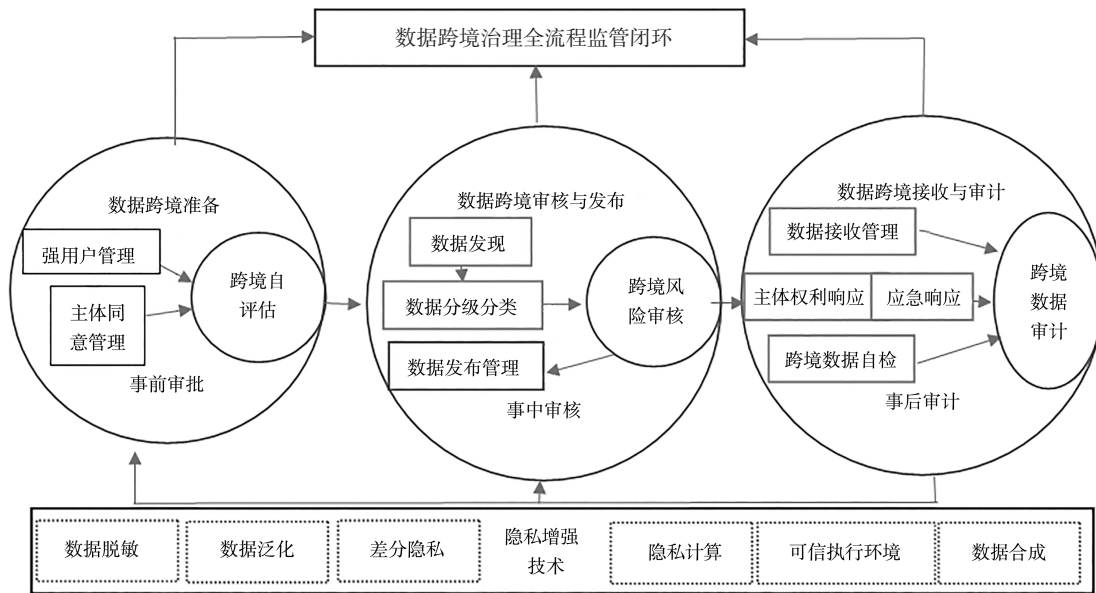


图2 “事前、事中、事后”全覆盖的数据“全周期”安全管理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绘制。

发展驱动转变,中国在数字贸易开放路径上开始选择有条件的自贸区(港)开展更大压力测试,表现为在对接全球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上进行先行先试。2023年是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以高质量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契机,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自贸区(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推进上海自贸区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国务院印发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支持上海自贸区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聚焦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创新。其中,数据跨境流动明确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支持上海自贸区率先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和实施数据安全认证制度;数字技术方面,作为极具历史性突破的试点开放内容,明确除支持电子票据应用外(顺应了在线采购和数字交付的数字贸

易趋势),还提出了支持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创新,具体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应用和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应用。数字贸易领域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无疑将为大力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数字产业、数字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3.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形成数字贸易开放进阶路径与模式选择

随着全球数字化变革纵深推进,数字贸易规则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内容,围绕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核心议题的话语权成为各国竞争博弈的焦点。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但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尚未建立专门规则,这就造成了多边规则“供给赤字”和区域与双边规则安排(或“模式”)的日渐兴起,尤其表现为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JDTA)、DEPA等逐渐成为各国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参考的“高标准”样板,但囿于各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关于数据信息安全审查标准不一,造成区域与双边自贸协定在数据跨境流动与管理、数字产品与服务非歧视性待遇和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放深度的差异化(见表1)。辩证地看,开放深度的差异虽加大了对接高标准规则的难度与挑战,但也为更“多元化”选择合适的对接路径提供了可能。鉴于协定中例外情形(或不符措施,一般因公共政策目标而实施)相对有限和规则安排整体更具“硬性”要求,使得USMCA成为区域与双边数字贸易规则中开放自由度最高的自贸协定。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方面,DEPA和CPTPP的承诺水平在上述协定中处于中游,USMCA的自由化承诺水平更高,而RCEP更加侧重于保留缔约方的监管权限(陈寰琦等,2022)。CPTPP内容涵盖数字品贸易零关税和非歧视待遇,要求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取消本地化存储限制,严格要求源代码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消除在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无纸贸易、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方面的障碍。RCEP在数字贸易领域开放门槛明显偏低,对于数据跨境流动更强调数字安全主权问题,即为“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或“出于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而采取限制或禁止开放的不符措施,实际上也降低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开放要求。DEPA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监管自主权水平上,在当前双多边

协定中处于中游的位置,DEPA的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水平较高,而给缔约方保留的管制权限较少。由于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主要纳入的是电子签名、电子认证、无纸化贸易、在线消费者保护等基础性电子商务规则(中国既是货物贸易大国,也是全球电子商务生态链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以跨境电商发展推动货物贸易优势巩固提升符合当前发展的阶段性实际),远远无法反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从“电子商务”规则向“数字贸易”规则延伸的趋势性变化。从表1可知,与USMCA、UJDTA、CPTPP、DEPA等协定相比,中国在数据的跨境传输与管理等数字贸易规则核心议题的开放深度仍有较大差距,首先从开放程度较低的规则(或者开放基础条件更为成熟的领域,比如电子商务)对接成为最具现实的路径选择。目前,相对于CPTPP和USMCA等协定而言,中国在RCEP的承诺水平和DEPA比较接近,虽然短期对接DEPA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存在难度,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并且DEPA遵循“模块化”的弹性原则,给出了拟加入协定的经济体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加入的“机会窗口”。因此,申请加入DEPA给予中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机遇,推动中国加快完善数字贸易规则的同时,也提高在区域与双边数字贸易规则议题谈判中的影响力。整体来看,从作为RCEP成员国承诺接受“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储存”治理规则,到申请加入DEPA、CPTPP,中国对标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进阶”(由低到高)路径更为清晰。除数据跨境流动外,《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转让或获取企业、个人所拥有的相关软件源代码作为条件要求”和“禁止对线上商业活动消费者造成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诈骗和商业欺诈行为”的禁止性规定,表明中国在数字知识产权、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与CPTPP规则的对接。但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数字贸易规则选择存在明显的偏向性差异,且分化形成了“美国规则”“欧盟规则”等,这就决定中国对于USMCA、UJDTA等相对“更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不会“照单全收”,而是在有选择对接的过程中,通过提升自身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能力和议题谈判话语权,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向公正合理、包容安全的方向重构。2020年,中国在多边场

合首次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明确要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2023年2月，中国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再次声明，《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是希望达成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

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史丹等,2023),显然这与美西方主导的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数字治理规则有本质的区别,也就表明了有别于美欧规则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灵活性的“中间”规则成为中国主导推动的重要模式。

表1 中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分类参照情景

核心议题	协议条款主要内容	USMCA	UJDTA	CPTPP	DEPA	RCEP	中国
数据的跨境传输与管理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极少数例外	极少数例外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软约束	软约束(例外情形)	安全为前提
	计算设施非强制本地化	例外内容未纳入	极少数例外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软约束	软约束(例外情形)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安全评估
	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		合理管理	合理管理	合理管理	未涉及	未涉及
数字产品与服务	国际:数字传输(数字产品)免关税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软约束	未涉及
	国内:开征数字服务税		基于非歧视原则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给予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	硬约束(将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扩大至广播等敏感部门)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软约束	未涉及	未涉及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	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算法披露)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未涉及	承诺进一步开展对话	均未涉及
	加密技术的保护条款(针对使用密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软约束	未涉及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互联网中介责任认定)	第一个纳入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硬约束(含少数例外条款)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整理所得。

(二)中国数字贸易开放推进中面临的挑战

虽然数据跨境流动在合规治理建设、对接DEPA等高标准规则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但整体而言,对标主要发达经济体做法(国际规则和标准),和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数字贸易开放发展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1.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规则精准性不够,企业合规成本偏高和成功率偏低的矛盾

一是“重要数据”概念范畴难以精准识别。按《数据安全法》规定,中国“重要数据”出境需进行安全评估,但由于各行业领域数据风险敏感程度不一且重要数据的定义范围、安全评估流程标准等均不明确,导致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难以落地。2023年,环球律师事务所等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调研数据显示,有近40%的涉及数据跨境的企业“对于划分

重要数据感到困难”,33%的企业“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申报数据跨境安全评估”,这些因素都对企业选择哪种数据出境的安全保障机制有重要影响。

二是安全评估优先增加企业合规成本。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采取的国家充分性认证(白名单制度)、企业认证和标准合同等多渠道数据出境合规相比,虽然中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了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和企业标准合同三种合规渠道,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四条指出,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等四种情形下的数据处理者,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因此,在“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处理”的思路指引下,实践中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申报出境安全评估,不适用时才能考虑选择出境标准合同渠道,这就造成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和企业标准合同的应用空间较小且发展滞后。与此

同时,由于安全评估属于事前许可,合规资源消耗较大,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无须申报企业成本负担加重。根据财新周刊调查,从2022年9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实施以来的初步效果看,大部分企业对数据出境的理解还处于合规性、流程性的“工作模式”的阶段,迫于合规要求及业务发展需要根据现有条件向当地网信部门申请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结果显示,大约有一半的企业不满足申报条件。以海南自贸港为例,自2022年9月1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颁布以来,海南网信办开通申报通道,制定发布《海南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引(第一版)》、设立申报咨询电话、发布申报工作系列问答,明确申报流程、内容、方式和要求,积极主动指导企业开展申报,但截至2023年底,首家企业才通过国家网信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2. 数字贸易开放与安全统筹,加大了“管得住”与“放得开”的协调难度

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是在“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方法论的指导下推进的(聂新伟等,2022),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协调互促共同推进对外开放的工作机制。在“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重要方法论指引下,由于数字贸易开放涉及数字主权安全风险,使得统筹开放和安全愈发重要的同时,形成了中央(主管部门)与地方(自贸试验区等)要统筹处理好“放得开”与“管得住”的关系,地方被赋予更大压力测试的过程,也是“管得住”与“放得开”良性互促的过程。目前中国《网络安全法》等上位法均明确限定了数据跨境流动必须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内开展。然而,从实践中来看,上位法的确立在增强中央部门规制数字跨境流动权限的同时,其愈发刚性的要求也为地方结合各自实际灵活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空间增加了难度。具体而言,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范畴不同、对统筹开放与安全认知不一,往往造成“管得住”与“放得开”不同的策略安排(如,更大开放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央地”之间围绕开放力度大小和节奏快慢的认识不统一,进而影响开放节奏、次序与路径选择,“探索形成既能便利数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机制”往往令开放试点平台进退维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对数据信息实行行业分类监管,并形成了“行业监管+网信部门兜底”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加之数字贸易开放涉及概念范畴、部门职能较

多,很容易造成多头(或过度)监管和监管不到位并存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对全量出入境数据施行个案事前审批,过度监管导致大部分非敏感数据跨境流动受阻,不利于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另一方面,滴滴公司事件暴露出数据安全监管仍存在部分空白,需进一步落实落细部门职责、规范流程手续,消除制度漏洞。

3. 服务业开放度与数字经济渗透率偏低叠加数据安全约束趋紧,造成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水平依然较高

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主体形态。一方面,数字技术变革推动非贸易服务向可贸易服务转变,服务业数字化变革程度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反之亦然。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包括5G、大数据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高商品或服务数字化变革水平,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形态依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依然较低(2022年仅为44.7%),造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竞争力较弱,核心数字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与中国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在全球双双位列第二的领先地位严重不匹配。2021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为3502.3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2.6%,远低于同期全球53.8%和美国74%的水平,且贸易规模仅为同期美国的36.4%。另一方面,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与开放程度决定着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服务贸易限制提高会直接提升数字贸易限制水平。整体来看,中国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开放度偏低,尤其表现为电信、金融、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业部门。例如,根据OECD发布的2022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开放度在50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42位和第44位。与此同时,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方面,中国总体限制水平呈现出提高趋势(说明数字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走低),明显高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新加坡、泰国、越南等新兴国家(见图3)。从线上交易、基础设施与联通、知识产权、支付系统和其他壁垒等五大政策领域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看,基础设施与联通、其他壁垒的限制指数呈现出走高趋势。2022年,基础设施与联通限制指数为0.1587,较2017年高出0.04。由于基础设施与联通方面的限制主要权衡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安全保护(刘佳美,2022),该指数走高,意味着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禁限

类措施在增强。近年来,中国一直秉持“数据安全”的态度,对数据跨境流动采取谨慎态度,不断强化对相关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大幅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形成合规困境,影响了国际合作渠道和业务拓展(李俊等,2023)。从实践中来看,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走高也反映在数字贸易“自由便利”政策安排仍处于空白。由于数字贸易涉及到更广泛的贸易投资政策,如“数字技术出口管制”、“外资安全审查”和“数字税”等,一般采取先从便利化入手然后适时自由化的开放策略。虽然中国提出要发

展数字贸易,但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便利化政策推进相比,数字贸易自由便利政策仍处于缺位状态。以海南自贸港为例,《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虽然明确了以“贸易投资自由便利”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其中对货物贸易“零关税”为基本特征、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但对于“数字贸易”并没有给予制度与政策安排。目前来看,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电子商务进口的货物依然征收“跨境电商综合税”,未来数字交付的商品与服务又该执行什么样的贸易自由便利举措仍处于未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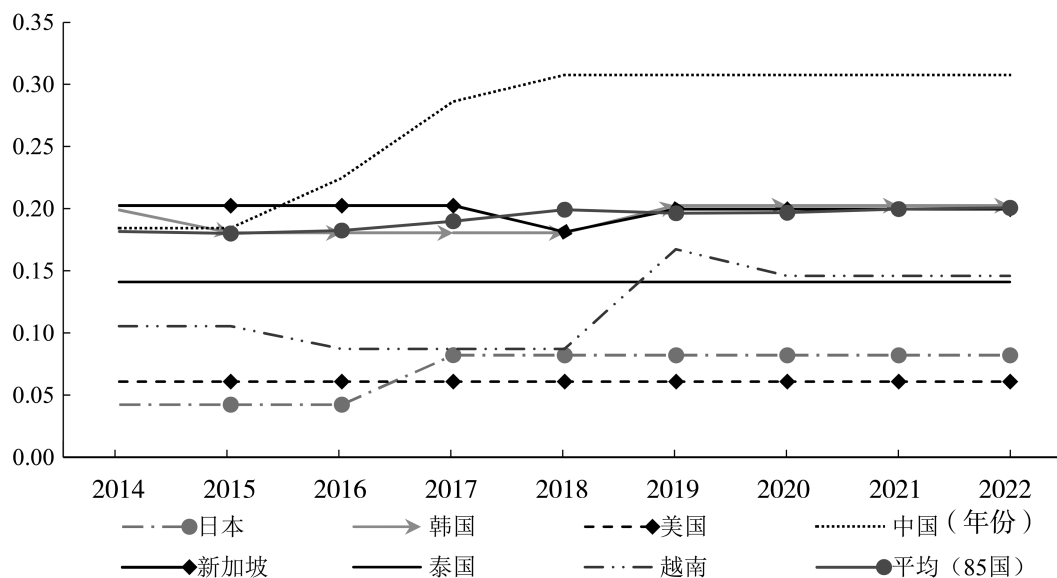


图3 2014—2022年中国与主要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深度比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4.全球数字鸿沟与数字壁垒相互强化,数字贸易开放面临“规锁”“脱钩”

数字化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着全球经贸格局。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扩散的非均衡性和数字风险的极具破坏性,造成国家间发展与安全不同偏向、技术垄断与外溢的不同选择,以及规则需求的不同偏好,数字鸿沟与数字壁垒不断相互强化,大大增加了数字贸易开放的制度成本和国家间双向开放的协调难度。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多边主导的电子商务规则逐步向覆盖议题更多、内涵范畴更复杂的数字贸易规则转型,高标准规则议题的谈判往往更难达成一致共识,集体行动困境往往迫使“俱乐部”型的小圈子规则体系形成,规则间的排他性与竞争性加剧。当前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极具优势潜力的国家,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数字技术封锁打压和数字贸易规则“规锁”的双重挑战。具体而言,美国、欧盟分别以跨境隐私规则

(CBPR)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基准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数据跨境流动“同盟”区域。其中,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保持数字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为由,积极构筑遏制打压中国数字技术领军企业制度高墙的同时,也在加快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等“同盟”规则体系构建,形成在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封锁,进而逐步削弱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欧盟在加快区域单一数字经济市场建设的同时,也在以“去风险”的形式谋划针对中国的更高制度壁垒。由于欧美的遏制围堵,造成中国仍未加入欧美任何国家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中,一定程度上已被置于数字贸易主要发达市场之外。此外,俄罗斯、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也正在积极通过设有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认证机制和实体存在等本地化措施要求,不断加强对数据出入境的管制力度,中国拓展数字跨境流动的“朋友圈”越发困难。在外部开放环境愈发

不利的形势下,由于中国尚未加入DEPA、CPTPP等重要的区域性数字贸易规则协定,缺乏在“共同框架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加之衔接区域和双边高标准经贸协定的“中国版”数字贸易规则方案并不明晰,以及本身对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核要求趋严,造成企业实体等微观主体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上面临严重的市场边缘化问题,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业务面临着“一国一策”极大合规成本。例如,美国《云法案》和欧盟GDPR通过扩展数据控制者标准,对中国相关企业进行“长臂管辖”,极大约束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其中TikTok(抖音海外版)不断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而遭受封禁。

五、推进中国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的路径选择建议

充分认识和把握全球数字化变革逻辑,适应和引领数字经济全球化潮流,按照《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原则理念,以提升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在内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为导向,坚持发展与安全统筹协调,坚持“管得住”与“放得开”互促互进,聚焦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加强数据主权原则对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衔接的全过程引领,以实施自贸区(港)等新时代试验田提升战略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同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对接,着力加强数字底层技术迭代创新,持续提升数字空间现代化治理能力,探索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办法和数据出境合规渠道,加快电信等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推动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等基础设施联通,逐步实现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协调互促格局,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赋能添力。

(一)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趋势,加快建设与数字贸易开放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国际数据专用通道建设,提高国际通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吸引带动跨国公司的数据中心、运营中心和结算中心落户。加快明确重要数据概念范畴和制定不同行业重要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指引,探索实施数据安全分级分类标准,推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为主向渠道更多元方式转变,切实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推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更多更广有序开放。以发展数字贸易为导向,进一步明确其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不同的产业特征、贸易属性和政策需求,加快完善数字贸易政策体系。适时推动电信等网络型产业竞争性环节放开和无歧视接入,推进增值电信业务更大程度开放,加强平台企业反垄断与包容性监管相统筹,提升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全球竞争力。适时加快数字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电子传输免关税、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的国际互认,并将数字贸易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全面推进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加快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打通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堵点,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性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工作机制,以包容审慎为核心进一步创新完善“行业+网信部门兜底”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围绕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覆盖的跨境数据“全周期”安全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中央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工作重点,坚持“管得住”与“放得开”相互促进,努力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工作推进格局。

(二)发挥数字贸易规则先行探索的试验田作用,着力打造数字贸易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平台

以高质量实施自贸区(港)提升战略为契机,在推动落实《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形成数字贸易更大力度开放早期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临港新片区在数据跨境流动自由便利政策方面更大力度突破,探索在守住国家安全风险底线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大开放力度的压力测试,鼓励其在增值电信业务开放、数据本地存储、非敏感数据分类跨境流动、数字知识产权、数字贸易涉税规则,以及数字经济监管规则等方面先行探索,为全国数字贸易更高水平开放提供路径和经验。加快跨境电商综合示范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建设,进一步放开数字产业市场准入,聚集优质生产要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同时,以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便利

化为突破口,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探索电子商务等数字领域的国际合作、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在数据跨境传输、数字产品安全检测与认证、数据服务市场安全有序开放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三)以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契机,加快扩展数字贸易开放“朋友圈”

积极从地缘战略层面谋划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市场“规锁”、产业“封锁”的意图与行动,坚定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一方面,以建设数字中国为导向,进一步明确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核心议题上的利益关切和立场策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与经贸议题谈判。另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广泛凝聚发展共识,重点结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数据安全、数字鸿沟、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深度关切,适时推动中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等由愿景走向行动,不断为国际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供蓝本和中国方案。深入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跨境电商海外布局向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拓展,顺应发展中国家数字化变革需求,以缩小数字鸿沟为导向,鼓励数字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外溢,推动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算力等数字技术及搜索引擎、智慧城市、社交媒体平台服务走出去,鼓励企业尊重所在国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制度,不断加强企业规范经营体系建设。以吸引“一带一路”国家共建企业聚集和信息资源合作为牵引,依托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优势,加快发展离岸数据中心、离岸数据加工基地、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等业态,带动发展离岸数据服务外包、互联网创新孵化等关联业态。依托RCEP扎实有序推进为契机,着力构建面向全球、覆盖“一带一路”国家的自贸试验区网络,积极推进加入CPTPP、DEPA谈判进程。积极利用与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的一致立场,构建基于“信任+互惠”的数字贸易伙伴关系。

(四)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

坚持底线思维,以推进数字产业基础高级化为导向,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装备的供给水平和生产能力,强化关键产品自给保障能力,全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针对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薄弱环节,着力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集聚力量、集中资源,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着力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系,试点实施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贯通工程,引导龙头优势企业牵头建立创新生态联合体,协同开展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转化等,以上游“中国造”底层技术打造,服务产业链下游应用型企业构建新的“应用大厦”。针对当前美西方不断升级数字技术竞争博弈,要坚持斗争和合作的两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对中国数字领军企业遏制打压行径,积极在国际机构、多边场合公开反对将科技经贸合作问题政治化。拓展落实“不得将转让或获取企业、个人所拥有的相关软件源代码作为条件要求”和“支持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等举措,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推进研发数据跨境流动,支持国际数字龙头企业在中国设立科创研发中心。支持建设国际开源促进机构,参与全球开源生态建设。加强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监管,强化监管技术应用和国际合作。推动数字技术成果转化,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不断提升中国数字支付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而加快形成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新高地。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EB/OL].(2021-10-19)[2023-12-12].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9/content_5643653.htm.
- [2]LUD S., TYSON L. Globalization is not in retrea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rade[J]. *Foreign Affairs*, 2018(3):130—140.
- [3]MELTZER P.. Governing digital trade[J]. *World Trade Review*, 2019(1):23—48.
- [4]CHAKRAVORTI B., FILLPOVIC C., CHATURVEDI R. S.. Ease of doing digital business 2019—which countries help expedite entry, growth, and exit of technology-based businesses [R/OL]. (2019-11-9)[2023-12-20]. <https://docslib.org/doc/13538794/ease-of-doing-digital-business-2019>.
- [5]AARONSON S. A.. The digital trade imbal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et governance[R/OL].(2016-02-03)[2022-12-13].<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

- digital-trade-imbalance-and-its-implications-internet-governance.
- [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transforming global commerce [R/OL]. (2018-11-5) [2022-10-1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tr18_e.htm.
- [7] 王文涛.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N]. 人民日报, 2022-12-20.
- [8] 刘斌, 崔楠晨.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制度型开放: 未来向度和现实进路[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2).
- [9] 陈晶莹. 推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对外开放[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3-11.
- [10] 史丹, 聂新伟, 齐飞. 数字经济全球化: 技术竞争、规则博弈与中国选择[J]. 管理世界, 2023(9).
- [11] ROY M. The contribution of services trade policies to conn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aid for trade [R/OL]. (2017-09-14) [2022-10-1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712_e.pdf.
- [12] 江鸿, 贺俊. 中美数字经济竞争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J]. 财经智库, 2022(2).
- [13] UNCTA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OL]. (2019-09-04) [2022-10-1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19_en.pdf.
- [14] 盛斌, 高疆. 数字贸易: 一个分析框架[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8).
- [15] 梁国勇.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新趋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国际经济评论, 2023(4).
- [16] 庞金友. 数字秩序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代数据治理的迷思与困境[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 [17]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technology and jobs [R/OL]. (2017-09-27) [2022-10-1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orld_trade_report17_e.pdf.
- [18] 王伟玲. 数据跨境流动系统性风险: 成因、发展与监管[J]. 国际贸易, 2022(7).
- [19] 黄鹏. 世界经济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动因、方向及可能路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20] ROMER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5): 1002—1037.
- [21] 郎平. 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机制[J]. 国际政治科学, 2018(1).
- [22] 陈颖, 高宇宁. 数字贸易开放的战略选择: 基于美欧中印的比较分析[J]. 国际贸易, 2022(5).
- [23] 李强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B/OL]. (2023-11-5) [2023-11-1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3678.htm.
- [24] 聂新伟. 制度型开放: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J]. 财经智库, 2022(2).
- [25] 环球律师事务所与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合规科技研究院. 数据跨境现状调查与分析报告 [R/OL]. (2023-03-02) [2023-12-23]. www.glo.com.cn/UploadFile/Files/2023/3/2/135336162dd926879-c.pdf.
- [26] 聂新伟, 薛钦源. 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测度评价及政策优化[J]. 区域经济评论, 2022(4).
- [27] 刘佳美.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 [28] 李俊, 赵若锦, 范羽晴.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成效、问题与完善建设[J]. 国际商务研究, 2023(6).

The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Ope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ie Xinwei Lu Wei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has become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However, data security and digital trade barriers reinforce each other,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global digital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rade openness, and hold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rade openness should include digital technology spillover, cross-border data flow, market access liberalization and digital space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hina's data security assessment system and th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open platforms such as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Ports),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s of digital trade open security assessment path, data “full cycle” secur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pilot docking of high-standard rules for privacy and security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Meanwhile, it also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compliance costs. It is suggested to balance openness and security, take the high-qual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Ports) upgrading strategy as an opportunity to accelerat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engthen digital space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explore and improve data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data exit compliance channels, and gradually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level opening,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digital trade patter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de; Cross-Border Data Flow; Data Security Assessment

(责任编辑: 彦 伦)

【区域开放与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研究*

陶宏展 吴超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学准确评估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对深化双边贸易合作至关重要。利用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HS4位数进口产品数据,在大国经济假设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并对福利效应在国家和产品层面进行分解,研究发现: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收益从16.29亿美元上升到94.77亿美元,特别是2013年以后,中国与共建国家效率损失下降明显;中国在不断优化进口贸易外部空间格局,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效率损失,持续履行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惠发展的承诺。中国应继续深入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合作,积极主动从共建国家扩大进口,降低消费品和中间品关税水平,把握进口主动权,整合区域内优势要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国经济假设;进口贸易;福利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50-09 收稿日期:2024-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循环格局下构建高效智慧供应链体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1BJY058);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一般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研究”(24E080)。

作者简介:陶宏展,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郑州 451464)。

吴超,男,郑州大学讲师,通信作者(郑州 450001)。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截至2023年底,已经有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历史性的丰硕成果,成为中国不断履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举措。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探讨和评估,总地来看,经济效应是正向积极的。在经济增长方面,“一带一路”促进了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量”和“质”的同步增长,具有双向溢出效应,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戴翔等,2022)。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互惠共生水平,促进了双方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迈进(刘友金等,2023)。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对进口效应、出口

效应和双边贸易效应均有正向影响(胡再勇等, 2019), 贸易空间分布多元化, 地缘经济联系加强(王孝松等, 2022), 形成了协调互补的贸易合作网络(张辉等, 2023), 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卢盛峰等, 2021)。同时,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双边直接投资, 提高了技术溢出, 提升了“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度(毛艳华等, 2023), 推动了区域价值链的深度合作, 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戴翔等, 2021)。

但已有文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 仅有的几篇文献如余壮雄等(2022)的研究认为,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边贸易合作的加强,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促进了共建国家的产品升级。通过竞争效应和需求效应,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口价格显著下降(李宁静等, 2023)。中国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的产品平均缺乏弹性, 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关税削减显著降低了中国的无谓损失, 提高了中国贸易福利(刘瑶等, 2022)。但已有文献的关税福利测算是基于 Kee, et al.(2009)的小国经济假设基础上的, 出口供给完全弹性, 关税完全传递到进口国消费价格, 导致消费者无谓损失, 没有考虑到关税可能引致的贸易条件收益, 忽略了关税福利效应的重要渠道(Soderbery, 2021)。

综上, 本文下面利用2002—2021年中国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HS4位数进口产品数据, 在大国经济假设下测算中国整体关税福利效应及进口效率损失、贸易条件收益和共建国家出口效率损失, 并对福利效应在国家和产品层面进行详细地分解, 科学准确地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口贸易福利效应, 拓展相关理论及实证文献, 以期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二、大国经济假设下关税福利效应理论分析

借鉴 Amiti, et al.(2019)的研究, 基于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对大国经济假设下关税福利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并与小国经济假设进行对比。

小国经济假设下(如图1左图), 进口国作为价

格接受者, 对世界价格不产生影响。出口供给完全弹性, 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进口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表明产品价格上升, 进口需求减少, 而国内生产厂商增加生产。

当进口国对产品征收部分关税 τ 时, 出口供给价格为 p_i^* , 等于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p_0^*), 国内产品价格上升到 p_1 , 进口需求数量从 x_0 降至 x_1 , 此时国内生产厂商增加生产, 增加了生产者剩余, 而消费者剩余下降了 $A+B$ 区域, 具体地, A 区域表示由消费者剩余转为政府关税收入, B 区域表示进口减少和被国内生产取代导致的无谓福利损失。虽然征收关税为进口国带来了政府关税收入, 但政府关税收入会被生产者剩余完全抵消, 从而导致消费者无谓福利损失(B 区域)。

大国经济假设下(如图1右图), 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会对世界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出口供给不再是完全弹性, 供给曲线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表明产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出口商增加生产, 而国外消费者消费减少。

当进口国对产品征收部分关税 τ 时, 出口供给厂商为了维持出口, 将会吸收一部分关税, 将出口供给价格下降到 p_i^* , 国内产品价格上升到 p_1 , 进口需求数量从 x_0 降至 x_1 , 此时国内生产厂商增加生产, 消费者剩余依然下降了 $A+B$ 区域。而政府总关税收入则增加到 $A+D$ 区域, 其中, D 区域表示出口国供给价格下降为进口国带来的贸易条件收益。进口国征收关税导致的净福利效应为政府总关税收入减去消费者剩余损失, 即贸易条件收益(D 区域)与无谓福利损失(B 区域)之间的差。但出口供给厂商的损失却不只有 D 区域, 还会因为进口需求减少导致无谓福利损失(C 区域)。

可见, 在大国经济假设下, 进口国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征收关税会导致消费者无谓福利损失和贸易条件收益, 也会导致出口国福利损失。其中, 进口国与出口国无谓损失($B+C$ 区域)被称为总体效率损失, 即由于征收关税导致的进口国国内生产、出口国出口厂商生产与国内消费之间的市场扭曲。进口国贸易条件收益和出口国福利损失($D+C$ 区域)被称为总体贸易条件扭曲, 即由于进口国征收关税导致的出口国出口价格下降和出口数量减少的市场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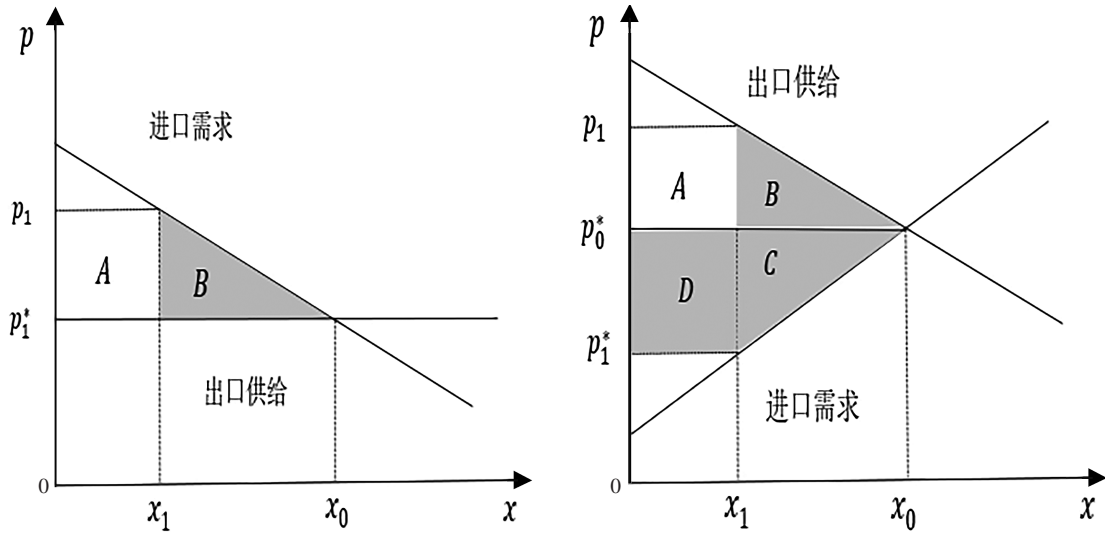


图1 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假设下关税福利效应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大国经济假设下关税福利效应测算模型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鉴 Soderbery(2021)大国经济假设下关税福利效应测算模型,研究进口国关税变化导致的进口国效率损失、出口国效率损失和贸易条件效应,进而分析进口国关税变化对贸易双方福利的影响。

大国经济假设下,进口国征收关税引致的整体福利变化为:

$$\Delta W^I = -\frac{1}{2} \sum_g \sum_v p_{gv}^* x_{gv}^I \sigma_g^I (1 - \Lambda_{gv}^I) (\tau_g^I)^2 + \sum_g \sum_v p_{gv}^* x_{gv}^I \Lambda_{gv}^I \tau_g^I \quad (1)$$

其中, p_{gv}^* 表示产品 g 种类 v 的世界价格, x_{gv}^I 表示进口国 I 对产品 g 种类 v 的进口数量, τ_g^I 为进口国 I

对产品 g 征收的关税^①, σ_g^I 为产品 g 种类间的替代弹性,即进口需求弹性, Λ_{gv}^I 为出口种类价格的关税传递弹性,定义为 $\Lambda_{gv}^I = \frac{\omega_{gv}^I (1 + \bar{\omega}_{go}^I \sigma_g^I)}{(1 + \bar{\omega}_{go}^I) (1 + \omega_{gv}^I \sigma_g^I)} \in [0, 1]$, ω_{gv}^I 为

反向出口供给弹性, $\bar{\omega}_{go}^I \equiv \frac{\sum_v p_{gv}^I x_{gv}^I \omega_{gv}^I}{\sum_v p_{gv}^I x_{gv}^I}$, 为 ω_{gv}^I 的加权平均,国内消费价格的关税传递弹性为 $1 - \Lambda_{gv}^I$ 。当 Λ_{gv}^I 上升时,即出口种类关税价格传递弹性增大,出口种类价格吸收了更大部分关税,而进口国贸易条件收益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当 $\Lambda_{gv}^I = 0$ 时,国内消费价格的关税传递弹性 $1 - \Lambda_{gv}^I = 1$,关税完全传递到国内消费价格上,即小国经济假设下关税引致的整体福利变化

$$\Delta W_{small}^I = -\frac{1}{2} \sum_g \sum_v p_{gv}^* x_{gv}^I \sigma_g^I (\tau_g^I)^2。$$

为了进一步厘清关税变化导致的进口国效率损失、出口国效率损失和贸易条件收益,将式(1)整体福利变化进一步分解为:

$$\Delta Eff^I = -\frac{1}{2} \sum_g \sum_v p_{gv}^* x_{gv}^I \sigma_g^I (1 - \Lambda_{gv}^I)^2 (\tau_g^I)^2 \quad (2)$$

$$\Delta Eff^* = -\frac{1}{2} \sum_g \sum_v p_{gv}^* x_{gv}^I \sigma_g^I (1 - \Lambda_{gv}^I) (\Lambda_{gv}^I) (\tau_g^I)^2 \quad (3)$$

$$\Delta AggEff^I = -\frac{1}{2} \sum_g \sum_v p_{gv}^* x_{gv}^I \sigma_g^I (1 - \Lambda_{gv}^I) (\tau_g^I)^2 \quad (4)$$

$$\Delta AggTOT^I = \sum_g \sum_v p_{gv}^* x_{gv}^I \Lambda_{gv}^I \tau_g^I \quad (5)$$

其中, $\Delta Eff'$ 表示进口国效率损失, ΔEff^* 表示出口国效率损失, $\Delta AggEff' = \Delta Eff' + \Delta Eff^*$ 表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整体效率损失, $\Delta AggTOT' = \Delta TOT' + \Delta Eff^*$ 表示关税引致的总体贸易条件扭曲, 其中, $\Delta TOT'$ 表示进口国贸易条件收益。

四、数据来源及特征事实分析

本部分首先介绍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测算所需数据的来源情况, 其次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关税情况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据来自中国“一带一路”网站, 目前总共有 152 个共建国家, 并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按洲际、收入程度、发展程度进行分类^②。其次, 中国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流量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数据库, 选取 2002—2021 年 HS4 位数产品层面数据, 并进行 BEC 分类。再次,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弹性数据来自 Soderbery (2019) 对 1984—2007 年中国 HS4 位数产品层面进口需求和反向出口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最后,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关税数据来自 WITS Trains 数据库, 缺失关税数据由 WTO 数据库补充。

将进口贸易流量数据、关税数据和弹性数据进行匹配后, 最终保留了 2002—2021 年中国与 111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130324 条“年份—出口国—产品”三维非平衡面板进口数据。

(二) 特征事实分析

表 1 显示了 2002—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额及关税情况。

首先, 从进出口额看, 2002—2021 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额从 976.41 亿美元增长到 12035.44 亿美元, 增长了 12.32 倍, 占中国进口总额比例从 33.08% 增长到 44.84%; 2013—2021 年年均增速 5.84%, 出口额从 795.59 亿美元增长到 13464.92 亿美元, 增长了 16.92 倍, 占中国出口总额比例从 24.43% 增长到 40.05%, 2013—2021 年年均增速 7.47%,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度增长。

其次, 从进口关税看, 2002—2021 年, 中国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关税水平整体在不断下降, 其中, 简单平均关税从 11.51% 下降到 7.06%, 加权平均关税从 7.43% 下降到 4.22%, 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 2013 年后, 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关税水平下降明显。

最后, 从弹性来看, 国内消费价格的平均关税传递弹性整体表现出不断增长趋势, 从 2002 年的 46.88% 上升到 2021 年的 47.31%, 表明关税下降对国内消费价格会产生重要影响。与之相反, 出口供给价格的关税传递弹性从 53.12% 下降到 52.69%, 表明出口国出口产品吸收关税的水平也在不断降低, 关税下降对出口供给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导致进出口双方的福利水平发生重大变化。

五、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将分别测算及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及其在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分解结果。

(一) 关税福利效应测算结果

表 2 显示了 2002—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关税福利效应及其分解。一方面, 从整体福利效应 ($\Delta W'$) 来看, 2002—2021 年,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限制程度下降, 中国因实施关税政策获得的福利收益从 16.29 亿美元上升到 94.77 亿美元, 同时福利效应占进口额的比例下降, 从 0.55% 下降到 0.35%。而小国经济假设下中国进口贸易福利效应 ($\Delta W'^{small}$) 均为负, 这正是小国经济假设偏离真实情况, 忽略了出口国效率损失和进口国贸易条件收益的原因导致, 也是与大国经济假设根本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 从福利效应 ($\Delta W'$) 的分解来看, 历年中国效率损失 ($\Delta Eff'$) 均大于出口国效率损失 (ΔEff^*), 整体效率损失 ($\Delta AggEff'$) 主要来源于中国效率损失, 特别是 2012 年后,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 中国效率损失 ($\Delta Eff'$) 从 17.57 亿美元下降到 15.85 亿美元, 出口国效率损失 (ΔEff^*) 从 10.74 亿美元下降到 9.67 亿美元, 两者造成的整体效率损失 ($\Delta AggEff'$) 则从 28.31 亿美元下降到 25.52 亿美元,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既惠及中国, 也惠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双边效率损失下降, 福利收益增加。

表1 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及关税情况

年份	共建国家进口	共建国家出口	占比(%)	占比(%)	简单平均关税	加权平均关税	关税传递弹性
2002	976.41	795.59	33.08	24.43	0.1151	0.0743	0.4688
2003	1441.39	1104.31	34.92	25.20	0.1041	0.0658	0.4724
2004	2024.62	1523.74	36.07	25.68	0.0966	0.0620	0.4731
2005	2528.34	2025.85	38.31	26.59	0.0903	0.0487	0.4758
2006	3081.13	2757.87	38.93	28.46	0.0900	0.0452	0.4769
2007	3756.50	3808.51	39.29	31.22	0.0915	0.0456	0.4779
2008	4628.06	4901.86	40.86	34.26	0.0883	0.0381	0.4783
2009	3984.85	4008.64	39.63	33.36	0.0860	0.0407	0.4821
2010	5724.11	5293.82	41.00	33.55	0.0875	0.0410	0.4742
2011	7531.49	6503.54	43.20	34.26	0.0877	0.0406	0.4742
2012	8081.08	7150.66	44.45	34.90	0.0919	0.0448	0.4714
2013	8426.12	7862.40	43.21	35.59	0.0916	0.0446	0.4735
2014	8630.15	8723.50	44.05	37.24	0.0853	0.0420	0.4760
2015	6936.26	8458.46	41.30	37.21	0.0861	0.0472	0.4761
2016	6432.29	7807.61	40.51	37.22	0.0905	0.0546	0.4768
2017	7799.74	8454.79	42.30	37.35	0.0888	0.0514	0.4796
2018	9452.05	9284.61	44.30	37.34	0.0886	0.0478	0.4694
2019	9405.27	9994.17	45.23	39.99	0.0702	0.0402	0.4724
2020	9037.09	10284.29	43.67	39.72	0.0705	0.0439	0.4723
2021	12035.44	13464.92	44.84	40.05	0.0706	0.0422	0.4731

资料来源:关税水平及传递弹性为作者计算得到。进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

表2 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关税福利效应及分解

年份	ΔW^I	占比(%)	ΔW^{small}	占比(%)	$\Delta AggTOT^I$	ΔEff^I	ΔEff^*	$\Delta AggEff^I$
2002	16.29	0.55	-15.88	0.54	24.40	-4.80	-3.31	-8.11
2003	21.37	0.52	-18.26	0.44	30.68	-5.48	-3.83	-9.31
2004	25.35	0.45	-24.18	0.43	38.19	-7.58	-5.26	-12.84
2005	29.50	0.45	-13.71	0.21	36.52	-4.25	-2.77	-7.02
2006	29.55	0.37	-17.50	0.22	38.98	-5.71	-3.72	-9.42
2007	34.09	0.36	-19.64	0.21	44.63	-6.48	-4.07	-10.55
2008	34.87	0.31	-20.24	0.18	46.14	-7.10	-4.17	-11.26
2009	33.99	0.34	-18.81	0.19	44.25	-6.40	-3.86	-10.26
2010	47.69	0.34	-27.99	0.20	62.51	-9.27	-5.54	-14.81
2011	58.24	0.33	-39.00	0.22	80.11	-14.29	-7.58	-21.87
2012	62.70	0.34	-51.08	0.28	91.01	-17.57	-10.74	-28.31
2013	67.24	0.34	-50.73	0.26	95.21	-17.40	-10.56	-27.97
2014	62.33	0.32	-34.78	0.18	81.94	-12.74	-6.87	-19.61
2015	56.46	0.34	-32.82	0.20	74.14	-11.01	-6.67	-17.68
2016	58.75	0.37	-34.72	0.22	77.14	-11.38	-7.00	-18.39
2017	70.85	0.38	-41.09	0.22	92.27	-12.87	-8.55	-21.42
2018	84.68	0.40	-48.73	0.23	110.34	-15.99	-9.67	-25.66
2019	75.41	0.36	-34.66	0.17	94.03	-11.55	-7.07	-18.62
2020	73.15	0.35	-36.62	0.18	92.88	-12.16	-7.56	-19.73
2021	94.77	0.35	-46.57	0.17	120.28	-15.85	-9.67	-25.52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福利单位为亿美元。

(二)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福利效应分解

表3显示了2013—2021年出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国家和贸易条件贡献增加最多的10个国家。一方面,2013—2021年,出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共计下降2.43亿美元,其中,越南效率损失下降最为明显,下降1.18亿美元,2021年排名前10国家出口效率损失共计2.57亿美元,占2021年出口国效率损失(9.67亿美元)的比例为26.58%。另一方面,贸易条件贡献增加最多的10个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国家,共计增加27.74亿美元,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增加最快,2021年排名前10国家贸易条件贡献65.39亿美元,占2021年中国贸易条件收益(110.61亿美元)的比例为59.12%。可以看出,2013年以来,中国进口贸易方向逐渐转向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断优化开放发展外部空间格局,以此减轻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依赖。

表3 2013—2021年国家层面福利效应分解

出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国家	下降幅度	贸易条件贡献增加最多的国家	增加幅度
越南	1.18	印度尼西亚	6.92
韩国	0.50	泰国	4.89
巴基斯坦	0.31	越南	3.76
南非	0.17	马来西亚	3.19
意大利	0.07	新西兰	2.85
喀麦隆	0.07	意大利	1.79
马里	0.04	智利	1.36
土耳其	0.04	俄罗斯	1.22
卡塔尔	0.03	阿联酋	1.19
津巴布韦	0.03	奥地利	0.57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福利单位为亿美元。

表4显示了按洲际、收入程度、发展程度分类的区域层面福利效应分解结果。

首先,洲际分类方面,从出口效率损失来看,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出口效率损失下降明显,下降最多的是亚洲国家,下降幅度为0.62亿美元,其次是非洲国家,下降幅度为0.44亿美元;从贸易条件贡献来看,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对中国贸易条件贡献均在增长,非洲国家贸易条件贡献下降,表明中国对非洲贸易过程中存在让利。而中国贸易条件收益主要来自亚洲和欧洲,2021年两大洲贸易条件贡献总共98.0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条件收益

比例为88.67%,贸易条件收益分布相对集中。

其次,收入程度分类方面,从出口效率损失来看,高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效率损失均表现出明显下降,其中,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降最多,下降幅度为0.50亿美元;从贸易条件贡献来看,高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贸易条件贡献出现增长,而低收入经济体贸易条件贡献下降。中国贸易条件收益主要来自高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2021年两类经济体贸易条件贡献总共110.1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条件收益比例达99.58%,分布更为集中。

最后,发展程度分类方面,从出口效率损失来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出口效率损失均下降明显,发达经济体效率损失下降0.58亿美元,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下降0.31亿美元;从贸易条件贡献来看,两类经济体贸易条件贡献均在增长,其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条件贡献增加最多。上述数据再次印证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贸易畅通、贸易互惠的承诺。

表4 2013—2021年不同区域福利效应分解

		2013年		2021年	
		出口效率损失	贸易条件贡献	出口效率损失	贸易条件贡献
洲际分类	非洲	-0.76	-3.10	-0.32	-2.65
	亚洲	-7.64	-62.58	-7.02	-78.87
	欧洲	-1.02	-14.03	-0.98	-19.20
	北美洲	-0.00	-0.05	-0.00	-0.05
	大洋洲	-0.76	-2.52	-0.79	-5.38
	南美洲	-0.38	-2.36	-0.55	-4.47
收入程度分类	高收入经济体	-4.01	-47.60	-3.69	-53.85
	低收入经济体	-0.13	-0.56	-0.06	-0.46
	中等收入经济体	-6.42	-36.49	-5.92	-56.30
发展程度分类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7.24	-44.16	-6.93	-67.58
	发达经济体	-3.32	-40.49	-2.74	-43.03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福利单位为亿美元。

(三)产品及分类层面的福利效应分解

表5显示了2013—2021年进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产品、总体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产品和贸易条件收益增加最多的10个产品。首先,2013—2021年,进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产品主要集中在谷物、糖类食品、车辆及其零件、橡胶

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矿物燃料等消费品和中间产品,如进口效率下降最多的HS4位数产品为1006(稻谷、大米),下降幅度为2.92亿美元。其次,总体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产品与进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10个产品基本相同,也间接说明了这些HS4位数产品出口效率损失同样下降明显,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进口贸易是互惠行为。最后,中国贸易条件收益增加最多的前10位产品主要分布在水果、化妆品、水产品、塑料及其制品、矿物燃料等消费品和中间品,如贸易条件收益增加最多的HS4位数产品为0810(其他鲜果),增加幅度为3.30亿美元。

表5 2013—2021年商品层面福利效应分解

进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商品	下降幅度	总体效率损失下降最多的商品	下降幅度	贸易条件收益增加最多的商品	增加幅度
1006	2.92	1006	4.99	0810	3.30
8703	1.05	5101	1.47	3901	3.04
4001	0.83	8703	1.23	2707	2.54
5101	0.72	4001	1.04	2701	2.30
5201	0.35	5201	0.67	2711	1.38
2710	0.17	2710	0.32	2715	1.18
4005	0.16	4005	0.22	0809	1.15
1701	0.12	1701	0.19	3304	1.10
8708	0.10	8708	0.16	7601	0.90
2905	0.08	2905	0.11	0306	0.86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福利单位为亿美元。

表6显示了HS4位数产品层面按BEC分类的福利效应分解结果。

首先,SNA三大类方面,进口效率损失和总体效率损失均集中在消费品和中间品。其中,消费品进口效率损失和总体效率损失出现了增长,但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加值,消费品进口效率损失均大于出口效率损失,出口效率损失较小,表明中国承担了大部分效率损失。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效率损失和总体效率损失下降明显,但资本品效率损失占比较低。同时,贸易条件收益也集中在消费品和中间品。其中,消费品贸易条件收益增长15.27亿美元。中间品贸易条件收益增长12.90亿美元,占比从77.08%下降到70.65%,表明虽然中间品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主要进口产品分类,但消费品逐渐成为双边贸易重要的进口产品,发展潜力巨大。

其次,生产阶段方面,消费品及资本品效率损

失和贸易条件收益与SNA分类保持一致,中间品效率损失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初级产品进口效率损失和总体效率损失下降明显,进口效率损失下降4.68亿美元,总体效率损失下降7.84亿美元。半成品进口效率损失大于出口效率损失,中国承担了更多的效率损失。配件和零部件效率损失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和占比都较低。同时,中国贸易条件收益也集中在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其中,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收益占比从17.53%上升到18.50%,半成品贸易条件收益占比从68.67%上升到70.24%,可以看出,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作为中国主要进口产品,贡献了较多的贸易条件收益。

表6 2013—2021按SNA和生产阶段分类福利效应分解

		2013年			2021年		
		进口效率损失	总体效率损失	贸易条件收益	进口效率损失	总体效率损失	贸易条件收益
SNA分类	消费品	-4.70	-6.62	13.69	-6.89	-10.48	28.96
	中间品	-12.55	-21.00	65.25	-8.83	-14.81	78.15
	资本品	-0.16	-0.34	5.71	-0.12	-0.23	3.50
生产阶段分类	初级产品	-7.72	-12.52	11.44	-3.04	-4.68	14.46
	半成品	-4.57	-7.88	44.87	-5.65	-9.76	54.89
	配件和零部件	-0.25	-0.60	8.94	-0.15	-0.37	8.80
	消费品	-4.70	-6.62	13.69	-6.89	-10.48	28.96
	资本品	-0.16	-0.34	5.71	-0.12	-0.23	3.5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福利单位为亿美元。

注:BEC按SNA和生产阶段分类,未将分类7(其他未提到的货品)纳入分析。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HS4位数进口产品数据,在大国经济假设下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并对福利效应在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进行了分解。

(一)结论

(1)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贸易获得的福利收益大幅提升,特别是2013年以后,中国进口效率损失、共建国家出口效率损失均下降明显。

(2)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出口效率损失下降最多,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贸易条件收益贡献

增加最多,中国在不断优化进口贸易外部空间格局,持续履行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惠发展的承诺。

(3)中国进口效率损失和总体效率损失集中在消费品和中间品上,但中国承担了大部分的效率损失。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作为中国主要进口产品,贡献了较多的贸易条件收益。

(二)政策建议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增长疲软和新动能缺乏的关键调整期,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部分发达国家实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单方面打压封锁不断且形式多样化,产业链、供应链“有限全球化”“脱钩断链”趋势明显,区域价值链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

(1)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中国应持续发挥主导作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入推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畅通,提升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水平,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区域贸易网络,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积极主动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合作走深走实,打造更加稳定、更具韧性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一体化水平,助力共建国家更高质量的融入全球价值链,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地位,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2)“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差异,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在深化“一带一路”贸易合作中,中国应更多地关注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贸易,在促进相关国家出口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贸易外部空间格局,减轻对某些发达国家或特定经济体特定产品的进口依赖,牢牢把握进口主动权,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福利收益,进一步实现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动式共赢共享发展,为共同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3)关税是一国贸易壁垒强弱的重要表现形式,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自由化水平,中国应继续降低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消费品进口贸易关税水平,通过进口贸易成本下降,为共建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也使中国更好地吸引全球优质消费品,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发挥进口竞争效应,优胜劣汰,可以有效促进国内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改善消费者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消费者的贸易获得感,满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释放内需潜力,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中间品是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最紧密的产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应持续与共建国家拓展中间品贸易,加大与共建国家中间品的进口,特别是初级产品和半成品的进口,整合区域内优势资源要素,提供国内产业升级所需的高新技术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紧缺资源品等产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提升创新能力,实现产品结构优化和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国内产业现代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积极推动更多国家更快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注释

①本文假设 $\tau_{gi}^t = \tau_{gi}^t$,表示征收相同的关税水平,不具体讨论进口国*I*对产品*g*不同种类,即不同来源国种类征收不同关税水平的情形。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按收入程度的分类依据WTO国家收入分类标准;按发展程度的分类依据IMF国家经济分类标准。按三大类分类后,保留了148个国家,删除了古巴、巴勒斯坦、库克群岛和纽埃4个归类不全的国家。

参考文献

- [1]戴翔,王如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效应:质还是量[J].国际贸易问题,2022(5).
- [2]刘友金,周健,曾小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3(2).

- [3]胡再勇,付韶军,张璐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2).
- [4]王孝松,周钰丁,肖尧.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2(9).
- [5]张辉,闫强明,李宁静.“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贸易的共享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23(5).
- [6]卢盛峰,董如玉,叶初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3).
- [7]毛艳华,邱雪情,王龙.“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与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J].国际贸易,2023(1).
- [8]戴翔,宋婕.“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链优化效应:基于沿线参与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1(6).
- [9]余壮雄,程嘉嘉,董洁妙.“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产品升级:区分不同进口竞争效应来源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2(12).
- [10]李宁静,闫强明,刘冲.“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口价格效应[J].财经研究,2023(7).
- [11]刘瑶,张一平,王孟竹.进口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双边进口需求弹性的测算[J].世界经济研究,2022(3).
- [12]H L KEE, A NICITA, M OLARREAGA. Estimating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ice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4): 172—199.
- [13]A SODERBERY.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and welfare: A structural approach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21, 54(3): 1—31.
- [14]M AMITI, S J REDDING, & D E WEINSTEIN.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 S. price and welfa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4): 187—210.
- [15]A SODERBERY. Trade elasticities, heterogeneity and optimal tariff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14: 44—62.

Research on the Welfare Effects from Im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Tao Hongzhan Wu Chao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welfare effects of import trade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HS4-digit product level import data of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from 2002—2021 to measure the welfare effects from im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under the large-country assumption, then decomposes the welfare effects at the country and product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lfare effects from im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increased from 1.629 billion in 2002 to 9.477 billion in 2021, especially, the efficiency loss of China and the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13. China is constantly optimizing the external spatial pattern of import trade, and bears most of the efficiency loss, it is fulfilling its commitment to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rad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ctively expand imports from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reduce tariffs on consumer goods and intermediate goods, seize the import initiative, integrate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Co-Construction Country; Large-Country Assumption; Import Trade; Welfare Effect

(责任编辑:柳 阳)

【书评】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价值

——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

李 扬

摘 要：《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一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个性与共性相融合。基于对省域现代化理论内涵的分析，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六个发达省市为样本，通过对其发展基础与特征、发展历程与实践进行分析和总结，揭示了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的实践价值和示范意义。该书逻辑清晰、论证严谨、观点鲜明，是一部在省域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省域；示范意义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59-02 **收稿日期：**2024-05-28

作者简介：李扬，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区域现代化研究院院长、高级编辑（南京 210004）。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省级行政区域作为连接中央政府和市县地方政府的“十”字形枢纽，对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协调、支持和保障作用，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环节，又是市县层面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协调者。

纵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现代化发展具有时间上的非同步性、空间上的非均衡性等共性特征。从中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省份基于良好的区位优势 and 倾斜性的政策优势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自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策源地 and 引领区。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及时总结、推广运用这些发达省份的成功做法与经验，对于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迈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王树华、孟静、查婷俊三位青年科研人员共同撰写《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从理论层面对省域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实践层面对东部发达省市的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区域现代化特别是省域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参考。通览全书，该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该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深刻揭示了省域现代化的理论内涵。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沿着“现代化→区域现代化→省域现代化”的研究脉络渐次展开理论分析，最终落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作者基于现代化萌芽的溯源，概括提炼出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其次，从“现代化目标与过程的统一”“现代化发展的非线性”“现代化实践的全领域”等方面提炼现代化的发展特征。再次，作者对区域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从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发展空间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发展结果的率先性等角度提炼区域现代化的基

本特征。最后,落脚到省域现代化,作者基于省域所具有的“空间范围的相对稳定性”“政府决策的自主性”“省域内部联系的紧密性”特征,作出了“省域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尺度”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省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解构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六大方面,并从提供条件保障、积累创新经验、提升治理效能等多个维度界定了省域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如此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学理论述,让本书得以系统搭建起省域现代化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

第二,该书坚持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生动展现了典型省份现代化的实践价值。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既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所证明,既可以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该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注重在纵向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横向发展事实的比较中总结省域现代化的经验启示。该书选取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六个东部发达省市作为分析对象,运用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样本省份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与特征、发展历程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在纵向发展历程的分析中,注重揭示各地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在横向发展基础的比较中,注重揭示各地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在

此基础上,作者归纳出了强化创新驱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市场监管等可供其他省份借鉴的成功做法与经验,让本书不仅具有理论高度,也具有实践深度。

第三,该书坚持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系统分析了东部省市现代化的示范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分析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时,该书从现代化的时空演进、动力转换、协调发展三个维度总结了现代化先行国家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区域特征。在时空演进上,兼具相对集中性、非同步性、传导性和扩散性特征;在动力转换上,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协调发展上,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通过对六个省市立足自身基础探寻各具特色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归纳,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省域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理论研究,而且为不同类型省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生动样本和典型经验。

总体来看,该书逻辑清晰、论证严谨、观点鲜明,既对省域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学理探索,又对发达省市现代化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是一部在省域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Exploring the Provincial Valu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n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Guangdong

Li Yang

Abstract: The book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n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Guangdong* adheres to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vertical analysis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this book takes six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Guangdong as samples. Through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six provinces and cities, it reveals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It has clear logic, rigorous argumentation, and distinct viewpoints, making it a valuable work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ncial Region;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张子)